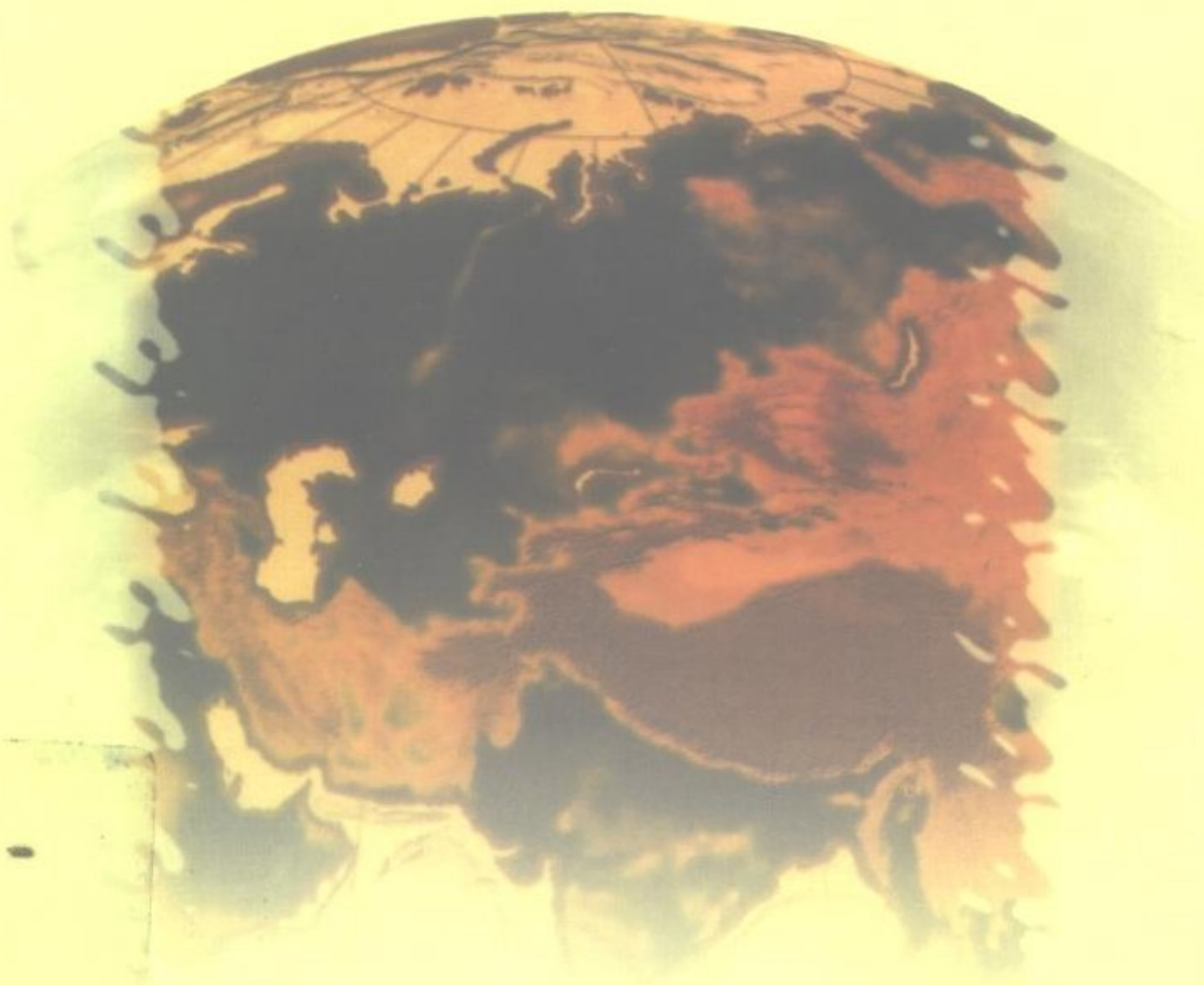


全 球 化 论 丛

GLOBALIZATION SERIES

全球化与世界

■ 王 列 杨雪冬 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D50

24

0100158



201004581

全球化与世界

王列 杨雪冬 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世界/王列 杨雪冬编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

(全球化论丛)

ISBN 7-80109-296-1

I. 全…

II. ①王… ②杨…

III. 一体化-研究-世界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309 号

全球化与世界

王列 杨雪冬 编译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9.125

版 次: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500 册

定 价:15.20 元

DI09/06

前 言

90年代中期,西方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1996年,我们——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殷叙彝、张世鹏研究员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王列副研究员共同设计申请了《80—9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批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收集翻译了西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代表性学术刊物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作为课题中间成果编成《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与世界》两本书出版发行。

这些论文发表时间基本都在90年代中期,可以说基本反映了西方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论文涉及全球化概念界定、全球化基本范畴、全球化的原因与前提条件、当前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以及在国际政治领域为适应全球化形势而进行的调整变革等一系列热点问题。

本书文章由王列、杨雪冬选编,还有一些同志参加了翻译工作,都在译文后署名。殷叙彝阅读了部分文章,提出重要修改意见。本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收入《全球化论丛》。

张世鹏

1998年10月6日

目 录

前 言.....	(1)
面向全球化.....	阿兰·伯努瓦(1)
战后的全球积累和资本的跨国化	塞拉斯·比纳 贝扎德·亚格梅安(28)
全球化与国内经济政策的可能性.....	格雷厄姆·汤普森(51)
全球化问题——资本的力量	威廉·K.塔布(76)
全球化与国家无能的神话.....	琳达·韦斯(88)
全球化与国家的未来.....	克利夫·克鲁克(98)

2 全球化与世界

- 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 苏珊·斯特兰奇(110)
- 民族国家持久不衰的政治经济学 萨姆·普利(122)
- 全球化与停滞 阿瑟·麦克艾文(139)
- 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 克里斯·哈曼(153)
- 处于绝境的全球化..... 威廉姆·凯勒 路易斯·波利(196)
- 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 詹姆斯·N. 罗西瑙(206)
- 五十年足矣 萨米尔·阿明(219)
- 走向全球的开放社会 乔治·索罗斯(258)
- 得不偿失的胜利:关于盎格鲁—撒克逊式
资本主义未来的问答 罗伯特·保尔(266)
- 政治与经济 尼克拉斯·卢曼(276)

面向全球化*

阿兰·伯努瓦

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人们一般都认为它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控制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虽然有许多关于全球化的论著,但这一概念依然不够清晰。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发展;还有人认为,全球化表明了由于金融资本的增加而带来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型对立关系,或者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重新分离。一些人把全球化看作是世界贸易的扩张,包括南方的新兴国家(伴随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策略),而另一些人则强调信息革命所引起的交流的扩大。那么,究竟全球化是什么?

首先,必须把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区分开来。这两个现象相互交织,但并不完全重合。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贸易的激增。今天,国际贸易的增长超过了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1990年,国际贸易已经是世界经济总量的

* 本文译自美国《泰洛斯》杂志1996年夏季号第108期。

2 全球化与世界

15%。从1985年到1990年的5年时间内,出口额增加了13.9%。从1960到1989年间,工业制成品贸易翻一番,而资本流量增加了4倍。就在那个时期,金融流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短期资本越来越容易得到,直接的外国投资继续增长。这些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世界财富的增长。1970年到1985年间,年增长率为15%,而1985到1990年间上升为28%;在这期间,直接投资量增加了3倍,从1985年的43亿美元增加为1990年的167亿美元。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流动在造成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经济全球化出现了。

造成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业的发展。它们减少了长距离交易成本,并使世界任何地方的“实时”交易成为可能,从而为价格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及时的信息——过去,这些信息通常要花几周时间才能到达某些金融中心。这样,新的沟通技术使空前规模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相互联系股票市场全天候地运作。货币以光速从地球的一端向另一端运动,以求最好的获利。然而,这种全球化是纯粹的资本全球化,货币市场是即时套利的唯一场所。

计算机使得这种日渐增长的流动性成为可能,货币市场的交易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发展。现在,每天的交易量超出一万亿美元。这些资金来自商业银行持股者、跨国公司以及专门为这种交易而设立的银行所持有的浮动货币储备。这个系统的基础在于货币交易,而这种货币交易有可能以日甚至小时为单位产生远远高于传统工业或商业活动的可观的收益。通过观测汇率的变化,货币电子化使巨额货币能够及时交易,并几乎完全不依赖中央银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这种新现象称为“泡沫经济”的原因。

一些人声称,全球化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个时期经受着石油价格猛涨和国际金融系统出现危机的双重冲击;生

产率和增长率都很低,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渐饱和、外国金融紧缩造成的负担不断增加、固定汇率制度的废除以及美国贸易赤字膨胀都导致纯粹投机性的金融产品增多。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那时,公共债务不断增加,促进了货币大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出现了解除管制的浪潮,这一浪潮开始于里根政府,很快便传遍了所有发达国家。那时,面临金融一体化趋势,(主权)国家纷纷放权,采取了三项措施:消除分割、清除掮客、解除管制。这样一来,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策略使套利全球化、开放了消费市场,并且允许大公司与外国商人合作。到 90 年代初,苏联迅速垮台、前共产主义国家剧变成无约束的资本主义,从而使进入国际市场的人口增加了 2.5 亿;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同属一个集团”^① 的幻景迅速弥漫开来。

一、资本的垄断

对于上述一系列事件,必须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考

^① 参考罗伯特·莱西:《世界化的经济》(1993 年巴黎版);弗朗索瓦·谢耐:《资本的世界化》(1994 年巴黎版);雅克·阿德:《经济的世界化》(1996 年巴黎版);萨米尔·阿明:《世界化的挑战》(1996 年巴黎版);安东·布任德:《团结互助的绝对命令。面向世界化的法国》(1996 年巴黎版);让-伊夫·卡凡特:《世界化的考验。论一项欧洲的抱负》(1996 年巴黎版);弗朗索瓦·谢耐编:《金融的世界化。起源、代价和风险》(1996 年巴黎版);艾利·科恩:《法国的诱惑。世界化对主权的考验》(1996 年巴黎版);菲利浦·英格哈德:《世界人。人类社会能继续存在吗?》(1996 年巴黎版)。

察。全球化并不是偏离常轨,也不是一种激进的变革,更不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它只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动力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在上个世纪就发现的:“创造一个世界市场的倾向就是资本概念的部分内涵。”^① 而飞利浦·英格哈德说:“全球化无疑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② 这说明了商品经济史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形式变化。这种经济是在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环境下,一开始就以开放交流为基础、以主观性和物质成功的形而上学体系为依据的经济。这种经济开始于14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时期的长期商业发展,继而是“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然后是殖民主义时代。在1860年到1873年间,英格兰已经成功地开创了一个全球商业体系。1885年7月,茹尔·费里向议会宣称“找到殖民地就意味着开辟了新市场”。在非洲和亚洲,由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解体,殖民主义使西方产品大量渗入,并且开辟了新的贸易中心,除非不再有利可图,如殖民地的花费开始超过其产出,否则,他们不会放弃这种做法。^③

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本身与交流的国际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8世纪的经典经济理论认为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会导致产品体系和生活水平的均衡。而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流浪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正如阿德所言,全球化“只是把资本主义带回到它的最初形态,但为了更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置于价

① 引自飞利浦·英格哈德:《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1993年巴黎版)。

② 同上,第543页。

③ 马塞尔·毛斯在1920年说:“剩下的事情就是从贷款、贸易等一直到道德和物质生活的细节。”参见他的《民族》,载于全集第3卷《社会的凝聚力和社会学上的分裂》(1969年巴黎版)第625页。

值规律之下,资本主义更具跨国性(transnational)而不仅仅是国家间的(international)……”^①当然,全球化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特征。首先,在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地位超过了原材料,而且相对于真正的经济生产来说,金融领域已经获得了相当的独立性。其次,1980年代的大市场消除管制措施有效地预示了资本主义的来临不再是以实业为主,而是投机性的。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货币总量估计高于产品实际价值的15倍。这一金融“泡沫”积聚的资金来自私人 and 公共领域,就如同个别国家对公债的管理或退休基金会的管理情况一样。这自然促进了投机和不合法的活动,毒品和腐败成为新经济秩序的组成部分。

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新特点是市场普遍化。现在的交易涉及了以前各个独立的领域,文化、服务、自然资源、知识财富都成了自由贸易体制的组成部分。所有的东西都被转化成货币。一种活的事物,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就会变成一种商品,一种死的产品。而且,(该体系的)参与者和以前不再相同。过去的参与者主要是民族国家。今天,当金融市场占支配地位,银行控制着逐渐与实体经济脱离联系的金融领域时,参与者也主要变为支配投资和贸易的跨国公司。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正让位于一种由全球参与者构建的“世界经济”。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转变。几十年前,民族国家还是管理国家生产体系的天然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竞争基本上在民族国家之间进行。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区域性,即它从属于某个工业化国家。市场虽然不断扩张,但仍以国内市场为主。即使对那些有海外机构的公司来说,把母公司设在某个大国仍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和政治基本上要保持一致,而且制

^① 阿德,前引书第1卷。

6 全球化与世界

定国家经济决策是最重要的。再说,第三世界还没有变成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工业中心和周边地区仍存在强烈反差。

然而,今天,全球资本一体化已经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把各个部分重构为一个全球生产体系。这一生产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是分散的,远远超出了公司所在的地理位置,有时甚至不受公司的财政控制。产品凝聚了如此多产地的技术成分,以至于人们无法辨认每个国家的具体贡献,也无法区分制造该商品的劳动者的国籍。罗伯特·莱西指出,当美国人从通用汽车公司花2万美元购买一辆车时,其中属于美国生产者的不到800美元。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在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①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这才是全球化更深层的意义。

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出现了能够以全球规模策划其发展并实施其世界整体策略的工业公司。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量一般都超过公司总业务量的一半。1970年,有7000家这样的跨国公司,今天有4万家,而且控制20.6万家子公司,但仅占世界总人口的3%(约7300万人)。这些公司1991年的预算超出全世界商品和服务总出口额(4.8万亿美元);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世界税收的1/3强,其中最大的200家公司垄断了世界经济活动的1/4。近33%的世界贸易在相同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进行,而不是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这些公司控制着大量资源。通用汽车公司的预算(1320亿美元)超过了印度尼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福特汽车公司(1003亿美元)超过了

^① 伯特兰得·巴蒂:《领土的终端》(1996年巴黎版)。

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丰田公司多于葡萄牙的国民生产总值；联合利华公司比巴基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多；雀巢公司超出了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等等。

这些公司的国籍现在只有一种形式上的参照意义。它们早就学会用金融收益最大化目标取代极小的利润目标，而不顾社会后果如何。它们都是重要的金融集团，它们更热中于市场和专利控制而非生产本身，它们将其利润的主要部分化作货币或副产品，既不在股东之间分配利润，也不将其投资于生产活动。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比许多国家更富有，所以它们能够轻易地买通政治家或向政府官员行贿。为了更具竞争力，跨国公司还制定了新策略。既然采用经典投资方式所得的生产利润还不够高，也为了避免残酷的大规模贬值（如 1930 年代那样），它们已不得不为剩余流动资金寻找其他出路。为争夺市场份额，获取利润最大化，它们把不合格的和低工资工人都纳入到世界劳动力体系之中。^①

早期西方国家乐于开发南方国家的内部市场，而现在，跨国公司正忙于把在南方国家低成本组装或生产的产品重新出口到西方国家。由于南方国家的部分经济活动被纳入全球体系、生产领域的全球重组以及地方劳动力转变为工薪工人，全球化逐渐形成。80 年代以来，这种冲破地域限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是劳动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和重组，也是开创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另一步骤。毋庸置疑，为了把利润转移到决策中心，货币的自由运动是必须的，这一过程有减少地方积累和限制购买

^① 夏尔-阿尔贝·米夏莱：《世界资本主义》（1985 年巴黎版）。

力的双重作用。^①

同时,来自亚洲、还有部分来自拉美和前苏联的新参与者,正开始出现在全球贸易中。过去,南方和北方之间工资的差距反映了南北生产产量和质量的差距。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以及某些南方国家跨国公司的迅速出现,都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1995年,新加坡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法国。这种倾向显然将继续加强。这些新兴工业国家的成功一点也不符合自由主义的解释。“亚洲奇迹”主要是独特文化特征产生的结果,日本、中国、韩国或新加坡的情况就是这样。^②另外,这也可以被解释为这些国家独特的产业政策。这些国家对强加于它们的以低成本生产为特征的相对优势理论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相反,它们把精力集中在不用担心实际需求的世界范围内的高需求产品的生产上。当然,全球化改变了国家之间的竞争。一旦全世界的贸易可以自由进行、资金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国家的商业活动的竞争就不再自动地和国家之间的竞争相联系。这些大公司跨国运作的空间就不再限于国家范围内的自由组织。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只是由该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来衡量——这个国家的商人不得不根据最佳的收益(风险或利益)成本

① 萨米尔·阿明写道:“资本在国际间交流的自由化、流动贸易的采纳、高利率、美国收支平衡赤字、第三世界的外债和私有化共同构成一项完全理性的政策,它为流动资金提供了投机的途径,从而降低了剩余资本大规模贬值的主要风险。”参见《世界化的真正风险》,载于《政治评论》1996年10—12月号第70页。

② 正如英格哈德指出的:“‘这些人’的文化体系被西方现代性残酷地对待,至少,他们使自己向西方开放并且小心翼翼的,同时还关注着最好的经济状况。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东南亚和中国也是如此。”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第23页。

比例来确定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对于大公司的生产运作来说,国家不再起什么大作用,因而相对优势的概念也逐渐过时。

国家毫无选择,只好求助于纯竞争政策,这不利于社会整合。1980年代初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一开始是接受里根和撒切尔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结果是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由于接受这种全球化的要求,解除管制和自由化所涉及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广泛,如外国市场优先于国内市场、国有企业私有化、国际投资开放、由世界市场决定工资和价格、逐渐取消资助,以及减少用于教育、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等低竞争的开支等等。欧洲国家纷纷采用了严格的货币政策(又称作竞争性的紧缩通货政策),通过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但它产生的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低增长和失业增加。同时,由于对金融资本的征税率低于对工资的征税率,金融资本对整体福利的贡献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债务危机已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作类似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的结构性重组导致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都采用与工业化国家一致的做法,这产生了更具灾难性的结果。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就是强制实行解除管制、管理货币的波动、强迫第三世界经济服从于偿还国债的绝对命令。西方七国集团正努力协调大工业化国家危机管理政策,而不触动任何根本问题。但是,组织监督世界贸易的作用还是保存了下来。

过去,国家间的贸易谈判涉及一些国家行为,如进口额,关税、对资金汇兑的控制等等。今天,贸易外交的风险已远远越过国界。谈判涉及国家内部的制度:银行系统的结构、私人产权的期限、社会立法、关于竞争和兼并的规则以及对产业财富的规定。谈判的基本原则是,国际贸易将把制度相同或不相同的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减少国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性,与美国相一致的规则、更统一的财产制度受到鼓励。因此,为了提高利润率和竞争力,跨国公司会对规则、工资和税收等作出更具体的要求,从而通过这种游说能力加强其谈判能力。“由于地方性的和在国际的谈判越来越多,各国为了和外部强加的模式相一致,都面临着转变国内规则和制度的需求。”^①

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并不在于公平交易这一传统目标,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资本的流动。为了建立关于国外投资的新的国际产权制度,也为了加强对国家和政府的规则的限制,它们达成的协议与其说是公平贸易协议,还不如说是资金自由流动的协议。正如伊安·罗宾逊所言:“资金自由流动协议可以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以减少贸易壁垒为名义,对凡是阻碍全球市场经济的法规、政策、习俗都可以进行变更,或者允许重新讨论。”^②

最后,还有一件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的新奇事物,即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在1960年代,消费社会充斥着可辨认的物质商品,如汽车、日用品等。本杰明·R.巴伯称这一体系为“麦克世界”——就像麦金托什和麦当劳一样——这是一个由于各种跨国贸易的集中而使生活方式同质化的虚拟世界。巴伯说:“麦克世界体系的推动力不再是汽车,而是欧洲迪斯尼乐园、音乐电视、好莱坞电影、软件包。简而言之,既有客观物体,也有

① 苏珊·伯特:《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作用》,载于《人文科学》1996年9—10月号第55页。

② 《世界化和民主。一个北美观点》,载于《M》杂志1996年3—4月号第16页。

观念和思想。”^①

这一普遍商品化趋势使得广告消费成为社会整合的惟一形式,但同时也强化了那些被忽视的人的被排斥感和侵犯性的倾向。图像和声音的普遍泛滥有助于生活方式的标准化、差异和个性的弱化、态度和行为的趋同以及集体认知和传统文化的消解。但更重要的是,它还修正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在卫星网络下、在联盟和合并企业激增的经济帝国的影响下,在可以把相同的全球亚文化传递到地球最远处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影响下,整个地球在缩小。商品、投资和货币流通领域正逐渐一体化、并由越来越少但越来越强大的垄断者所统治。而且,尽管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社会还是以片断的和相对持续的时间形式存在,即使如此,这种差异也正在被消除。这种“实时”的技术革命加速了物质和非物质的循环流动,从而没有了基准参照点及前后联系。这种时间的压缩使“瞬间”成为惟一有意义的概念。正如雷内·夏尔所说:“空间距离的消除使很多东西失去意义。”新的沟通技术所造成的接近使某些决定性的事物和混乱的形态结束了。

实际上,我们正目睹现实社会的重新展现。因特网是一个好例子。古典的传媒在传播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上是有限的,而因特网却能把它用户运送到所谓的“其他地方”去。因此,麦克世界体系的占领者既能看见世界任何地方,但又什么地方也不能亲临。因特网造就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称它为电子游牧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电子殖民主义。正如耐森·撒尔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追随者在多伦多大学指出的:“因特网的力量最终表

① 《国际互联网络和面纱,同样的战斗》,载于《生活》1996年11月第14期第58页。还可参见本杰明·R.巴伯:《反对麦克世界的穆斯林护教战争》1996年巴黎版。

现在它让整个世界都像北美人一样去思考、去写。”

因此,不应把全球化和简单的国际化相混淆。国际化只是国家为界定国际关系而创造和组织的一种体系。^① 用卡尔·波拉尼的话来说,最好这样来界定全球化,它是从国际经济向真正的全球市场经济的转变;前者被认为是运转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的民族和地方经济的总和,后者则是由统一的规则体系所控制的。^② 全球化所展现的是“互相依赖的增加,这种依赖把世界空间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们实现一种日益具有限制性的统一和整合。”^③ 那些具有控制权的人是外国的或异族的参与者,他们只想设计出自己能从事活动的全球组织、只想排除妨碍他们行动自由的障碍,以便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些新参与者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的自主权、并渐渐地达到独立,从而构建一个单独的大市场有机体。

二、大众的苦难

一旦理解了全球化的确切性质,理解其结果就更为容易。

-
- ① 马塞尔·毛斯已经指出:“国际主义是和世界主义相对立的。国际主义并不否认民族,它适合于国家之间,这是和一个国家相对立的。”参见《民族和国际主义》(1920),载于《全集》第3卷第630页。
- ② 《大转变》纽约1975〔1944〕年版。
- ③ 贝特兰·巴蒂:《世界化和开放性社会》,载于《后天》1996年4—5月号第9页。

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经济不平衡加剧。黑格尔曾经说过,富裕社会也不会富足到可以减少由其制造的大量苦难。今天,贫穷并不是因为物质缺乏,而是因为财富的不合理分配,而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却是由于一种心理和文化思维定势造成的,这种定势除了根据工作和生产来衡量财富外,不去考虑财富的重新分配。

1975年至1985年间,世界总产量增加40%;1950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了11倍,经济增长了5倍;然而,就在同一时期,贫困、失业、社会解体、环境破坏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现在,南半球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北半球的17%。只占世界人口1/4的工业化国家却拥有世界财富的85%。西方七国集团占世界人口的11%,却拥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3。单单一个纽约城所使用的电力竟超过了所有西撒哈拉非洲。在1975年到1995年间,美国财富增加了60%,但却被1%的人口所垄断。一个最新显示的数据表明,全世界358位百万富翁的财富超过了2.3亿最贫困人口集体年收入,几乎与人类一半收入持平。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财富越多,贫穷也越普遍。这驳斥了自由理论的观点:整个社会应该结束从富有者的收益中获利。事实上,全球化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发展,因为它使半垄断又回到市场力量之中。

同样,殖民主义也以其他方式继续存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使高利剥削技术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变得更为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现在要求南方国家把外国投资者与当地入同样看待,消除有碍于他们的工作、环境及健康的任何法律障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结构调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社会不稳定性增加。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的抽逃,这体现出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寄生性。另一方面,凡是拒绝满足其要求的国家,则被忽视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从而最终被驱逐

出国际圈。显然,并非只有南方国家受到这种遭遇。在北方,全球化意味着激烈的跨国竞争,这种竞争通过出口和直接投资方式,正在破坏工资和就业状况。既能在当地生产又能在其他地方生产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是脆弱的,它经不住由资本给低工资和救济金带来的压力。

另外,不断减少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不断老龄化,已经使成本增加。这样就促使企业家考虑将企业重新设在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便宜且最具弹性的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多来自那些非熟练劳动力充裕的地区,因此,在南方,促进了这种劳动力的开发,而在北方,这种劳动力渐渐地被排除出去,从而导致了结构性失业的增加。由于缺少商业机会,一些公司只好从它的竞争者手中夺取市场份额,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水平,但也只能获得其在全球市场中得以生存的关键份额。这就会造成产业结构重组和规模缩小等一系列变更,带来不断恶化的社会后果。

这种错位还只是刚刚开始。在1990年,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家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只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61%。在法国,当前失业率的1%却是由于与新兴工业国家的商业贸易造成的。糟糕的是,这种倾向还有可能继续加强。1970年到1990年间,新兴国家在发达国家的股票交易中拥有的份额从0.7%上升到6.44%;按这种速度推算,20年内将达到55%。

尽管工业革命允许非熟练劳动的一体化,但全球化却倾向于将那些没有某种技能的人排除出去。从资本主义以前的倾向来看,这意味着一种基本的破坏,并使人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所采取的所有社会妥协方案。劳动工资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共同推翻了战后增长期几十年间一直流行的经济和社

会政策。二战后的30年间,也就是福特主义体系达到顶点的时期,为了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资本主义不得不向工业社会提出的社会要求以及国家的某些决定妥协。福利国家就是劳资妥协的历史产物。它是资本为满足一些社会要求而作出的一项策略调整。但全球化破坏了这一社会契约。197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开始将自己从社会关注中分离出来,这导致人们对工资等级体系及社会整合机制的怀疑。

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分离,必然伴随着福利国家与中间阶级之间联系的松弛,而这却是以前几十年支撑社会进步的基础。全球化正在导致一种沙漏社会模式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将掉入社会底层。当金钱在社会更高层的作用得到强化时,中间阶级沦落于一种不稳定的危险状态,这标志着它的解体,而也就是这些阶级,“在20世纪初期不仅创造了资本主义,而且奠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①。二战后的30年间,这些中间阶级联合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整合在一起,从而使社会不平等相对减弱。

然而,今天中间阶级不可逆转的扩大趋势已一去不复返了。结果,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产生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深刻转型。事实上,低层阶级和中间阶级一样逐步瓦解,虽然他们一直都在寻找其已经消失了的传统防御机制。显然,工会已不能给跨国公司施加任何压力,他们在与传统的对手谈判时,不能还像以前那样对国际市场的工资差异起一定作用。

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倒退——退回到一种过度剥削的状态,简直比得上工业资本主义“黎明”前工人运动所遭

① 皮埃尔-诺尔·吉罗:《世界的不平等性。当代世界经济》1996年巴黎版。

遇的状况。尽管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不正确，但他至少看到了资本的垄断必然导致人际关系异化这一点。历史嘲弄了我们。就在共产主义体系坍塌之时，马克思的部分观点不仅被利润的残酷逻辑所证实，而且也被以下事实所证实：就像 19 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每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工人通过几十年的斗争所赢得的保证现在都逐渐成为问题。

三、国家的销蚀

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鉴于国际资本的不断流动性、市场全球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国家政府逐渐意识到其宏观经济行为的可行性已在瞬间锐减。至于通货，其影响几乎为零，因为利率和汇率现在均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根据市场作决定而加以控制。如果某个国家擅自降低利率，那么该国将会立刻目睹货币抽逃到那些可能提供高收益的国家去。同时，中央银行货币流通量已经不及贸易量。1993 年 7 月，法兰西受到投机冲击，仅一天内，法国银行就失去了所有的外汇储备。至于预算，国家也意识到其自由范围的缩小，因为不断增加的公债不允许有任何不合法的刺激行为。最后，关于产业政策，政府无法抵制竞争，只好通过给予资助及特殊财政权利来吸引外商，这样，也就使政府处于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

然而,这些公司并不满足于消除这些障碍,他们还要求法律灵活运用于公司运作。高工资、高税收、过高的劳动条件都会使他们跑掉。结果,“仅仅因为跨国公司考虑到成本,而使任何规则都变成了市场压力的牺牲品”。^① 因此,国家的财政权力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契约性的,国家为了取得较好的优势地位,必须向日益不稳定的资本妥协。艾德华·戈德史密斯解释说:“即使在北方,政府也无法控制跨国公司。如果某项法律有碍于他们的扩张,他们就威胁要离开,而且立即付诸行动。他们跑遍整个地球,自由选择到最好的地方去,那儿有最便宜的劳力、几乎不受法律保护的环境、最低的税收、最多的资助。再也没有必要用国籍来确认他们,也无须为限制他们的行为而投入感情。他们已无法无天。”^② 最终阿德得出结论说:“金融全球化也可以被解释为逃避规则的过程,这些规则是由发达国家通过世界经济规则的多重体系建构起来的。”^③

全球化了的经济对民族国家如此重要,以致他们意识到其传统的行为方式渐渐降低为一种信仰方式。他们面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富人,才发现自己失去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工具即国家疆界范围内的整体发展。由于国家在社会领域内的所有计划性的尝试都会减弱经济竞争力,因此,国家再也无法担当协调社会的历史角色。政治家因此而变得无权,国家也改变了角色。现在,国家作为一个社会调解人,它只能力所能及地管理疆界内的事务。国家的地位已降为一个旁观者,就像一名“法庭书

① 罗宾逊,前引书第19页。

② 《殖民地公司的第二次青春》,载于《外交世界》1996年4月号。

③ 阿德,前引书第1卷第94页。

记员，他只记录在其他地方所作出的决定，而无权作任何决定”。^①

这样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削弱了现代政治的基础之一——国家主权。巴蒂说：“全球化毁灭主权国家，联通世界版图，滥用已建立的政治共同体，挑战社会契约，过早地提出无用的国际保障概念……从此，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尽管外界观念的渗入是缓慢的，但肯定在改变着主权的内涵。”^② 然而，一旦主权概念受到挑战，身份问题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匿名问题就涌现出来。民主原则也受到威胁。国家主权的丧失与民主的削弱直接相关。一方面，全球化倾向于使有损于国内忠诚的多重忠诚普遍化；另一方面，一旦统治阶级不再有调解资本需求和社会需要的手段时，它的民主合法性就受到怀疑。另外，货币的自由流通也限制着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民主控制，这是因为这些政策受到政府再也不能忽视的外在压力的影响，因为决策权已经转移到全世界无数经济参与者手中。这样，公民身份已变得毫无意义，人们甚至怀疑“掌权”究竟意味着什么。

① 理查得·佩特雷拉发表在《外交世界》(1995年5月号)上的文章。关于全球化如何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还可参见科尼斯·奥玛的《无边界的世界》(纽约：哈佩·柯林斯，1990年)；文森特·柯伯的《正在削弱的民族国家》(1995年春季卷)；科尼斯·奥玛等的《正在卷入全球经济：新世界秩序成为可能》(1995年剑桥、MA：哈佛大学出版社版)。

② 《全球化与开放社会》第9页。

四、现代主义的结束

全球化不再是欧内斯特·荣格所说的“普遍国家”^①，而是由“红星”和“白星”即东方和西方的进一步融合而构成的。全球化是现代化的结果，是为寻求每个社会在世界市场的整合而采取的一种结构调整形式。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反映了源自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的危机^②。但这种反映只存在于使市场经济实体化、把所有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和增加科技力量的过程中。现在普遍认为，科学可以理解任何事物；技术知识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市场可以购买任何东西。而事实并非如此。波拉尼曾经预言市场将破坏社会。这一天已经到来。亚当·斯密认为应能缓和人类关系的“软贸易”却把战争移植到了贸易的中心。经济的支配性、私人事务的隐秘性都会导致社会联系的解体。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的解除管制使得各种文化只具有最低限度的共同特征，即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荣格 30 年前指出：“不戴有色眼镜的人会因为逐渐增长的巨大同一性而感到吃惊，这种同一性不仅仅表现为有竞争力的某个强国的垄断性，而且

① 荣格暗示：“红星和白星之间的差异只是伴随地平线上的这颗星升起时所发出的闪光。让它升上天空，让一体化展现出来。”参见《普遍国家》（1962 年巴黎版）。

② 居斯塔夫·马西亚：《怎样对世界化作出反应？》，载于《后天》1996 年 4—5 月号第 6 页。

作为一种全球的生活方式逐渐地扩展到所有国家。”^①“全球化对当代社会的冲击是厌恶差异的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结果,尽管自由主义表面上看并不反对差异。自由主义暗含的做法是:通过市场使世界同质化,从而消除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富足社会的来临不能容忍文化渣滓和社区成员资格的存在。最高纲领派的慷慨的做法是为了消除任何性质的差异,因为差异有碍于大市场和社会和平。实际上,不仅仅文化垃圾太多,而且社会本身就是这样……西方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基本上是以整个市场的普遍的一元文化特征为基础的。”^②

但是,全球化也不具普遍性。在某些方面,全球化甚至是普遍性的背离,因为它所普遍化的惟一事物就是市场,即与某一具体文化的历史时刻相对应的经济交流模式。在这一点上,全球化只是正在扩展而遍及整个地球的西方市场的帝国主义化过程,这是一种由全球化的受害者使之内在化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是对西方经济行为的大规模模仿的结果。这等于就是使整个地球将市场作为一心追求的目标,这里的神学家们和高级神父

① 居斯塔夫·马西亚:《怎样对世界化作出反应?》,载于《后天》1996年4—5月号第34页。

② 英格哈德:《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第199、250页和256页。“在财富、才能等方面的差异是不可抹杀的,个人变成绝对的相同是必须的……这种偶然的差异的缺乏是不可忍受的,在新古典范式中是潜在的。换句话说,我的事情必须是独立的,并且不去和我的邻居们作比较……这种差异的缺乏,它以个人选择的绝对可分割性而告终,它是和文化的否定相联系的。实际上,所有文化或公有社会的属性等于是减弱个人对作为群体的部分的喜好。”同上,第251、256页。

们好像只为一个目标而工作,这就是利润率。^①这并不是“存在”的普遍主义而是“具有”的普遍主义。这是被分割的世界的抽象的普遍主义,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只是通过他们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而得到确认。资本主义企图在共产主义失败之处取得成功;想创造一个没有边界的地球,由“新人”来居住。但是这种新人不再是工人或市民,而是“组合式”的消费者,他们仅通过因特网或超市联接,并具有无差异人性的共同点。

扎基·拉伊迪写道:“葡萄牙作家米格尔·罗尔加曾经把‘普遍’定义为‘一处无墙的地方’。他的意思是说,除非人们已经在一个真正的固定的地方建立了联系,否则无法促进和保障普遍性的价值。然而,全球化创造了一种反向的力量。面对全球化,个体有一种被驱逐感。他们无力地倚着墙,显得虚弱和可笑。”^② 在心里层面上,由于机械占绝对优势、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以及越来越重的压力,个体感到被剥夺——有那么多因素使他们再也无法坚守自己的立场。当个体比以前感到更孤独、感到自己被抛弃时,当大世界观注入他们的思想中时,所发生的一切,只会更加强这种“空虚”的感觉。拉伊迪说:“全球化奇妙地再生产着被感染和恐慌所控制的大众的弗洛伊德式的机制:感染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化产生的一致性和一致点而造成的;恐慌是由于每个人面临超越自身理解力的机制而造成的孤独感所致。”所以,全球化就好像是一个拆散世界的谜。全球化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菲利普·朗松:《作为忏悔神学的经济学》,载于《解放报》1996年6月3日第3版。

② 《什么是世界化?》,载于《解放报》1996年7月1日第6版。并参见扎基·拉伊迪:《丧失感觉的世界》(1996年巴黎版);《论世界化的教育学》,载于《后天》1996年4—5月号。

不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想像,而且排斥任何关于世界的描述。公众宣称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他们无力对全球化进行抵制,哪怕是象征性的。“全球化问题根源于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与一个没有标识的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这两个世界的辩证关系解释了‘意义’危机,而且强化了我们对这个无序世界的理解。”^① 这使人联想起佩吉在他去世之前的1914年所写的:“现代社会中没有人是幸福的。”

全球化越发展下去,社会就越想重构他们的个性。但他们很难那样做。一些人只是胡编乱造;另一些人却想为这个每一件事物都将变得纯粹外在的世界人为地设计一个内在尺度。由于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挫折,许多人采取了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的行为,这种行为必然导致民族统一主义和对外国的畏惧和憎恨。结果就像本杰明·R.巴伯所形容的“反对麦克世界的穆斯林护教战争”。^② 一方面,正在走向同一化的地球逐渐被市场和全球交流而同质化;另一方面,在“穆斯林的护教战争”这个合适的名称下,地球被重新组合,穆斯林的护教战争是个性的突然发作和侵犯性的种族或宗教宣言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引发了各地的国内战争和部落冲突。^③ 那种个性的突然发作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只不过

① 《论世界化的教育学》第4页。

② 《反对麦克世界的穆斯林护教战争》。

③ 这些是导致萨缪尔·胡廷格顿的论文中的震动性的反应,这是由于世界正走向文化或文明的战争。参见《文明的毁灭?》(载于《外国事件》1993年夏季卷);以及《文明的毁灭和世界秩序的重新制定》(1996年纽约西蒙和休斯特版)。这篇论文不应该全信,因为文化决定冲突的特性,而不是冲突的具体条件决定文化的作用。参见潘纳若蒂斯·孔迪利斯发表在《法兰克福总汇报》上的文章,转引自《国际信使》1996年10月10日第42版。

是全球向“开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太多开放不可避免地导致太多的封闭。因此，部落制、氏族制或种族中心主义的重新出现可以解释为对被剥夺感的一种绝望的反映。

上述两种行为互相怀疑对方的借口，因此谁都无法维持下去。用巴伯的话说，把二者都看作是全球化的副现象，他们互相强化和印证对方，这样会更公正些。这样做，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过激行为转向外界而改变自己；用同样的方式，普遍化经济的强制而逐渐产生的不平等将最穷的人推向了极端主义。然而，一旦种族宗教战争结束，麦克世界的旗帜就会更加强有力地重新插上阵地。更重要的是，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在许多方面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同样都具有集权主义倾向，但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他们都图谋消灭各种形式的民主和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最后，人们只会对下述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原教旨主义者的运动一方面以传统价值观念的名义拒绝现代西方思想，另一方面又向西方的各种技术和文化产品开放，他们听CNN、穿牛仔服、喝可口可乐。

因此，两极相通。早在1920年代，俄罗斯语言学家尼古拉·S. 特鲁别茨科伊就指出了世界主义和沙文主义之间的似非而是的关系。他写道：“为了认识到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人们必须把沙文主义和世界主义视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其实二者是同一现象。”^① 他补充说，世界主义只是否认基于某一具体模式的人性观点上的民族差异；它只是通过使某一具体的文明模式普遍化，从而使文明化的人性形成一个单独的实体，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明无疑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最完善的阶段。“因此，沙文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有着相似之处……差别只是沙文主义者比世界主义者所考

① 《欧洲与人道》1996年马尔达加版第47页。

虑的种族群体更小。”^① 但是,两者都只相信一件事情:“与自己类似的是最好的,比任何不同于自己的都更好。”^②

五、面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应:主权欧洲统一体

很明显,不可遏制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增长并不是当今危机的惟一结果,而且,为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各个层次的规则是必需的。首先,可在国际层面上对金融市场规范化。最早由托宾提出的向金融货币收税的运动正在进行中。世界货币运营的0.05%的税收会减少许多短期的投机经营,而且每年增加1500亿美元的收入,是目前国际援助资金的两倍。因此,这样一笔钱可以用来设立一项社会保护或环境保护基金。同时,预想一个与现在实际存在的任何一个组织都不相同的国际组织来管理世界经济也是可能的,这个组织的任务就是实行全球化利润的实质性的重新分配,以使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得到一些好处。英格哈德提出设立世界货币。全球浮动资金的设立是重新回到一种稳定的国际价值标准,这将明显阻止主要由贸易差别而产生的投机。

如果“全球化现象被看作是经济对社会和政治的报复”,^③ 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对全球化的经济反映仍然很不够。问题在

① 《欧洲与人道》1996年马尔达加版第49页。

② 同上,第65页。

③ 阿德,前引书第1卷第62页。

于如何弥补以下差距：一方面，世界经济大肆扩张，另一方面，却没有能够对付这一现象的组织。如果政治必须控制和规范经济，那么全球经济因此而面对的必须是世界水平的政治。换句话说，一旦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政治是不是也应该如此？不幸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只是白日梦，它产生的问题会多于它能够解决的问题。^①

同样，使民族国家对抗全球化将会犯双重错误。第一，因为全球化把同质化过程传遍了整个地球，在过去，国家官僚已经在民族水平上完成了这一过程。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因为现在的民族国家在互相介入和互相决定的层次上运作，而这完全是由于全球化造成的，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民族国家由于常遭超过自身能力的外界的束缚，因而再也不能够依靠自身解决全球问题。那种认为民族国家还能够决定它的边界对金融流动是开放抑或关闭的想法，那种认为有可能重构一个整合社会，这个社会是由可将它的居民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的墙所保护的，要么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要么是一个谎言。^②

政治欧洲以及更宽泛地，许多大陆集合体的区域化，都能有效地应付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并不是一剂治百病的万灵药（因为通过直接投资参与进来的国家有可能在自己国家内部与外国

-
- ① 参见达尼洛·佐罗：《世界政府的前景》1995年米兰意大利文版。
- ② 抵制全球化并不一定暗示民族国家特有的边界的重新肯定。许多特殊的社会动力都是和边界性相对立的。人们只需考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个例子，它向各个民族提出挑战。从这个角度看，由于同时受到全球化和完全忠于一个制度的新形式的威胁，民族国家或多或少以一种过时的同一性而出现。参见贝特兰·巴蒂：《在世界化和民族地区主义之间》，载于《人文科学》1996年5月号第22—25页。

跨国公司竞争,而这总是有风险的),但它能够对足够大范围内的市场需求作出反应,同时建构起足够大规模的一极来应付世界金融流动。根据人口和全球购买力计算,欧洲的经济空间是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一个欧洲的政治权力机构,能够控制和协调货币及预算政策,它的存在,使得放弃政治而并不放弃社会保护变得更为容易,尤其是当外部发展不利于内部增长的时候。同样,明智地采用统一的货币能够减少美元的特权,而且也逐渐变成权力因素和重组主权国家的因素。

但是,为建立一个真正的统一的主权欧洲的努力仍然是必需的吗?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一次更大的决策能力,而不仅仅意味着建构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空间。今天,事实几乎不是这样。欧洲制度就像推进全球化一样能够很容易地抵制它。目前,欧洲共同体的行动并不是以真正的欧洲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其成员国使欧共体的行为对自己施加影响。^①另外,日常生活依然是地方性的,只是在这里政治家还能够看见他们制定的政策的效果。面对贸易的全球化和符号的普遍化,这一浪潮消除了所有的差异和价值,所剩的只是形式上的独特性:语言、文化和其他的社会联系都必须日复一日地耐心地重新建立。英格哈德把“政治的恢复”描写成“慢慢地伴随社会和文化的重构,而且,反过来也是这样。但是,只有把文化看作有创造力的张力而不是静止的力量,它既是意义的载体也是加深生活艺术的过程,这时,上述两者的作用才是可能的”^②。最近,吉姆·鲍吉拉德重申:“所有值得称为文化的都在

① 参见阿尔莱特·多阿特:《欧洲组织。是阻力还是加速因素?》,载于《后天》1996年4—5月号第44—45页。

② 英格哈德:《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第365页。

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中丢失了自我。凡是将自己普遍化的文化都失去了它们的独特性并且死亡了。那些因为用暴力而使之同化的、被我们所毁坏的那些文化就是这样；而那些自称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也是如此。”他补充说：“今天，反对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反对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是至关重要的。”^①

(周红云 译)

^① 《世界性和宇宙性》，载于《解放报》1996年3月18日第7版。

战后的全球积累和资本的跨国化*

塞拉斯·比纳 贝扎德·亚格梅安

从本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就一直是不断引起争论的主题。早期争论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政治实践的需要和为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寻求恰当的解释。^① 后来,资本的进一步国际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又给这一争论增加了新的领域。老牌殖民主义的根除和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战后争论的主要焦点。这些新的民族国家就被统称为第三世界。^②

本文译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2卷,1990年第1期。

-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39年纽约国际出版社版;卡·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载于《新左派评论》1970年第59期;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73年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版。
- ② 伊·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革命》,载于《理论和社会》1989年第18卷。

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结构在不断发展,各个国家的内部发展又具有其独特性,再加上这两者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第三世界在战后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在资本主义全球发展过程中一直充满着内在矛盾,它表现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国际劳动分工的每一发展阶段都依次产生敌对力量,它们力求调整旧的国际劳动分工,建立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国际因素与地区(民族)因素的对立统一带来了许多变化,前者回应全球积累的直接需求,后者则对各个国家内在动力的要求作出反应。

在战后初期,一方面,存在着生产国际化的明显增长,存在着超越民族国家疆界以及在世界市场上重新安排生产地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则在与殖民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经济问题作斗争,因此,进口替代就成为一种被普遍采用的发展战略。

通过生产全球化,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第三世界被进一步整合进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然而,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逐步消除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制约之时,也就是它开始创造自己的桎梏之日。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转变始终具有极大的复杂性,站在正在形成的全球社会关系的立场上看,就更是如此了。战后第三世界的变革意味着,现代的全球经济已经在质上超过了殖民世界体系时期,在后者中,“中心”对边缘的政治军事统治是全球关系存在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在现代全球体系中,经济关系的影响取而代之,居于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增长和快速工业化以及7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为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讨论带来了新的议题、新的观点,如哈里斯的“第三世界的终结”,^① 兰德伯格的“依附性工

^① 尼·哈里斯:《第三世界的终结》,载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衰落》1986年纽约企鹅出版社版。

业化”，^①巴伦尼的“成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等。^② 传统发展理论赞扬的是新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认为这是新古典理论有关贸易与发展论述的胜利，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失败。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在资源配置、确定产出和价格上长期依靠市场力量，发展中国家是能够承受住高增长率的。^③

对战后国际发展和新工业化国家经验的这种新古典分析遇到许多挑战。我们认为，虽然新古典分析严格运用数量经济学，但它仍是一个空壳，这一理论极为贫乏。它是非历史的，看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古典范式天真地运用了比较优势理论，^④ 这种理论是为了论证殖民贸易时代的正当性而建立的，它与维护英国在 19 世纪世界市场中的霸权有关。新古典范式强调要运用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这反映了它对一种充其量只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短暂时期的积累制度的忠实信奉。总之，新古典范式没有理解作为一种全球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现象，^⑤ 也没

-
- ① 马·兰德伯格：《第三世界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制造业帝国主义》，载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79 年第 2 卷第 50—63 页。
- ② 查·巴伦尼：《南韩的依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理念的运用》，载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3 年第 15 卷第 43—70 页。
- ③ 安·克鲁格：《关于增长的贸易战略的影响》，载于罗·巴尔蒂文和大·里查森编著的《国际贸易和金融》1986 年波士顿小布朗公司版第 216—227 页。
- ④ 大·理查德：《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税制》伦敦登特和萨斯有限公司版。
- ⑤ 贝·亚格梅安：《资本国际化和伊朗的经济危机》，载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8 年第 20 卷。

有理解国家在现阶段世界经济中的必要作用。^①

下面,我们将在资本国际化理论的框架下,对不发达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提出另一种解释。与新古典理论^②和激进的发展理论^③不一样,资本国际化理论^④使我们能够在资本环境和资本的内在动力这样的范围内研究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我们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战后生产资本的国际化 and 超越国界的生产全球化带来的结果。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是资本国际化成熟时期的两个阶段,而不是两个可供选择的互不相干的发展战略。在进口替代型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的国际化都是通过国家广泛干预经济再生产而实现的。

今天,对一套适当的分析方法的需求,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关于跨国经济一类的复杂发展的研究中那样重要。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由于各种理论家都在试图寻找一种范围广泛的、有可能把握民族国家与全球经济组织联系的理论框架,上述的需求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考虑到上述有关情况,我们坚持认为,诸如国民经济这样的

① 大·艾文斯和帕·阿里扎代斯:《贸易,国际化和无形的手》,载于《发展研究》杂志 1984 年第 21 卷第 22—46 页。保·斯特顿:《冷观外向型发展战略》,载于罗·巴尔蒂文和大·里查森编著:《国际贸易和金融》1986 年波士顿小布朗公司版第 222—233 页。

② 贝·巴拉萨:《世界经济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1981 年牛津波哥蒙出版社版。

③ 萨·阿明:《不均衡发展》1976 年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版。

④ 克里斯蒂安·帕尔洛克斯:《资本国际化和社会资本流通》,载于胡·拉狄斯编:《跨国公司和现代帝国主义》1977 年纽约企鹅出版社版第 63—88 页。

自主性结构,不再能被作为分析和理解民族国家和全球积累这种复杂统一体的出发点。因此,传统理论所持的民族国家和全球经济是互相排斥的观点,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来讲,是一种误导^①。

我们认为,从所谓的原始积累到资本积累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恰当历史分期是成功分析国际资本主义的关键。如果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确超越了国界,那么对资本从法律到实际的流动之研究就需要适当的历史分期,对现代资本主义近期历史发展的分期,使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在国内和国际都存在的不均衡发展,使我们能够发现用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去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存在的不足。因此,为了分析全球经济的动力,必须将资本国际化理论与有益的历史分期法紧密地结合起来。

用于分析世界经济的资本国际化研究方法是关于资本积累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对资本范围的确定,这一确定表明,在全球经济中,生产和交换领域是统一的。资本国际化研究方法只是要分析战后全球经济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全球经济之前存在着旧的殖民世界体系,这种全球经济的特点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社会关系的全面的再生产。全球资本并不是现有的、不停地在全球范围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个国家的民族资本的代数总和,而是一种有机的、超国家的、生产的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过程。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转变,也都是充满内部矛盾的不均衡的发展过程。要分析全球经济,就必须分析这些矛盾,分

^① 大·戈顿:《全球经济:新的大厦或正在崩溃的基础?》,载于《新左派评论》1988年第168期。

析它们的演变过程及其后果。我们认为，资本国际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和理解这些矛盾的有益的理论框架。

资本国际化和战后全球经济研究概论

战后国际劳动分工的前提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发展过程：

(1) 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2) 为了扩大再生产而形成的金融资本以及信贷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3) 随之而来，通过跨国公司这一媒介而出现的全部资本流通的国际化和生产的全球化。

要想使资本实际上成为全球性存在物，就必须使各种形式的资本在国际上流通。生产资本的国际化是国际化的三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顶峰，这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商品资本的国际化、货币资本的国际化和生产资本的国际化。

工业资本流通的国际化，是 19 世纪后半叶一系列既相互联系又彼此促进的发展进程带来的结果。其中包括资本的积聚和集中，银行业和制造业股份公司的形成；信用制度的扩大及其对资本积累作用的日益加强；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资本的形成——大银行的金融资本与庞大而集中的工业企业的资本互相交织在一起。金融资本的出现及其全部流通的国际化是特定的历史发展状况，它们给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影响。

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流通的国际化,代表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我扩张过程的不同侧面。商品贸易在世界市场发展的前提下与商品资本流通的国际化,是资本国际化的第一个阶段。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立场来看,资本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伴随着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尽管在西欧和其他地方,许多民族国家的积累过程一直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基础的。在早期的相对优势理论中得到生动论证的殖民贸易(即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世界的前资本主义地区进口原材料,再将工业消费品出口到殖民地),实际上是那个时期世界贸易的主要特征。

到19世纪末,大部分货币资本的流通国际化了,生产资本的流通也开始国际化了。早期货币资本流通的国际化主要是以向殖民国家发放贷款的形式出现,但不仅限于此。货币资本输出到不发达国家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加强了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主要动因,促进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向资本主义转变。因此,货币资本的输出虽没有导致殖民地发生质变,但它为殖民地向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完全一体化过渡创造了条件。

商品资本流通的国际化是与世界贸易的增长和在世界市场使价值兑现联系在一起。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国际化,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出现相联。早期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主要是通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跨国公司,在前资本主义经济的采掘和初级部门中的扩张而实现的。随着跨国公司在制造业中的渗透,特别是在二战后的发展,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大大加强了。跨国公司直接控制了世界上许多劳动过程的复杂网络,因此,往往通过生产资本的流通而在全球剥削劳动者。

商品资本输出本身并没有使不发达国家产生社会经济变

革。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变革对资本输出国实质上并不重要。不发达国家进行彻底的资本主义变革并不是这一阶段商品资本输出的必要条件。在这一时期,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外国商业资产阶级的联盟,使得这些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保存,而且常常还得到加强。

尽管商品资本的国际化并没有使殖民地产生资本主义变革,但它在某些时候有助于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以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为例,总结了这一矛盾过程: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①

马克思关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评价,是对殖民制度的“进步”或“阻碍”作用进行重大争论的根源。有些人因此着重强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作用,有些人片面强调它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殖民主义的两面性。

在殖民时期,在资本国际化的早期阶段,国际劳动分工是为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实现和扩大再生产而服务的。在相对优势理论的思想原则基础上,发达的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在商品生产和输出上实行专业化。在这一阶段,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入自然而然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和巨大赤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8—771页。

许多原材料进口国面临着官方储备和可兑换货币的短缺,被迫向国际货币市场借款以便为进口提供资金。结果这些国家遭受贸易赤字和外债的双重困扰。

50年代初期,不发达国家反对现存国际劳动分工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一个著名的观点是联合国发展理论家罗尔·波里毕奇所提出的。^①他的核心观点是,不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是现存的国际贸易关系造成的。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鼓励国内生产可以替代进口产品的工业制成品。波里毕奇在联合国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旧的殖民国际劳动分工的反抗具体化了。虽然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早就试行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但也只是偶尔为之,把它作为一种完全成熟的战略在全球范围内运用,那是二战后的事了。

从表面上看,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包含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倾向。它既代表了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阶级利益,也是国际资本对生产的全球扩张的一种早期反应,它导致资本在所有重要领域的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反映了具体社会经济斗争的对立统一。不发达国家的新兴资本主义力量既要反抗正在衰落的前资本主义阶级和生产关系,又要同国际资本进行竞争。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成为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积极追求的一种战略,他们用它来保护自己工业品的国内市场,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还被人们视为利用国家机器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战胜其他资本,以便在殖民时代以后建

^① 罗·波里毕奇:《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它的基本问题》1950年纽约联合国经济事务署版。《不发达国家的商业政策》,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59年5月号。

立“独立的国民经济”的有效手段。因此,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实际上是国内和国际的阶级决斗在经济上的表现。

但是,另一方面,进口替代计划只有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介入才能实行。部分原因在于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不发达,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部分原因在于国际资本具有霸权地位。因此,不发达国家对实现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需要是由生产的国际化来推动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是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扩大的早期形式,它使跨国公司能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新资源,并且向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网络迈进。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必须由相互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力量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资本力量来推动。

初始的和全面发展的全球资本主义

要想全面了解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人们必须承认其历史前提的重要性。这一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远再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需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这种积累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点,它具有自我约束性。因此,“原始的”或者说最初的积累,无论是其早期的形式还是其在 20 世纪的发展形式,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

和劳动力为前提。……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① 不了解原始积累对 18 和 19 世纪先进国家的国内经济以及这些国家的殖民地的广泛影响,就无法全面把握早期经典原始积累的奥秘。资本对先进的殖民国家(即欧洲)的国内社会关系以及殖民地的控制,为商品资本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全球化的立场上来看,这时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形成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实际上是经典的原始积累的起点,它在资本主义早期与殖民世界市场的形成紧密相关。在殖民地,当资本还没有控制生产方式,还屈从于居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时,那里首先出现的是劳动对资本的一种形式上的从属。商品资本的国际化在这方面往往决定着殖民世界市场的特性。正像马克思所说: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 17 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②

随着生产资本国际化,社会资本的全部三种流通形式就都国际化了。国际化的这一阶段是劳动真正实际从属于资本的起点,它奠定了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如马克思所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3 卷第 781 页。

② 同上,第 819 页。

“如果说剩余价值生产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那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①

这种实际从属正是现存社会结构对资本的社会关系的彻底从属,它表明资本历史性地控制了“劳动的客观条件”。

全球性原始积累的发达阶段与其早期不同,它与生产资本的国际化紧密相联。这意味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出现了全球化倾向,这是跨国的(不同于国际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性。考虑到20世纪初期,尤其是战争时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出现的资本主义的零星发展,这一点就具有了重要意义。但是,战后在不断增多的后殖民国家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变革,它表明生产资本的国际化程度加强了。对实施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以及后来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起促进作用的、由国家支持的范围广泛的土改计划,再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出现的跨国资本的“互相渗透”,构成了这一时期全球社会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全球统一体的这一转变,实际上对民族国家的性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这一方面,正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强制土改计划,构成了上述全球转变的起点。马克思在谈到早期“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时指出: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而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06页。

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①

总之,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可区分为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首先是所谓的宗主国的早期原始积累。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发展借以进行的起点,它和殖民贸易一起与商品资本的国际化相对应;随之而来的是货币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化。上述这些变化出现在民族国家的疆界内,这些民族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内的社会再生产,正是这种民族国家的机制使萌芽形式的全球资本内在化。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原始积累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被整合进当代跨国经济之中。此时,伴随着生产资本国际化,社会资本的全部流通形式都被国际化了。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就属于这一历史阶段。相应地,民族国家的性质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资本特性的转变相关,资本已从萌芽状态变成极为发达的全球化。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具有的自相矛盾的全球性也就随之出现了。

生产资本国际化和所谓的原始积累

生产的国际化导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改造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趋势加速。生产资本的输出和全球范围的积累,要求不发达国家进行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化的结构性变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高级阶段,广泛消除不发达国家内前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784页。

障碍,包括进行阶级关系变革,是全球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因此,不发达国家完成其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以各种形式并最终以一种社会关系进行全球扩张的必要条件。

生产资本国际化的前提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商品化。所谓的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这一过程一方面造成了农民、工匠和其他一些小商品生产者趋于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又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剥夺前资本主义各阶层的财富。马克思认为,这一历史过程为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障碍:

“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②

资本主义出现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③因此,所谓的原始积累既使直接生产者无产阶级化,又形成新的资产阶级。

原始积累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这一过程“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④在战后,这一不均衡过程的一个重要变种,就是不发达国家实行的各种各样的土地改革政策。战后土地改革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加剧了不发达国家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趋势,这反过来又为新兴的进口替代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783页。

② 同上,第7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7—34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784页。

大多数这类改革的实施都应该把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不然的话,它们会影响到有关国家的经济和各项政策的稳定。这就是战后的土地改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上而下通过强制措施完成的原因。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土地改革计划的完成,都是由历史上落后的政权进行的,与此同时,还受到强有力的和居统治地位的那部分国际资本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如美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战后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它试图加速广泛的全球原始积累,以便为在世界范围内实施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工业化创造必要的社会经济前提。

我们不主张把土地改革以及它们的实施方式,说成是20世纪原始积累的一种普遍方法。我们不想给读者留下一种我们在追求普遍性理论的印象。但人们必须意识到二战后所有土地改革计划以及它们的共同特征具有的近乎世界影响。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实行形式上的和国家发起的土地改革,这种所谓的原始积累也完成了。在某些殖民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是由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国家的帮助下,通过剥夺土地(把公有土地圈为私有)来完成的。在那些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方,改革的结果在许多方面也有所不同,如农民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封建和半封建地租制度的破坏(或残存)程度,在农村引入资本主义农场制度的重要性等等。这些不同之处反过来对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

18世纪和20世纪的原始积累,分别构成“全球性原始积累”持续过程的早期阶段和高级阶段。原始积累的早期阶段与商品资本的国际化及世界市场的早期发展相适应,而高级的原始积累时期则与资本的所有流动形式的国际化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全球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从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 转变及其不均衡发展

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变革过程始于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恰好处于生产资本国际化和国际市场形成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往往主要依赖于全球生产。在大多数时候,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总的趋势,一直是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前奏,后者是生产和交换国际化的更普遍的高级发展阶段。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为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反过来又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直接面向世界市场的生产创造了条件。

从总体上讲,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经济困难。发展中国家认为,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会在国内经济各部门和各分支之间建立彻底的紧密联系。但事与愿违,总的看来,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未能产生出人们所期望的部门内部以及部门之间的联系。通过削减进口和进口账单,发展中国家曾把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看成对付国际收支困难和外汇短缺的有效手段。但事实与早期这种乐观的期望正好相反,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却进一步全面恶化了国际收支问题,它只是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成分,导致了对资本输入需求的相对增大,其中包括中间产品进口。因此,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在加速向资本主义变革趋势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基本经济困难普遍复发,正是这些困难曾一度使得进口

替代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发展战略。

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问题,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更加“外向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新的热情,这种战略似乎能够通过出口制成品来消除外汇短缺现象。因此,在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取代了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促进出口不仅只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我们认为,一直争取创建一个真正一体化的全球生产网络的跨国公司也对出口市场进行了新的定位,并重新产生兴趣。

本质上讲,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受制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规模。这一事实本身对全球范围的积累构成了障碍,必须用世界市场的真正统一来克服它。因此,资本的全球扩张趋势需要把世界市场进一步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统一网络中。在这种意义上说,出口导向型工业就是国际资本对国内内在需求的回应。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战后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国际化、工业化和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例外。在有些国家是迅速的进步,在有些国家却是持续的经济落后。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最初起动、发展的深度、持续的时间以及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转变,都有极大的差别。

在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外国投资、借贷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全面介入所起的作用也极为不同。一般认为,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期间,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到外国货币资本(贷款和援助)和生产资本(外国直接投资)的强有力支持。^①就韩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有些人认为外资(主要是日

^① 斯·格雷菲斯-琼斯和伊·罗戈里兹:《私营国际金融和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载于《发展研究》杂志1984年第21卷第47—73页。

资)起了主要作用,^①另一些人则认为本国资本的作用相对来说更重要。^②在韩国,1953年至1962年期间,全部进口的70%是由外资援助的。韩国还把外国贷款作为工业化的一个资金来源,到1984年为止,韩国已借了数额高达467亿美元的外债。1953年至1962年间,台湾从美国以外援方式获得的货币资本,占全部11亿美元外资的85%。^③在工业化早期,许多亚洲国家都从日本的直接投资中获取主要资金。在土耳其,在促进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转化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了关键性作用。在那里,这个俨如“世界性国家”的机构与少量的本国资本一道引导着“民族经济”的发展。

我们认为,尽管存在着上述差异,但无论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还是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实行“正确”或“错误”政策的偶然结果。与之相反,我们认为这两种战略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普遍的、统一的发展趋势的必要组成部分。资本所有流通形式的国际化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正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是这一独特历史进程的两个转折点。

尽管二战后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不均衡的,它在第三世界逐渐导致了经济分化,但也发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重大变革。考虑到我们对资本国际化和原始积累过程的讨论,我们

-
- ① 克·汉密尔顿:《南韩的资本主义工业化》1986年纽约西视出版社版。
 - ② 参见查·巴伦尼:《南韩的依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理念的运用》,载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3年第15卷。
 - ③ 史·哈格德和陈:《国家和东亚新工业化国家的外资》,载于《亚洲新工业化政治经济学》1987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版第84—135页。

认为生产的国际化使第三世界内部出现了向资本主义变革的趋势。这些变革的深度和形式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变革都导致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结构残余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是这一结构的特点。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遇到的障碍的相对重要性的也各不相同。这是对资本主义本身不平衡的附加因素。这种复杂性是跨国资本和全球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显著特征。

与一般共识(在正统经济学家中特别流行)不同,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都是建立在进口替代时期形成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国家对市场的不断干预之上的。在众多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中国家里,南韩、巴西、土耳其和印度是典型的例子。在另一些地方,如香港和新加坡,工业化是由一种促进出口的全面政策直接推动开始的。在出口导向优先于进口替代的国家里,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与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体系不同程度地并存着,它导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不同的地方,促进出口的具体形式、出口商品的成分和整个经济面向出口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在香港、新加坡、南韩,出口生产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在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重要得多。

由于受大量相关因素的影响,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也各不相同。这些因素包括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业基础设施的改进,它们是通过下列途径实现的:(1)进口替代型工业化;①

① 参见保·斯特顿:《冷观外向型发展战略》,载于《国际贸易和金融》1986年波士顿小布朗公司版。

(2)获得国际资本的相对有利机会；^① (3)跨国公司的介入；(4)存在一个国际上值得信赖的、强大的、高压的政权，国家控制着工业的发展。^②

国家和资本积累

二战后，全球积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在经济再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工业化这两个阶段的资本国际化，主要依赖于国家对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干预。与18世纪欧洲的原始积累时期相似，二战后，不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也是在国家帮助和干预下进行的。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干预对组织工业化进程和指导资本积累的必要性也在不断增加。

一旦我们使用全球性方法来研究积累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有必要思考一下国家和全球资本之间的极为矛盾的关系。如果资本不再是民族性的存在物，那么，作为社会再生产媒介的國家的作用就会被迫改变，它可能会使正在形成的具有全球性质的矛盾内在化。这就在国内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跨国经济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两个任务之间，产

① 贝纳菲尔德：《民族发展战略的国际渊源》，参见贝纳菲尔德和戈德弗雷编的《在国际背景下的民族战略》1982年约翰·威利版。

② 赫·史密斯：《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一些历史经验教训》，载于《发展研究》杂志1984年第21卷第1—21页。

生了基本的矛盾。这种矛盾促使民族国家及其传统性质发生变化。

跨国经济出现的重要副产品,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类国际性金融机构所起的新作用。就经济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具有世界国家的地位,它执行的是旨在进行全球资本主义积累和实现全球稳定的政策。^① 针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制执行的国民经济政策和众所周知的那些紧缩措施,目的都只是想通过民族国家的经济增长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自然而然,这些政策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内现有的阶级力量平衡,产生了不同的互相矛盾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紧缩项目来控制工人阶级,而它对资产阶级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却并非普遍一致。发展中国家那些更多地活跃于出口部门的资产阶级,常常受惠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即通过使本国货币贬值的办法);而那些更多地依赖进口的资产阶级则实际上受到损害。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常导致发展中国家阶级斗争的加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不同部分之间的斗争。

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作用比资本主义早期更复杂、更矛盾。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任务就是要在日益具有跨国性的环境中执行“民族”政策。现代国家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发达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是跨越国界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发展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不发达国家,无论是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阶段,还是在出口导向型阶段,民族国家本身都必须推动资本的国际

^① 菲利普斯:《布雷顿森林时代后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载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3年第9卷第1—28页。

化。

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阶段,国家政策明显带有矛盾的二元性。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阶段,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意识形态动机是追求“经济独立”,是为解决与那些非本国的“民族”经济领域相联系的问题而斗争。这种政策同时也是国际主义政策,它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和全球积累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新兴工业的保护完成了双重任务,既发展了本国的民族工业,满足了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要求;又在全球许多地方建立了生产网络,为生产的进一步全球化奠定了基础。由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转变,也具有这种双重性的特点。出口增长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完全整合进世界市场,同时又促进了资本国际化向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它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疆界。

结 论

二战后,全球积累是所有流通形式的资本的国际化 and 生产的全球化的结果。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是战后积累制度发展的两个阶段。从总体上来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前提是早期的工业发展,这一发展是通过完成原始积累和实施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来实现的。

随着资本进一步国际化,国家在全球积累过程中的作用也在加强。尤其是国家全面地推动了“全球原始积累”高级阶段的

形成,从而确保了不发达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变革和工业发展的成功。现代国家在执行“民族的”经济政策的同时,越来越多地确保着全球一般资本积累的进行。在这一方面,民族国家为了应付蚕食性跨国社会关系的挑战,已完全超越了自己。

(邵继红 译 王列 校)

全球化与国内经济政策的可能性^{*}

格雷厄姆·汤普森

人们常常十分肯定地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因此,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和实行平均主义再分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已经行不通了。有人认为,面对国际化、新自由主义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主权政府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已经土崩瓦解。其结果是,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计划都受到致命的威胁或者处在根本转变的过程中。

本文不打算对国际政治中新出现的这一立场作出详尽的批

* 作者系英国开放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本文译自《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出版)1997年第2期第161—171页。

判性回答。^①而是把重点放在探讨这一立场的主要思想基础可能是什么上面,放在探讨那种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出现,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以致独立的各国政府在决策方面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想法上面。这种看法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好像正在成为普遍流行的政治观念的一部分。本文所论证的立场并不是认为事物仍然没有变化。实际上,我在后面指出了国内经济性质的最新进展具有某些相当激进的意义,但是这些进展与全球化的过程没有多大关系。这些变化的根源多半可以在国内政治选择中找到,同样,它们的答案也主要是国内性质的。

日益流行的看法

首先,我对所设想的新的全球体系的特点作一概要描述。这样做不是要树立一个假想的易于战胜的论敌,而是要描绘一幅日益为管理层的头面人物、学术界人士、财经方面的新闻记者

^① 在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的《争论中的全球化:国际经济与管理的可能性》(1996年剑桥体制出版社版)和《全球化:十个经常提出的问题和一些出人意外的回答》(载于《调查结果》1996年秋第4期第47—66页)中已经这样做了,本书下述论点的某些内容就是从这两篇东西中引申出来的。但是,在这里,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新的问题和证据上,这些问题和证据没有在其他地方再三重复过,但却对社会民主主义在所设想的全球化趋势条件下的统治方式,提出了具有政治意义的特殊问题。

以及决策人员所接受的坚实而且比较协调一致的图景。^① 有人认为,全球体系是受无法控制的国际金融市场力量驱动的,是受按照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在有利可图的地方寻找资源、进行投资、生产和销售的大型跨国公司支配的。资本正日益成为国际资本,不论其来源国是哪一个。各个国家不可能单独或共同支配世界市场。如果它们不打算做有损其社会利益的事情的话,它们便不得不承认,留待它们完成的职责,只是提高本国经济行为主体的竞争力和尽可能地使自己的领土具有吸引力,以吸引国际上的流动资本向本国投资。因此,“国际竞争力”的说教是全球化说教的天然伴侣。^②

如果这种新的普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不仅将面临着“地理的终结”,^③ 而且将面临着左翼的终结。有人认为,现在连传统的国家公共政策都没有多少机动余地了,更不用说什么激进的选择了。我马上就要对全球经济的特征进行评估,看看证据是否支持目前流行的全球化的论断。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阐明真正的全球体系对于国内政治,特别是对于社会团结一致、平等和公正的政策意味着什么,这些政策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左翼与其他政党的显著区别。

这一论断大致如下所述。全球市场力量无法管理。这就是

① 下文对最近有人重提这一立场所作的批评,参见尼·迪·卡鲁纳拉特纳和克·蒂斯德尔:《全球化及其政策反响》,载《经济学丛》第31卷1996年9—10月号第248—260页。

② 参见格·汤普森:《关于“国际竞争力辩论”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些看法》,为1997年1月9—12日在西班牙马拉加举行的“全球化与欧洲的工业改造”(ESF-EMOT)专题讨论会准备的论文。

③ 参见理·奥布赖恩:《全球金融一体化:地理的终结》1992年伦敦平特—里亚版。

说,除了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外,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它们无法通过本国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来改变增长率或就业水平。社会政策也受到全球化的直接影响和约束。背离国际资本所能接受的最低程度的福利和权益、税收水平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将使该社会失去竞争力并导致资本外逃。

一个社会能够限制诸如高失业和低增长这样不利的宏观经济状况的唯一途径,是使微观经济的基本要素恢复正常。在吸引企业的培训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有限投资将为全球市场所接受;使失业人员更适于雇用,也即更熟练和更有事业心的政策也将为全球市场所接受。因此,留给国家公共政策的任务是促进“合法赚钱”,保持低通货膨胀和使市场更好地运行。宏观经济环境只能通过长期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然运转来改变。公共政策应当顺应国际资本的需要,而不是试图通过改变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来改变经济环境。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任何凯恩斯的遗产和福利国家就的确确要寿终正寝了。对于右翼来说,要活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竞争,无论是作为国家、企业、家庭,还是作为个人都是如此。国家致力于社会团结一致和防范经济震荡的集合再保险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国际资本将只接受最低限度的安全网和干预,以便与市场带动的高效率相协调。从任何意义上说社会民主主义都已消亡。当自私自利的公司精英们和全球市场主宰一切的时候,使资本主义人性化和文明化,以便建立和维持一个没有失败者的市场社会的计划已经废弃。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偷税漏税就成为所有成功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合理的战略。在一个反复无常和竞争激烈的制度中,人们应当保护自己的市场销路和资产。资源必须集中用在

私人自我保险上,以防范一个人能够负担得起的风险,以及用在维持一个人的自身技术基础上。长期忠诚于社会或公司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注定不会得到报答。人们必须独立谋生,如果这包括离开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那也可以。在这个制度中失败的那些人要么是运气不佳,要么是因为懒惰,但是,我们不能不惜牺牲资源去帮助他们。

因此,团结一致和信任将垮掉。社会将不仅因为财富,而且因为市场销路和流动性而分裂。一个大有成就、技术娴熟的精英人物可以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来去自如。他们将变得不仅越来越自私自利,而且在眼界和抱负上越来越超越国家界限。他们既不会与植根于民族国家的大量非熟练人员打成一片,也不会服从他们。这些非熟练人员的工作可以用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的任何地方轻而易举地加以模仿、重复。整个世界将变成像商业阶级的半殖民地一般,他们将享有实际上的治外法权,为了他们的跨国公司生涯奔走在世界主要城市之间。从前人们认为,本国劳工可以从自己的全国精英人物那里得到好处,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因此必须一起干,但这些旧的主张现在一去不复返了。在先进国家,共产党的威胁已经消失了,动员居民准备大战的需要也不存在了。因此,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表达全国工人阶级的忠心并进行谈判时的本钱少得多了。资本可以流动,它的精英人物可以随之流动,劳工却不能。

在这种环境下也有过在一国经济范围内取得成功的情况,但这仅限于以成功的企业为核心的、有国际业绩竞争力的一小部分地区。那些有幸被这些企业雇用的人将获益,并且当一般福利制度失灵时,这些企业会承担福利费用,但仅仅是为企业的核心雇员这样做。其结果将是日益增长的“豹斑”经济,即在贫困和低效率的海洋中建立起财富和成功的本地小岛。如果没

有关于再分配以及至少是对那些失去了就业和福利网的人提供某种再保险的强有力的国家经济指令，没有达到财政和货币目标的长期宏观计划，大多数人的命运就会是那样的。有种种迹象表明，这恰恰是英国和美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情况。这一事实应当特别提醒我们注意防范无论是以道德上的公有社会主张为名，还是以无法控制的全球化力量为名无视国家指令的计划。

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并非新东西

但是，我们如何着手对这幅凄凉的图景作出评估呢？一个办法就是指出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并不是新的东西，因此其中许多问题是以前就不得不面对的。以贸易领域为例。衡量各国经济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一个方法是看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它们的贸易水平如何。表1提供了1913年至1993年间，世界上主要国家经济的这方面情况。也许引人注目的是，根据这一尺度，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时的情况类似。1993年，日本的一体化水平降低了许多，法国、荷兰和英国降低了一点，只有德国和美国提高了一点。人们常常忽略在金本位制的极盛时期，世界经济是何等的一体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一体化程度引人注目地降低了，接着是1950年之后一体化程度的再次提高。正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这一时期，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是热中于全球化的人集中注意的时期，与此同时，他们把金本位制时期忘得一干二净。

表 1:按现行价格计算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出口和进口合在一起):1913—1993 年(%)

	1913 年	1950 年	1973 年	1993 年
法国	35.4	21.2	29.0	32.4
德国	35.1	20.1	35.2	38.3
日本	31.4	16.9	18.3	14.4
荷兰	103.6	70.2	80.1	84.5
英国	44.7	36.0	39.3	40.5
美国	11.2	7.0	10.5	16.8

资料来源:赫斯特和汤普森 1996 年的著作^① 第 27 页(作了修订和更新)。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已经进一步一体化,对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什么疑问,但是,这种一体化的程度如何并不清楚。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要在这个领域中对全球化的程度和范围作出估计,尤其是就金融体系和市场一体化的经验证据而言,依然存在实实在在的困难。在这里有一个轻易(往往是毫无保留和不知不觉地)接受国际货币主义的训诫的问题,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例如,对于个别经济来说,整个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关键尺度仍是国民储蓄与国家投资之间的关系。人们认为,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内投资相对独立于国内储蓄。在一个可以获得大规模国际借贷的世界中,国内储蓄的规模不会对国

^① 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国际经济与管理的可能性》1996 年剑桥体制出版社版。

际投资造成什么国内限制,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国民储蓄与投资比率会越来越脱钩。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资本市场自由化和实行浮动汇率期间,国民储蓄与投资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博斯沃思^①和奥布斯特费尔德^②所作的细致分析,证明了这一情况(尽管其他一些人,例如戈尔茨坦和穆萨^③所作的很不细致的评论有不同的看法)。

在进入金融自由化、国家放松控制和所谓的全球一体化时期很久以后,投资率与储蓄率之间的密切关系仍持续存在,表2对此作了说明,该表包括对金本位极盛时期的估计数字和我自己对1991年以后这一时期的最新估计数字。相关系数越低,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的程度就越高。 β 系数越是接近1,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因此,根据这一方法,正是金本位时期表现出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最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经济不稳定状态,表明了这些年里国民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质,这种情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延续到1974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自由化过程之后,一体化有了提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本身似乎已经松弛下来。从那时起,发展趋势一直是国民经济的自主程度的提高。

-
- ① B. 博斯沃思:《全球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1993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版第98—102页。
 - ② M. 奥布斯特费尔德:《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资本流动》1993年11月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文件第4534号,例如,第50页。马萨诸塞州剑桥,国家经济调查局。
 - ③ M. 戈尔茨坦和 M. 穆萨:《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1993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工作文件(WP/93/95)第25页。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表 2: 储蓄与投资的相互关系:

$$1900-1995 \text{ 年 } [(I/Y)_t = \alpha + \beta(S/Y)_t + U_t]$$

	1900 — 1913*	1926 — 1938*	1960 — 1974**	1974 — 1980*	1981 — 1990*	1991 — 1995***
β	0.774 (0.436)	0.959 (0.082)	0.887 (0.074)	0.867 (0.170)	0.635 (0.108)	0.67 (0.086)
R ²	0.26	0.94	0.91	0.56	0.64	0.75

注:(1)从 1960 年起的数字是指 22 个主要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达国家经济。

(2) β 系数下面括弧里的数字是标准误差。

资料来源: * M. 奥布斯特费尔德:《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际资本流动》1993 年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文件第 4534 号。

** M. 费尔德斯坦和 C. 赫里奥卡:《国内储蓄与国际资本流动》, 载于《经济杂志》第 90 卷, 1980 年 6 月号第 314—329 页。表 2, 第 321 页。

*** 作者本人估计。

这些数字证明金融体系持续强劲的相对自主性, 尽管传统的经济分析家几乎不顾一切地证明与此相反的情况。只要政府继续规定自己的经常项目的指标, 保留在本国境内的某种主权(所以至少政府干预越境资本流动的威胁仍然存在), 投资者就不可能不加区别地考虑国内资产和国外资产。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不同的机构和配置构成的, 对于将来有不同的构思, 对于过去的经验有不同的评价, 因此运行时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所有这些特点都分解为一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期望和看法, 而这些期望和看法不可能全都简化为单一的全球市场地位或逻辑。此外, 即使是最顽固的一体化鼓吹者, 只要他们研究了国民

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多或少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欠发达国家和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仍然处在这种形式的金融一体化之外。因此,即使对于那些热中于一体化的人来说,全球化的程度也是有种种限制的。

表3把注意力集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商业银行财务结构中涉外资产和负债的增长上,它是有可能说明全球化进程的另一项指标。很明显,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方面一直有增长。但是,注意力应当集中在所表现出来的各个国家情况一直存在的差别上。除了瑞典可能例外之外,似乎看不出各国经验之间的多样性有大的减少。

表3:有关国家外国资产和负债在商业银行资产中所占的百分比:
1960—1994年

	1960	1970	1980	1990	1994
法国					
外国资产	—	16.0	30.0	24.9	30.4
负债	—	17.0	22.0	28.6	29.9
德国					
外国资产	2.4	8.7	9.7	16.3	14.9
负债	4.7	9.0	12.2	13.1	15.9
日本					
外国资产	2.6	3.7	4.2	13.9	10.1
负债	3.6	3.1	7.3	19.4	10.3
瑞典					
外国资产	5.8	4.9	9.6	17.7	21.6
负债	2.8	3.8	15.0	45.0	38.6

英国					
外国资产	6.2	46.1	64.7	45.0	47.9
负债	13.9	49.7	67.5	49.3	49.8
美国					
外国资产	1.4	2.2	11.0	5.6	6.1
负债	3.7	5.4	9.0	6.9	8.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79年和1995年。

一直存在的国家情况多样性问题通过表4所提供的数据得到了进一步补充。该表提供了1993年各个国家养老基金账目中外国债券和股票所占的百分比。再一次显示出外国投资股本在对不同国家的重要性上存在着严重偏差。为了能够说明问题,这里对新加坡和香港的数字给予了特别注意。不能认为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香港都已在最近这段时期摆脱了最严格的国际化。两者都具有十分明显的开放经济,都一直是一些类似的全球一体化力量的中心。^①但是前者没有任何外来参与,而后者则有60%。很明显,这一差别是由于不同的政策选择造成的。那些管理新加坡公积金的人决定只在国内金融资产方面投

^① 例如,1992香港和新加坡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52%和279%。这一点与德国(32%)、法国(22%)、英国(25%)、美国和日本(1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平均48%)的比较,见汤普森著《关于“国际竞争力辩论”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些看法》(1997年)一文。因此,根据这一尺度,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要开放得多。

资,而那些管理香港公积金的人则作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虽然新加坡公积金方面可能有某种外部间接渗透^①)。

表 4:养老基金投资的国际化

	1993 年底资产存量 (单位:10 亿美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百分比	国际资产(债券和 股票)百分比
美国	2908.0	45.5	4
日本	1752.7	44.6	14
德国	254.2	13.3	3
英国	726.4	69.6	27
法国 *	199.7	15.5	5
加拿大 * *	162.3	28.2	9
澳大利亚	—	—	16
比利时	—	—	29
爱尔兰	—	—	35
瑞士	—	—	6
新西兰	—	—	34
香港	—	—	60
新加坡	—	—	0

注:* 1991 年底。

* * 1992 年底。

资料来源:《海外投资与英国》,英国财政部不定期文件第 8 号,1996 年 6 月。根据表 A2.1(第 24 页)和表 A2.3(第 26 页)编制。

① 关于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政策的讨论,见 M. 拉梅什:《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国家与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载于《英联邦与比较政治杂志》第 31 卷第 3 期第 111—121 页。

表 2 至表 4 的数字所表明的就是一直存在的国内政策选择的有关情况,即在一定程度上被全球化分析所忽视的东西。我们必须认定,例如,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新加坡,“全球化”对这些选择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受到大体相同的外部压力。这些选择的原因纯粹是“国内性质的”。我认为,在先进的工业经济国家情况也是相似的。正如表 3 所表明的那样,一直是政策选择(和错误)推动了向更大程度的相互依赖和国际化发展,而不是某种神秘莫测的全球化进程。举两位或多或少明确表示欢迎向着更大程度的开放性和一体化发展的评论家的话为例:“在某种意义上,当局遭到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命运。他们想要外国投资者更多地参与自己的政府债务市场,以便使他们为更大程度的财政平衡和对外平衡筹集资金更容易些。他们想要一个更加有效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将削弱地方垄断的力量,向储蓄者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向企业提供更低的资本成本。他们欢迎提供更广泛的抵御不稳定资产价格的可能性的革新,欢迎更便于将风险分门别类处理的革新。他们想要重新获得早已转移到境外中心以寻求没有多少限制的管理环境的经营业务,并扫平同外国竞争者较量的场地。上述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流动资本总库的建立,有没有它的支持往往可以成为衡量稳定化、改革、汇率和税收政策的成就差别的尺度。”^① 难怪这两位作者沾沾自喜,他们说到了问题的根本。虽然本文与他们的观点一致,但这里并没有认为一切只是有关当局的慎重的政策选择或失误造成

① M. 戈尔茨坦和 M. 穆萨:《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1993 年 12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工作文件(WP /93 /95)第 42 页。

的。

对于衡量和评估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其他方法可以作出类似的评论,这些方法是:实物利率趋同,股本价格变动,境外境内收益,抛补或未抛补利率平价,国际有价证券差别等等。我要再次援引戈尔茨坦和穆萨的话:“虽然迄今为止有越来越多的大量著作直接谈到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度量问题,但这些著作已证明,要对一体化的程度——如果不是趋势的话——作出坚定而又明确的结论是很困难的。这种含糊状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一个衡量一体化程度的方法完全克服了给这个问题的解释蒙上阴影的概念上和技术上的难题。”^① 谨慎依然是时下的风气。例如,仍然有理由认为短期利率是由国家确定的,并且从根本上说,即使是长期利率也是由主要国家当局,如美国、日本和德国当局的决定驱动的,而完全不是由全球市场的无名力量推动的。

然而,尤其是对盎格鲁—撒克逊右翼来说,全球化经济的思想是上天赐予的。它的到来恰是时候,从20世纪80年代末冒险主义的货币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造成的大崩溃中挽救了他们的计划。现在它可以声称,劳工必须承认其工资和社会标准是由远东的竞争决定的;我们必须学习的恰恰是香港或新加坡,而不是瑞典。在美国,共和党右翼公开鼓吹尽可能多地清算对富人以及对自己的选区不具有直接利益的州,企图把预算赤字及所谓的对美国竞争力的负面影响作为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理由。在英国,保守党右翼反对欧洲联盟的经济和政治进一步一体化,引证说,过度的管理和过多的社会成本正导致欧洲的国际竞争

^① M. 戈尔茨坦和 M. 穆萨:《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1993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工作文件(WP/93/95)第14页。

力逐渐丧失。这些论点和倾向在欧洲大陆虽然发挥得较差,但可以很快在那里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们是有诱惑力的,并且很容易被接受。它们为西欧核心经济所必需的越来越多的调整提供了一项吸引人的“权宜之计”,正如它们在其盎格鲁-撒克逊的外围地区所做到的那样。因此,右翼因为其自私自利和反劳工的政策需要全球化。右翼需要它来破坏任何关于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变化如何作出反应的严肃认真的思考。^①

温和的左翼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困难的是它是否认为全球化确实已经发生。迄今为止,传统的左翼已设法证明只有更加公平、更加长远的公共政策才能使国家恢复和保持国际竞争力。例如,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认为,保护“美国的”企业是不恰当的,因为日本的分公司是美国产品的生产者和美国劳工的雇用者。^②他认为国家政策所起的剩余的关键作用是促进培训,从而确保有效的和有吸引力的劳动力,以及在经营所需的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这些政策将吸引并保有资本,且因此而促进就业和增加产出。^③

-
- ① 关于扩张的凯恩斯式经济计划在欧洲的可行性以及对这一计划的种种限制的讨论,见格·汤普森:《凯恩斯欧洲的死亡? 扩张的前景与政治上的限制》,载于J. 米基和J. 格里夫-史密斯合编:《创造工业能力:走向充分就业》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版。
- ② 罗·赖克:《国家的作用》1991年伦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版。
- ③ 事实上,正像格·汤普森在《跨国公司在何处从事其经营活动以及后果是什么?》(为1997年1月30日至2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家机构的作用与经济组织的形式”ESF-EMOT 专题讨论会准备的论文)一文中所指出的,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国际化程度被全球化的命题大大夸大了。跨国公司的大部分经营活动仍是在它们本国的领土上进行的。

政府财政支出与全球化问题

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社会政策的自主性比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大得多。像美国这样一些最富裕的社会（英国也越来越如此），似乎已使自己相信它们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福利国家。这里的限制从根本上说是国内性质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全球市场而更多地取决于政治文化。甚至连《经济学家》杂志（它并不是因为敌视全球化而出名）也承认，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公共开支的百分比存在很大的差异：1994年新加坡为20%，美国为33%，德国为49%，而瑞典为68%。^①

事实上，这是一个需要对“福利国家的终结”的命题进行某种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因为认为政府财政支出从根本上说是受全球化的限制的思想是很普遍的。人们往往认为，高水平的政府财政支出，尤其是用于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支出，不可避免地要损害国际竞争力和增长。表5提供了一些先进国家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比较数据。对所有这些国家而言，支出比率的增长一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① 参见《没有权力的国家的神话》，载于《经济学家》杂志1995年10月7日第15—16页。

表 5:一般政府总支出:1960—1995 年
(按市场价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百分比)

	1960	1970	1980	1990	1995
奥地利	35.6	39.2	48.8	49.3	52.7
法国	34.6	38.9	46.6	50.5	54.1
西德	32.5	38.5	48.0	45.3	49.1 *
意大利	30.1	34.2	41.9	53.2	53.5
日本	—	19.4	32.6	32.3	34.9
瑞典	—	43.7	61.2	60.7	69.4
英国	32.2	37.3	43.2	40.3	42.5
美国	27.0	31.6	33.7	36.7	36.1

注:* 为统一后的德国的数字。

资料来源:《欧洲经济》1996 年第 60 期第 212—213 页表 61。

但是,这些数据也表明,在政府财政支出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上,一直存在并且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实际上,在自 1970 年以来的 25 年中,这种差异程度几乎没有变化。考虑到这些国家之间的不同增长率以及各个国家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不同增长率,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只有政府财政支出的水平才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恰恰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的不同增长历史和竞争地位——两者具有类似的、虽然对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国家来说是非常低的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可以证明这些关系的复杂性。一方面

是税收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水平和增长率,另一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繁荣昌盛。斯莱姆罗德在对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所作的详尽的调查和分析^①中,并没有发现政府高财政支出与不良的经济运行业绩之间有什么系统的或牢固的、通过实际经验可以证实的关系,更不用说因果关系了。

对待这些问题略有不同的一种做法是,把政府不断变化的预算状况(政府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别)考虑进来。近年来,财政赤字一直全面增长,虽然赤字情况各国依旧大不相同。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财政赤字与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业绩之间有何必然关系。^②自1990年以来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根源,也不应当毫不含糊地归咎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在说明赤字增加问题时,政府收入未能充分、迅速地增长,以便满足不断变化的财政支出需要(依据历史标准,这些支出需要本身一直是适度的^③),一直是比较重要的因素。表6提供了1990年至1995年期间(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形式表示)的经常性收入情况。一些国家的记录是收入下降,而其他国家则是非常小的增长。而且,这些趋势的原因与国内选择有关。它们是作出支持削减税收的决定,或者宏观经济管理不当以及对经济复原的时机和实力估计错误的结果。

① 参见乔·斯莱姆罗德:《多国研究对于政府参与、繁荣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什么教益?》,《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丛》1995年第2期第373—431页。

② 参见格·汤普森:《关于“国际竞争力辩论”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些看法》。

③ 见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全球化:十个经常提出的问题和一些出入意外的回答》,载于《调查结果》1996年第4期第47—66页。

表 6:一般政府经常性收入:1990—1995 年
(按市场价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奥地利	47.2	47.8	49.1	49.2	48.2	48.1
法国	49.0	48.9	48.8	49.4	49.4	49.3
西德	43.3	44.8*	46.0*	46.4*	46.8*	47.0*
意大利	42.2	43.3	44.1	47.3	45.1	45.6
日本	35.2	34.9	34.6	32.9	32.4	32.2
瑞典	64.9	61.6	60.9	60.7	60.1	60.3
英国	38.3	38.3	37.1	36.0	36.3	37.7
美国	34.2	34.1	34.1	34.3	34.2	34.5

注:*指统一后的德国。

资料来源:《欧洲经济》1996年第60期第210—211页表60。

本文讨论的总的观点,是要强调各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差别——实际上连各国之间差别的任何减少——都很少是纯粹的全球压力的结果,而更多地与国内政治选择和决定有关。可以用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专门说法来证明是它们导致这些结果的,但它们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只要一个国家在它所从事的国际货物和劳务交易中依然具有竞争力,那么,如果它愿意而且它并不是必须在非国际贸易部门“具有竞争力”或压低工资,它仍有选择高水平的社会开支的机会。日本就是这样一种双重经济:在某些制造业部门极具竞争力,相比之下,它的金融机构和它的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都是有名的“低效率”。然而它们为制

制造业部门提供了廉价资本并且吸收了劳动力。日本已经有了一种社会性解决办法,根据这一解决办法,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已为非欧洲意义上的福利国家提供了补偿。但是,英国没有这样一种具有明显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实际上,它仍有大量管理不善的公司,这些公司按照国际标准依旧是投资不足和效益不佳的。它拥有“高效率的”资本市场、盈利的金融机构、资本雄厚的服务部门,也有大量的失业和糟糕的公共服务事业。这些模式不是全球化强加的,而是国内体制发展的独特道路所要求的。

国内经济管理的新结构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宏观经济决策环境方面的许多实际变化,这些变化越来越具有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但是它们并非由全球化进程促成。可以通过指出表6中的数据所确认的趋势来为明确这一点开个头。政府收入增长速度放慢这一事实表明,国内抵制税收的做法愈演愈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决策中的一个新的主要因素。由于政治家们常常把他们采取降低税收的政策说成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来源于思想上对“大政府”的不信任和对所设想的降低税收的积极刺激作用作出的承诺。但是,减税文化的宣传和实施已经削弱了公众对于“高”税收的忍耐力,造成了一批非常厌恶税收的选民。

过去,政府一直把税率和税收水平作为灵活机动的宏观经济工具用来管理经济,但是这一做法越来越成问题。因此,凯恩斯式的国内一揽子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正在遭到破坏。随着反

对大政府运动的言论的发展,相伴而来的是降低公共开支水平的压力,这意味着通过传统的财政政策手段灵活机动地管理经济的能力被进一步削弱。

此外,在当代条件下,这种财政政策的变化对就业问题的影响不是十分清楚。由于关于“就业的终结”的著作无疑夸大了经济管理不可能创造就业机会这一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坚信,任何财政刺激都会带来就业增长,尤其是在不希望沿着非全日就业、没有社会保障和低工资经济的道路走下去的欧洲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传统财政政策的能力及其效果受到了严重损害,这倒不是因为全球化,而是因为国内的根本变化和反应。而且,货币政策也日益受到损害。过去约20年里进行的“国际货币主义”的试验,无一不证明在管理经济、争取实现增长和充分就业方面是不成功的。这些试验仅仅是在那些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它们的国家里造成一种更新了的“短暂繁荣”的文化。货币主义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在理论上没有可持续性,在实践上也是不成功的。^①

① 这是本文对短期金融资本的大规模全球流动相对而言不甚关心的原因,而这个问题对于其他评论家和分析师,特别是热中于全球化的人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当然,当局必须在一定层次上关心这个问题。对于国民经济来说,有必要实行敏感的货币政策。但是,认为这种流动很重要的说法,是就其对实行货币主义式的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而言的。我不认为货币主义式的货币政策在管理经济方面是有效的,或者说它与实态经济的根本性质有很大差别。短期金融资本流动,绝大部分只是围绕这一体系对“内生的”成功与失败进行再分配,而没有给它增加任何“外生的”追加财富。

必须与之相提并论的是日益增强的现代经济的分裂性,特别是可以称之为“三、五、二经济”的出现。这是指作为保守的经济政策和其他变化的结果,劳动力市场正在被重新组织的方式。大约30%的人口被束缚在最低层。他们要么是永久失业者,要么是低工资、低技能、非全日性工作者,要么是处于就业边缘、工作前景不确定和没有被正式雇用的人。另一方面,有20%处于最上层的人。他们的收入随着近年来发生的不平等现象的增多,已经急剧提高。这部分人一直是经济决策上的“保守转变”的真正受益者,这种“保守转变”同样主要是国内政策变化的结果。处于中间地位的50%的人是总需求的主要贡献者。他们仍旧有着良好的工作前景,已经或多或少成功地适应了新出现的经济上的技能要求。

这种“三、五、二”人口和就业结构,好像要越来越牢牢扎根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之中,并且为其他先进国家提供了具有国家差异的现实前景。问题在于做些什么和怎样利用这种新的应急结构来管理经济。根本的问题是,旧的凯恩斯福利国家依靠劳工、雇员和政府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解决办法”,而现在这种“社会解决办法”已经被上面所概述的趋势冲垮了。要求有一种“新的社会解决办法”,它要考虑到人口和劳动力市场变化了的性质,以及刚才所讲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新的限制。这是建立新的信任和团结一致的社会共识的关键,而这种新的社会共识支撑着管理日益具有分裂性的经济结构的可能性。

问题是,无论是处于最低层的30%,还是处于最上层的20%,从整体经济的观点来看都表现不佳。最低层的30%得到很低的收入,因此给总需求增加了不相称的很小份额。他们还需要福利援助以维持适当的收入水平,而这必须由政府来支付,因此要由政府提供资金。在另一端,最上层的20%如果从总需

求和经济管理的观点来看,也是一个“问题”。他们有很高的储蓄率,因此也给总需求增加了不相称的很小份额。^①此外,他们的支出带有“炫耀性消费”这种含有很高进口成分的消费倾向。因此,重要的是认识到,对于经济管理来说,富人在许多方面同穷人一样是个问题。由于在整个圈子里这两极相对于中等收入阶层来说在不断扩大,所以这个“问题”很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济管理的主张总是向富人征税,重新分配给穷人,也就是要做办不到的事情。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而且简直是根本行不通的。从富人那里产生足够的纳税收入,用来补助穷人,这一点即使在他们之间的分割比20%—30%更有利,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反对以惩罚性比率向富人征税,而只是承认,即便是这样,也不会产生足够的政府收入来实施必要的再分配计划。中间的50%一直是成功的再分配政策的关键,在上述条件下,这一点依然未变,甚至更是如此。

但是,问题是中间50%的人日益增长的厌税情绪。没有他们对一些再分配目标的“认可”,要管理上述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鼓励中间的50%坚持为总需求作贡献,因为这是主要份额。此外,必须鼓励他们至少接受一些向穷人进行再分配的负担。要这样做,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向这部分选民“提供”优良的公共消费。这部分居民不得不忍受政

① 当然,在同样多的储蓄被转为投资的情况下,总需求不受影响(在总计中储蓄=投资)。但是,富人们还以各种方式“贮藏钱财”,并且在储蓄变成可以利用的投资资源之前,还有人所共知的储藏漏耗。

府提供的比较差的基础设施服务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不会再这样忍受下去了。基础设施服务并不仅仅指通常的交通和住宅项目,而且指诸如卫生和教育、公共行政等等一整套向社会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中许多项目仍主要由中产阶级消费。他们很珍视这些项目。提供这些服务的支出也具有相对而言属劳动密集型和进口成分很低这样的优势。因此,它们有助于解决最低层那30%的人当中的失业问题,而不会给国际收支平衡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因此,这里所说的是对全国团结一致的“新的社会解决办法”的概括。问题是要在这个“三、五、二”社会中达成一种“共识”,在这个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中间层50%能够从这种解决办法中得到某些东西,同时又为它作出贡献。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支持日益增长的分裂性和不平等。当然,这种解决办法并不能提供一套现成的解决所有经济弊病或保证经济取得成功的政策。相反,像凯恩斯福利国家的解决办法一样,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依据环境和国家的特性将一些特殊的政策加进去。虽然有人可能认为,到目前为止这只是给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但它却为那些没有走这条路或者迄今为止一直设法使以前确定的解决办法中的某些东西保持原样的人,提供了更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对于比较广泛的各个国家来说,走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已经走过的同样道路的倾向和诱惑是很强的。因此上面表明的看法可以视为对可能将要发生的情况提出的一种警告,并且为思考在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的条件下,任何先进的工业国家都可能提出来的管理问题提供一个框架。

结 论

本文的论点是,全球化的思想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思想。最近30年中所经历的许多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情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重温具有金本位极盛时期特点的那些问题。另一方面,就国际政治和经济管理而言,我们不想重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历。因此,重要的是认识到国民经济在当代这个时期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限制。本文的部分要旨就是指出,从起因上说,这些新情况和新限制大部分是“本国的”,另外,它们的解决办法也主要应在国内范围寻找。为了保持可以控制的社会秩序而采取的必要的再分配政策,不能留给国际市场去决定。国民经济仍然属于独立的分析范畴,对这些可能性进行评估的唯一途径是,承认由无法控制的市场力量支配的全球经济是与事实根据不相符合的。这一论点并不是说先进国家的经济没有面临国际制约。很明显,它们面临着这样的制约。而是说,所关注的是在考虑国家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两方面都确立自信心。全球化倾向使人们对于仍然可以做的一切,采取无所作为和心灰意冷的态度。

(许宝友 译)

全球化问题——资本的力量*

威廉·K.塔布

一、如何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的假说是，各个民族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性质近来出现了一种迅速变化。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命为独立发展的资格，而且国内经济管理策略已经不起作用，达到了无关重要的程度。从这种观点看，国际化被视为一种席卷世界的潮流，在这股浪潮下，技术与不可抗拒的市场力量正在以任何

* 威廉·K.塔布是美国皇后学院和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与社会学教授。1995年曾发表《战后日本体制》一书。本文原是提交给1997年社会主义学者大会的论文，题为《全球化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资本的力量》。原文刊载于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7年第2期。

人都无力扭转的方式改造全球体制。跨国公司与全球性治理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向所有的国家推行一致标准,而不管它们的位置与偏好如何。由这种思想推论出的必然结果就是,激进的选择是不可能的,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别无选择”。

不可否认,有证据表明,国际经济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增加了。从1960年到1990年,经合组织(最富有的24个国家)成员国的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约增加了一倍,从低于10%增长到超过20%。国际银行的贷款总额从1980年占经合组织国内生产总值的4%,上升到1990年的44%。货币市场大大超过万亿美金的日周转额,使各中央银行的调控储备金也相形见绌。工厂倒闭,失业的恐惧已成为各国劳动人民的家常便饭,而“全球化”则成为一种万能的借口!

在全球化这个命题上,激进的看法与比较温和的看法之间有很多的分歧,前者要求从新的视角认识国际经济,认为它“包含并控制着国家层面的进程”;后者则认为国家层面的政策与行为者仍是主角,处于中心地位的并非不可抗拒的经济实力,而是政治。在第二种观点看来,要从较长的历史的角度考虑目前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其独特性,但并不是空前的。它既不一定意味着会出现一种与周所周知的经济体制有本质区别的经济体制,也不一定意味着向这种体制的发展。

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关于全球化命题的第一种观点是以一种神话为基础,有深刻的政府含义(不过是失败主义的),而不是以对一系列错综复杂并值得商榷的进程的合理分析为基础的。^①

^① 参见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和管理的可能性》1996年剑桥体制出版社版。

因而,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最好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要对那种使大多数左派变得虚弱的激进的全球化观进行批判。这是本文的任务。第二步要仔细地看一看,在目前的局面中到底什么是新东西。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制度,因此必须把政治策略建立在对当今时代发展的性质认识的基础之上。但首先我们必须确立不可抗拒的全球资本霸权必败的信念。

美国工人运动基本上都接受激进的全球化观,几乎无例外地都强调资本外逃,以及第三世界工资很低的生产地对美国工人的威胁。资本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寻找尽可能低的工资。但这充其量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它歪曲了跨国公司的实际投资方式。以美国为基地的多国公司的外国投资和生产,有四分之三是在西欧、加拿大及其他高工资国家进行的,而且这些投资绝大多数是从当地的生产场所为这些市场提供服务的。在说到离开美国的资本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自从1990年以来,由于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美国设厂生产,并雇用美国工人,这个国家一直是一个外国直接投资净输入国。美国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借贷以及美国作为最终消费者(即以借钱来付账的吸收进口品的市场)的结果。美国几乎吸收了至今还被人们不合时宜地称为第三世界的半数出口制成品,美国公司从这些政策中,从大众在国民福利与以美国为基础的公司的竞争问题的混乱认识中获益。

跨国公司在母国之外的生产是很重要,但仍有85%的工业产量是由国内地区的公司生产出来的。多国公司约占世界工业产量的15%。此外,在众多左派关注工厂迁往低工资的国家 and 地区的问题时,跨国资本却在避开真正的低工资生产地点,更确切地说,是避开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投资。就外国投资的涉及面而言,近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基本上是被排除在外的。世界

大多数人口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使不平等日益加剧。^① 据联合国的数字,目前,有 70 到 100 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比 1980 年还糟。即使对所谓的奇迹经济来说,加入世界经济的大融合也未必会持续下去。十年以前,所有研究发展问题的杂志都出版专号,谈论韩国这一新工业经济中最成功的国家。然而,今天它们又在大谈韩国经济的危险状况以及由于过度举债经营而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破产。无序竞争所产生的脆弱性,即使乐观地看,也会导致不稳定,而对于各国的工人来说常常就是灾难。

在任何情况下,直接劳动成本并不构成许多产品价格的主要部分,对大多数生产者来说,仅仅是低工资,还难以成为决定因素(尽管它们在一些特殊行业中非常重要,如服装业与电子装配业)。制造业工人失业的主要因素是技术革新。今天,美国国内制造业的产量是 1950 年的 5 倍,而制造业需要的工人却比那时少得多。这绝对是技术代替劳动的结果,而并非由工厂外迁造成的。在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工会组织的缺乏也削弱了所有工人的力量。这种增长也促使美国经济发展不平衡。^②

① 参见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和管理的可能性》1996 年剑桥体制出版社版第 68 页。

② 请看:过去 30 年实际工资增长有 20%—25% 来自高技术工作。诸如计算机、软件、通讯、高技术产品销售与修理、媒体制作、信息技术这类产业正在推动经济的发展。在过去 3 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28% 来自高技术部门,4% 来自汽车制造业,14% 来自建筑。而经济其他方面的任何增长都要归因于技术行业工人消费支出的倍数效应。

二、从长远的观点认识“全球化”

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在特定地区内影响工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始终是一个全球性的制度。经济史学家让我们用这样一种观点来观察现实。世界政治经济并没有比100年或150年前更加全球化。重读《共产党宣言》就会明白这一点: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早在海底电缆将世界市场连为一体和钢壳轮船替代木制帆船之前,这种一体化就已经明白无误地出现了,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革新在重新确定全球生产方向上所起的作用,肯定要比一个世纪以后出现的航空运输及集装箱化重要得多。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全球化理论家认为我们如今有了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世界是通过与分享即时信息的市场连接在一起的,那么这个经济不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而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②至于说到随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② 参见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前引书第9—10页。

计算机终端键盘的按动而在全球流动的巨额资金,那么经济史学家发现,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比20世纪末的今天更大。研究人员发现,在1875年至1975年期间,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相对减少了。鲍博·赞文在研究了若干证据之后,得出结论认为:“所有这些跨国证券与所有权交易的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要比目前大得多。更为普遍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可以看到的每一个对金融市场的描述都表明,它们比以往和此后都更加一体化。”^① 随着本地消费服务的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包括那些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在本世纪内,总产出中不可交易的成分增长了。

跨国制造公司出现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确立了牢固的地位。两次世界大战及一次经济大萧条,创造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关于“短暂的”20世纪的著作中所描绘的一个介于两个国际化经济时代之间的民族国家经济的插曲。他指出,一旦经济从世界大战中得以恢复和全球大萧条宣告结束,出现的不是新的起点,而是一种对旧趋势的复归。今天资本流动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没有达到19世纪的水平,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世界并没有比一个世纪以前更全球化。现在与半个世纪前没有根本的不同,而且正是这种生动的记忆是今天大多数讨论的一般对象。看一看那些凯恩斯福利国家政治经济运作的方式(这些国家的出现,是摆脱战争创伤及全球大萧条侵蚀的结果),看一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回到了前凯恩斯经济学及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霸权,是很有益的。

^① 见塔·巴努利和朱·B.肖尔编:《金融开放与国家自主,机会与约束》199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版第51—52页。

三、战后民族政治经济的发展

大萧条与战争状态每次都以自己的方式破坏了市场机制的信誉,导致政府实行国家计划,并在资源配置方面担当主角。在核心国家,不同程度上盛行的是中左社会民主党政权和“自由”(按美国对这个词的用法)劳动联盟统治。阶级调和占据支配地位,资本被迫承认工会以及国家在稳定经济中的作用。这导致欧洲和日本在成功的经济重建中形成了一种战后积累结构以及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及以后的军事同盟,不仅“遏制”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遏制”了法国与意大利的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非资本主义政权在维持军事化均势的冷战中处于孤立地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对劳工的让步。在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当地资产阶级利用民族主义建立起与前殖民统治者平起平坐的地位,并用民族主义的花言巧语及致力于社会主义发展计划与形式的承诺来控制人民群众。那些社会主义发展计划与形式,实际上加强了民族精英的力量,而不是民众的力量。

随着全球增长速度在70年代经济失调中放慢,第三世界的精英们发现他们要屈尊充当跨国资本主义的小伙计。私有化及出口导向型发展取代了国有化及进口替代;在收入和财富明显不平等的情况下,这后二种战略受到了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在发达国家,一旦从经济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生产能力的过剩与竞争的加剧就会导致新的低工资策略,后者取代了在国内高收入与高财政赤字支出的情况下寻求市场

的国家凯恩斯策略。当跨国公司希望互相渗透彼此的市场,而且产品开发的高成本与日益加快的产品周期导致对全球市场的压力时,全球化重新得到确认。

伴随着从国家凯恩斯主义向全球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而来的是对资本限制的削弱。这些限制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危机时刻实施的,它们的形成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免遭这一制度的自我破坏逻辑的伤害。就像卡尔·波拉尼,以及近来的乔治·索罗斯等人所指出的那样,真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不稳定与不安全达到大多数人所无法承受的,并最终会削弱这一制度自我再生能力的程度。30年代进行的稳定美国经济的改革现在正统统受到抨击。这其中包括社会保障、银行与保障市场的调节机制、劳动法、反托拉斯法等。

四、自由放任思想与政策的新胜利

资本主义逻辑目前已侵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它削弱了国家的许多合法性功能,而正是这些功能维系着公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方式的忠诚。一切都要通过市场解决的要求(学费不要国家资助,法律援助应当废除,公共住房不应继续建设,医疗保健应由市场提供等),代表了对曾广受支持的项目的抨击。但主张市场解决一切的理论家在对所有公共空间意识,对社会共同提供服务,以及对抵御残酷无情的个人主义市场价值观的保障进行攻击时的自信,代表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败。与此相类似,美国的服务供给从联邦转移到州,再转移到地方层次,直到获得服务要以个人支付能力为基础,这就削弱了社会凝

聚力。但这些进程与全球化几乎没有关系,与资本对劳工的胜利及由此导致的对居民权利的侵害却有密切关系。

在工资的增长落后于价格的增长 30 年后,联邦储备银行的首领声称工作的不稳定性正在缓解,因而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的时候了。他的话是我们这个时代资本胜利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①事实上,自从 1991 年以来,美国那些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利润已增长 50% 以上的公司,仍然在继续解雇并雇用新的工人。进步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和工会力量的衰落,意味着美国的资本主义不用提高工资就能减少失业。即使工作岗位相对充足,新工作岗位也大多不是好工作。它们的工资要比原工作低。一般说来,那些遭到解雇并重新找到工作的工人在新工作岗位上得到的工资要比原先低 14%。

1993 年,全部美国工人中,27% 的人工资不足以生活在贫困线以上,只有三分之一多点的人拥有完全由雇主出资的医疗保险。问题不仅是被掩饰的高失业率与非全日制工作的增长,还有全日制工作的工资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的现实。有工作的贫民工作得更加辛苦,但住在不符合标准的房子里,而且没有医疗保险。20% 的全日制工人没有退休保险或医疗保险。临时及非全日制工作的迅速增长,意味着越来越没有保障。与此同时,普通总经理的收入在成倍增长,1960 年是美国普通工厂工人收

^① 实际上,工人意识到公司规模持续缩小,他们继续担心会失去工作,而被迫去接受工资很低且福利更少的工作。威斯康星大学每 3 个月进行一次调查,向随机抽样找到的工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在今后 12 个月里失去工作的可能有多大?”在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平均回答是 17.5%,比一年前的 16% 上升了。见阿·伯恩斯坦:《谁说工作的忧虑在减少?》,载于《商业周刊》1997 年 4 月 2 日第 38 页。

人的40倍,1993年则上升到149倍。在低于贫困线的有孩子的三口之家中,1970年有71%得到了救济金,而1992年只有40%,今天则更少。1994年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比1950年还要低。1994年美国实际小时工资低于1968年。1%的最上层的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比处于低层的90%的家庭还要多。1977年到1989年间,1%的上层享有税后总收入的60%。

广告巨富萨奇和萨奇公司最近提出的一份报告建议,在“我们传统的大市场——中产阶级不断受到侵蚀”的情况下,投资者应当仿效蒂法尼公司(美国珠宝商)和沃尔玛特公司(零售商)的战略,即要避免向为萎缩的中产阶级服务的公司投资。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收入付税的比例比1979年还要少,而他们的国民收入份额却翻了一倍。《商业周刊》的撰稿人迈克尔·曼德尔评论说:“美国人正生活在他们从未见过的发展与不稳定并存的时代。”^① 股票市场的繁荣刺激了上层阶级的消费。半数以上的新轿车销售给了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最高地位的20%的人。阶级分化随处可见。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突起变得日益明显的时候,官方的经济学却回到前凯恩斯主义的传统。

五、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全球化”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国家无力阻挡这些趋势的观点是资本的有力工具。认为“全球化”削弱了国家力量的观点忽视了国家

^① 米·J·曼德尔:《高风险社会》,载于《商业周刊》1996年10月28日第86页。

在控制资本方面仍然具有的技术能力。只有当核心国家允许时,金钱才能逃到纳税避风港^①和海外金融中心去。如果美国政府对银行(和存款人)向监管人员封锁信息的规定实行惩罚,那么大多数纳税避风港的银行就要倒闭。管理者不征收转移税,不实行其他管制是没有理由的。正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和英国)鼓励放松控制。这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一种技术需要。

美国通过坚持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它已经在大量削弱这些权利),能获得使各国工人的工资提高和工作条件改善的力量。美国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鼓励竞争到底,是一种政治选择。而团结与社会公正的反霸权观则指向一套截然不同的规则。正是左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软弱才导致全球主义者的主张占了上风。美国雇主并不是没有经常威胁要关闭工厂并把它们迁到墨西哥或其他地方去。而在美国目前对劳动的控制的气氛下,这种威胁是有效的。^② 世界贸易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那种贸易进行时所处的政治环境。

罗伯特·布莱克在其新著《新的世界奴隶制的形成》一书中告诉我们,截止到1770年,英国从奴隶制中获得的利润为其资本形成提供了三分之一的资金。在可以被称为新的国际分工的那种制度下,奴隶生产出了对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与个人财富极为重要的稻米、咖啡、糖及其他产品。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全球化使局面有了多大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状态与实践的延续性。就像埃里克·福纳所言:“今天唐人街的血汗工厂和第三

① 指税率很低的国家和地区。——译者注

② 见《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一种联合破坏的新武器?》,载于《商业周刊》1997年1月27日第4页。

世界童工工厂的功能与殖民主义的奴隶制是等同的,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和企业主的利润驱动,极力压制那些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畅销商品的工人的权力。”^① 劳动人民始终在抵抗这些要求。在 20 世纪末,这种抵抗将更为强烈,绝不允许“全球化”这一稻草人剥夺我们的权利。制度本身没有变,它的规律没有变,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愿望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迫切。现在是我们在批判中进一步澄清被称为“自由市场”而实际上是阶级权力的基本运行方式的时候了。我们要用控制资本并使经济服务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诸如竞争、自由市场,以及所谓的全球化的要求之类的意识形态构想对抗,而不是承认劳动人民应当持续充当这类意识形态构想的牺牲品。

(郝卫东 译 张文成 校)

^① 埃·福纳:《殖民地的暴利》,载于《民族》1997年3月31日第28页。

全球化与国家无能的神话*

琳达·韦斯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种势力强大的新全球主义教条出现了。它声称全球市场的发展限制了国家作出决策的能力,使其在经济、财政、社会等政策的制定上处于软弱无力状态。这种论调夸大了经济全球化的事实与影响,低估了国家能力的多样化和适应性,并且忽视了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所提供的成功经验。

全球化的新特征和局限性

在考虑全球化出现的新特点之前,有两个事实需要加以注

* 本文译自英国《新左派评论》1997年第9—10号,是作者即将于199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无能的神话:在全球化时代管理经济》的部分内容。

意：一是目前的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金融的开放度等，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超越 1913 年之前的水平；二是战后，特别是 60 年代以来的贸易一体化趋势已经减弱了。

那么，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是否如狂热的全球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出现了巨大变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分析一下他们借以说明问题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就可以得到答案。

全球主义者认为，生产的跨国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动机，并且引用了大量数据来证明这一假设，但是用这些数据来证明所谓的“生产全球化”，严重歪曲了事实。他们引用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说明：(1) 对外直接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占有绝对比例。绝大部分投资分布在非生产性资产、投机性事业和金融服务方面。以日本为例，在 1995 年，61.3% 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非生产领域，比上年增长了 16%；(2) 生产性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现有的企业中，并没有开展新的活动。相当数量的生产性对外直接投资用于兼并活动，并没有扩大生产；(3) 对外直接投资占长期投资总量的比例急剧下降。随着“有价债券”投资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不断缩小。从 80 年代初到 1991—1992 年的 10 年间，在 13 个主要经合组织国家中的长期投资中，对外直接投资从 21% 下降到 18%，有价债券增加了 28%，占到长期投资的一半。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可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并不会自动地扩大经济联系，也难以成为生产全球化的标志。

全球主义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资本流动将摆脱国界和制度框架的限制，跨国公司成了自由的投资者。但是事实与之相反。许多研究表明，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数量极少。如果用所有重要的标准——资产份额、所有权、管理、雇用、研究

与开发的地点——来衡量的话,母国基地的重要性仍是规律,而非例外。

一般认为,降低生产成本是跨国公司向外发展的驱动力,而运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利用低成本生产地点的条件,从而导致了生产的全球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将得到相当数量的投资,但事实却是,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注入了高工资、相对高税收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其次是英国、德国、加拿大。那么,为什么跨国公司没有最大量地投资于工资和税收最低的地区呢?有三个原因:首先,新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重要性,降低了可变成本(如工资和原材料)的重要性,知识密集型劳动日益被视为固定成本,这种转变减少了向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投资以降低成本的可能性。第二,新的生产手段强调生产者和供应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这赋予了当地供应网以特有的优势,因而推动了地区性而非全球性资源网的发展。第三,母国基地对于跨国公司至关重要。国内制度框架使之获得了贸易协会、培训和金融制度、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构成了其竞争优势。这些原因使跨国公司更加注重母国或地区基地,而非“走向全球”。

当然,上述事实只是说明了全球化新特征和深度被夸大了,并不否认更加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存在。但是,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有三个趋势是与全球化趋势相逆的。它们是:(1)国内生产基础依然强大。即使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大约90%的生产依然是面对国内市场的;(2)南北差距依然存在。投资和生产主要集中于富裕的北方,全球化所希望的南北差距的缩小依然难以实现;(3)地区主义不断强大。除了欧洲内部贸易不断增长外,北美自由贸易以及亚洲内部贸易也有长足进展。

至于全球货币流动,虽然从1971年金本位被正式废除,货

币兑换控制自由化以来,全球资本流动达到了让人吃惊的水平,但是国家差异性在货币市场中依然根深蒂固。首先,资本价格还没有统一起来。贷款和投资于新企业的资本的价格差相当大。第二,虽然全球化意味着均等,但是储蓄率和投资率存在着巨大差别。最后,“双边主义”而非“跨国主义”是金融市场运作的主要特征,这特别体现在公司股份上。它们趋于集中在专门的国内股票市场上,而非“跨国化”的债券、现金及期货市场上。

所有这些变化表明,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加深导致的不是全球化世界(国家差别完全消失),而是一个更加国际化的世界(国家和地区差别依然很大,国家制度依然重要)。那么这对于政府管理权意味着什么呢?

“国家无能”论的缺陷

许多评论家认为,全球金融,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力量削弱了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迫使所有的政府采纳一致的新自由主义——降低通胀和保守的财政——政策。从这种角度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全球货币市场是全能的,它迫使政府丧失能力,导致财政上的保守主义;第二,不管国家强弱,所有国家的政府面对全球金融时都显得软弱无能。

这种论点指出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遇到了新的制约,但它错误地认为这些制约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它没有看到国家适应内外挑战的进化史,认为国家的历史已经终结。这种论点有以下三个弱点:

1. 夸大了国家以前的权力

全球主义者为了说明现在的状况,有意夸大国家在过去的权力。但是战后实行的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说明国家权力的强大。如迈克尔·曼恩所说,这个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用于支出的财政剩余,这使得战后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似乎产生了影响。20多年的增长和衰退的曲折发展过程以及实际收入的下降,使经合组织国家丧失了财政剩余。现在许多国家正经历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困难,更多地与衰退造成的国内财政紧张有关,而非与全球化趋势有关。

全球主义者认为,不断扩大的开放,超级流动的资本正在迫使政府削弱税收,重建税制,而从更长远的历史观点看,这些压力是合情合理的。曼恩的研究表明,至少从13世纪以来,公民也仅仅是在战争期间才一致同意支付税金,在和平时代以及经济衰退期间,他们不情愿纳税几乎毫不奇怪,这是历史惯例,而非“全球主义”的独特产物。

近来的财政保守主义趋势更大程度上源于国内压力。长期的经济衰退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迫使政府提高税率以支撑不断增长的失业人口和退休人员。同时这种压力又是在生活水平停滞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选民越来越不情愿支付税金。在未来缺乏持续增长的日子里,我们可以预见政府会继续遇到此类困难,也会继续滋长全能的全球金融观。

2. 夸大了国家反应的一致性

并非所有国家都会遵循新自由主义,这一点肯定会推翻国家无能论的中心假设。在战后长时间疏远凯恩斯主义的德国,最近为了补充统一后的财政,已经大幅度提高了税收。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以来,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就业,最近不受欢迎的消费税又大幅度提高,显然是为了进一步资助那些保护就业

项目。

不仅像德、日这样的“强国”已经适应了外部环境,找到了实现计划的新途径,而且“弱国”也显示了不同程度的适应能力。比如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采取了扩张政策,用赤字支出来给福利、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业政策筹措资金。所以,全球金融的压力并没有产生其鼓吹者所说的那样的效果。

3. 国家无能是一种政治设计

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主导的英语国家的领导人,在这种观点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获得公众支持,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府将其紧缩政策“推销”给了选民,好像是无法控制的全球经济趋势迫使他们必须如此似的。

总之,把目前各国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归因于全球化趋势的压力具有误导性,它只会夸大全球化的作用,忽视国家的应有作用。

全球化中的国家能力

全球主义者不仅夸大了国家无能的程度,而且也失之于过分概括,没有看到不同国家的不同反应。实际上,处于动态的经济和国家间体系中的现代国家,适应性是其实质。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不是在阻滞发展而是推动进步。

1. 国家的适应性

对于国家调整经济的能力,在认识上一直有着误区,总是徘徊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但是,东亚的经验表明,除了宏观经济政策,还有许多手段来管理经济。在东亚地区,产业政策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即使在欧洲,产业政策依然存在。例如在德国,国家仍然对特殊工业中的公司战略有着重要影响,通过政策来影响其创新战略。

许多评论家都在欢呼日本出现了“产业政策的消亡”。然而,实际上,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部门——通产省的官员们却在这个神话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目的是缓和美国对于贸易冲突中的“不平等”的抱怨。问题的关键在于,通产省不再需要推动出口,或者主持工业生产,其他许多原有的政策工具也被放弃了,如外汇和许可证控制,但是这不意味着产业政策已经结束。因为通产省在不断创造着新的政策工具,以适应新环境和新任务。这些新任务包括:推动和推广技术创新,推动公司经营国际化。

但是,国家战略调整的能力不能简化为政策工具。政策会随着经济一体化失去效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这样,它们只关注短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其干预手段是预先决定的,没有为创造性调整留下空间。而产业(或者也可称为“技术”)政策则恰恰相反,由于产业本身不断变化,所以“产业政策”必然也要有创造性。所以许多在90年代仍寻找60年代式产业政策的学者惊讶地发现,它们已不存在了。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产业政策的真正能力就是要求国家不断地调整其工具和任务。

国家的调整能力依赖于产业战略,政策制定者动员储蓄和投资并使之应用于高附加值产业的能力。但是具有协调性的战略性反应能力,并不依靠专门的政策工具或者与世界经济融合

的程度。以英国和新加坡为例,虽然二者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都很高,但由于新加坡维持着对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有效控制,所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从根本上讲,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协调一致的战略反应能力。它能使经济官员中的核心决策者获得决策“自主权”。“自主权”意味着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要远离压力集团和各种特殊利益。因为利益的多元化会使分配政策优先于经济增长。在东亚,制度安排使国家和产业界密切合作,推动了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

2. 国家不是全球化的牺牲品而是推动者

日本和东亚的新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在日本,经济官员们与产业界关系密切,其政策是经过双方协商后实现的,因此其“国际化”战略推行顺利。为了帮助企业调整自己,更有效地适应外部环境,日本官员创造性地使用“海外开发资助”,不仅保证了日本产品的进口,而且要求官员驻在海外,从而有助于日本模式的推广。

其他东亚国家为了推动本国企业向国外发展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提供经济数据、激励措施、资本融通、投资保证以及培训计划。在韩国,国家直接推动本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其措施包括:鼓励本国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上集资;国家资助私人企业在海外拓展;支持本地企业同多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或达成技术合作关系,直接帮助企业在海外重新选址。

与英美的非协调市场经济相比,东亚国家的经济绩效相当突出。而且随着这种协调性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亚洲,还有潜在的仿效者可能出现。

更普遍地讲,所谓的“全球化”应被视为政治诱致而非技术诱致的现象。资本市场的开放是政府行为的直接结果,而且许

多国家正在寻求直接推动而非限制公司在贸易、投资和生产方面的国际化。

3. “催化剂”国家的出现

随着宏观经济工具的失效,贸易规制同质化压力的增大,人口和金融跨国界流动对国内基础的威胁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寻求提高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当然,由于政治和制度的差异,各国的反应与行动不同,但都是为了建立或加强权力联盟:对外的战略是在地区和国际层次上建立跨国联盟;对内的战略是在国内市场上形成国家—产业界联盟。

就这些国家的行为来说,它们最好被称作“催化剂”国家(米切尔·林德创造的术语)。催化剂国家实现目标不是靠自己的资源,而是靠在国家联盟、跨国组织以及私有部门团体中占据主导地位。作为一种催化物,这种国家一方面同特定战略联盟的成功与发展方向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实质上独立于联盟中的其他成员,不管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公司还是外国和本国人民。所以,国家不是要取消自身独特的目标和身份,而是越来越多地运用合作性权力安排来更加严格地控制本国经济,实际上也就是控制国家安全。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催化”是相对“完整”而言,它表明国家要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或加强伙伴关系来适应新环境,而不是自行其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地区性战略联盟的体现,而东亚的官商合作则是国内联盟的体现。二是即使催化剂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能力差别。如,日本和德国充分利用了国内和国际优势,美国虽然掌握着国际优势,却牺牲了国内调整能力,而俄国则缺乏国际能力。

分析表明,在已经建立的新的跨国联盟中最重要力量角色不是那些发起者,而是具有国内力量的参与者。根据这个

判断,我们可以认为,在民族国家疆界内具有强大力量的国家更有可能同他人合作,而国内控制力较弱的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则不愿完全放弃其“完整”的特征。因此,国内能力弱的国家总是处于要么独自行事,要么与他人合作的摇摆之中。

在这个新时代中,最成功的国家将是那些能够把其常规的力量资源与合作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但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政府与产业界的合作关系,它是国家能力的真正核心。

结 论

1. 世界经济是一种国际化经济,并且日益趋于地区化,但它不是真正的全球化经济。货币、生产、公司经营只是在某些方面“全球化”了。

2. 共同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是极为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经济全球化非常有限,并遇到许多对抗,而且民族国家本身也显示了巨大的适应力和多样性。

3. 由于国家能力的差别,所以利用国际经济变化机会的能力也完全不同。现在的趋势表明,国家能力的强弱之分将愈加明显。

(杨雪冬 译 王列 校)

全球化与国家的未来*

[英]克利夫·克鲁克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市场是一对主要矛盾。关于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争论的焦点。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表明,目前不断膨胀的国家是与全球化进程相悖的,国家的前途在于精简自己,归权于市场。

全球化中的国家:对争论的总结

目前,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势如破

* 作者系《经济学家》杂志专栏作家。本文摘译自作者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7年9月20日)上发表的关于全球化的长篇综述性文章。

竹，侵蚀着国界，扩大着全球经济的领地。这些变化使国家日益沦为国际市场的仆从。如此巨大的变化也使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愈加激烈。争论双方中一派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是全球化的衷心拥护者，另一派则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是全球化的抵制者。

乐观派由现代化了的保守主义者和新的后社会主义左派组成。他们认为，国际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好事。政府可能会失去随意指挥经济的自由，但是世界从技术进步中获益的速度比以往更快了，这是全球摆脱贫困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也是全球亿万人民获得更大自由的机会。虽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运行良好的社会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国家，但是他们发现现在这种变化是积极的。

悲观派由民粹派的保守分子、各色各样的社群主义者以及老左派组成。他们认为要在有效力的国家和有效率的市场之间达成平衡。他们承认市场力量最近获得了优势，但与乐观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这带来了深深的麻烦。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带来的益处比乐观派设想的要少得多，而且缺陷更多。乐观主义者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是，这些益处将在社会中被不平等地分配。悲观派进一步指出，通过全球化富裕起来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且受冲击最大、处境最糟的是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他们几乎没有能力糊口。全球化将扩大不平等，加剧贫困，并且越来越引发社会的“排斥”行为。当政府的反应能力不断减弱时，这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糟。政府行为的失效会削弱民主国家的基础，使其合法性受到挑战。资本主义会由于市场力量的壮大而陷入新危机。

这两种论点虽然都不否认国际市场出现的新力量，但是在得出下述结论之时都过于草率。这些结论是：第一，国家肯定在后退；第二，全球化在决定国家前途上将起决定性作用；第三，对国家权力的任何侵犯都必须被看作相对于收益的成本。在前两

点上,两派都夸大了事实;在第三点上,二者同时背叛了集体主义的本能要求。

实质上,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大,而且各国的情况不同。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国内市场之大足够进行公平竞争,长期以来,贸易、资本和知识壁垒很低,技术处于前沿,所以从全球化中获益较少。对他们来说,全球化是件好事,但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至于贫困国家,由于其国内市场狭小,技术落后,资本缺乏,所以开放并加入国际经济就是其走出贫困的捷径。

现在发达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不是来自国际,而是源于国内。根本性问题不是许多人所设想的民主与全球化是否契合,而是民主与自由是否合拍。

虽然在资本主义是否会继续与民主和谐共存问题上,悲观派是正确的,但是在关于二者冲突最可能采取的形式上,他们显然是错了。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危险是,资本主义终将被证明是场社会灾难,以至于民主国家将被示威游行、法西斯主义分子或者非民主政体推翻。事实上,现在的民主国家中充斥着与自由相悖的价值,它们对资本主义提出各种要求,给它加上负担和约束,这会使资本主义连同自由一起消失。新出现的政体也许是“民主的”,但它会无法运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走向极权。发达国家过去 50 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不断膨胀的政府

大政府的时代并没有终结。本世纪以来,政府支出占国民

经济中的份额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增长。在 30 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它增长；在 1960—1980 年间全球贸易和金融扩张时，它增长；在 1980—1990 年间当全球化的微风变强时，它也增长；而在 1990—1996 年间当全球化成为飓风时，它增长得更多。

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美国和日本号称拥有最小的政府。1996 年，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33% 和 36%。即便如此，二者的政府开支也在呈不断上升趋势。在英国，从撒切尔夫人实施改革以来，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打碎福利国家，压缩公共部门，但是政府支出的比例仅仅从原来的 43% 降到近 20 年后的 42%。1994 年以来，许多欧洲国家为了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纷纷削减公共开支，但 1996 年的平均开支依然高于 1990 年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法国为 55%，比利时为 54%，意大利和奥地利也超过了 50%。总之，在发达国家中，大政府是一个趋势。

政府开支主要有四个方面：(1) 政府消费，即国家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所支付的工资和其他投入；(2) 公共投资；(3) 转移支付和补贴；(4) 国债利息。在这四类中，只有公共投资在 1960—1990 年间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降到 2%，其他都处于不断增长状态，而债务利息增长最快，这表明政府在短期内是通过借钱而非征税来为其活动筹措资金的，也说明政府支出一直高于公民支付的税额。政府消费的增长只是数量上的，而非质量上的，其生产率的增长率一直低于私有部门。从 1960 年以来，政府开支扩大的最重要原因是转移支付和补贴的增长。这包括收入补贴、失业补贴、残疾人和独生子女补贴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即时支付现金部分。国家不仅在糟糕的年代里膨胀，因为它必须这样做；在美好时光中也膨胀，因为它干大事业的雄心更足了。

国家的不断膨胀并没有实现不断改善社会状况的目标,这可以通过事实加以证实。可以把发达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共开支超过产出 50% 的“大政府”;一类是公共开支比例小于 35% (以 1990 年的数据);第三类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大政府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小政府中有澳大利亚、日本、瑞士和美国。此外还可以把香港和新加坡加进去。我们可以用广义的福利标准对它们进行比较。

最好的标准是个人产出。在这方面,拥有小政府的国家位置靠前。它们的个人产出(根据国际购买力差加以调整后),在 1995 年为 23 300 美元,而大政府国家则为 20 400 美元。小政府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较高,在 1960 年到 1995 年,个人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近 4%,而其他国家则为 2.5%。此外在健康和教育方面,虽然各国开支迥异,但效果并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在收入不平等方面,双方差别明显。在大政府国家中,占人口 20% 的最穷者占有 7.4% 的国民收入,而在小政府国家,这一比例为 5.6%。然而,在小政府国家中的 20% 的最富有者,要比大政府国家中的最富者更富有。

政府开支扩大所产生的弊端还很多。它损害了经济效率,加重了经济运行成本,滋长了机构膨胀和官僚主义,并对经济民主构成潜在威胁。那么,既然有如此多的问题,为什么政府还在不断膨胀呢?

总体来说有三个动因:第一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政治家。在民主选举的国家中,政治家们主要关心的是获选和使用权力,而使用权力的主要方式是提高公共开支。这样,政治家们就和以前君主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提高公共开支,就要增税,但税赋过重,就会造成生产率下降以及公民的抵制。对于希望赢得选举的政治家来说,他们必须征得选民的支持,而用公共开支来吸

引选民则是他们的手段之一。在发达国家中，“中间选民”在选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事实也证明，作为“中间选民”的中产阶级在公共开支中获益最多。在战后许多西方国家中，花费最大的政府项目是中产阶级的“权利”项目，其目的不是为穷人提供安全保障，而是为所有人提供昂贵而精细的服务。据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莱·格兰特分析，在80年代的英国，占人口1/5的最富裕者从健康保健中获得的公共开支，比占人口1/5的最贫困者多40%，在中等教育中多80%，在公共汽车补贴中多4倍，在大学教育中多7倍，在铁路补贴中多10倍。显然，中产阶级是默许公共开支不断扩大的重要力量。第二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官僚。政府官员显然在扩大其部门范围方面有好处可得，官僚队伍越大，越有提升的好前景。而且他们也喜欢垄断某个领域，不愿意有私人部门参与竞争。当政府很小时，政治家和为其工作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化的或金钱上的，但当政府膨胀时，官僚们就成了有影响力的选举团体，能够在某些方面操纵政治家以达到自我目的。所以，这也是西方国家改革面临困难的一个原因。第三是利益集团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早在30多年前就解释了利益集团的问题。人们结成利益团体，采取集体行动，更容易引起政府注意，获得期望收益。在最近几年中，利益集团的数量不断扩大，几乎每个人都加入了两个或三个团体。对这些团体来说，提高其成员福利的最快捷之路是从非成员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现在采取的方式不是现金或服务，而是以各种名义进行的管制。

当然，这三种因素并不能完满解释本世纪以来的政府膨胀，但确实给出了深刻的回答。政府的不断膨胀是民主的某种失败。从集体角度讲，公民们都认识到大政府正产生着令人失望的结果，但从个人角度讲，他们及其政治领袖们不断要求政府扩

大。

现在,随着全球化力量的增强,一种看待政府的新观念正在出现,并且与古老的政府怀疑论结成强大的新联盟。那么,全球化会驯服利维坦式的国家吗?

全球化的市场和政府的反应

肯定地讲,当今的世界经济在许多方面比过去数十年都更加走向一体化。以贸易为例,在美国,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50 年代的 4% 上升到 90 年代的 7%。更说明问题的是,制成品占商品出口的比例在同期从 6% 上升到 20%。资本流动所体现的经济一体化更加迅速。在过去 20 年中,外汇市场上的日交易额及债券与证券的国际交易额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现金市场的日交易额已经超出全球官方外汇储备总量。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

尽管经济全球化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并没实现货币的统一、商品市场的统一。尽管劳动力和资本流动超出国界,但并没有摧毁国家征税和支出的权力。国家依然保持着命令者的地位。

在现实世界中,金融资本已经变得极为流动,但物质资本并没有达到同样水平。生产设备一旦被装配起来,就会固定在那里。即便是技艺高超,会多国语言的劳动力也比想像中的流动性要低。大部分人被文化、家庭以及邻里之情固定下来。当然,国家行为也有所变化,比如在征税模式上,对生产的不动要素比

流动要素征得更高。从更广的角度看,由于所有种类的资本都比劳动力流动性强,所以工人承受的税赋将更重,而资本所有者承担的将更小。这样的事实已经出现,例如,爱尔兰就制订低税政策以吸引投资。发达国家公司税率的下降也说明了这点。平均来讲,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司收入税率,从1986年的43%降到了1995年的33%。个人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也下降了,从1985年的平均最高税率59%降为1995年的42%。对工人平均收入的2/3征收的边际税率,从1978年的32.6%上升到1995年的38.4%。除此之外,政府还提高了像增值税这样的消费税。总的来说,政府的征税能力没有受到多大伤害,反而有所加强。

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毫无疑问,解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改变了财政赤字和利率这两个宏观经济政策杠杆的变化方式,但是并没有使政府失去其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责任,尽管对其自由在某些方面有严重限制。然而,一旦经济开放了,制订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则必须更改。广义上讲,如果政府选择固定汇率,那么它需要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更少依靠货币政策;如果它选择浮动汇率,那么恰恰相反,它就要更多地依赖货币政策,更少地依靠财政政策。在流动资本的世界中,不可能维持一种半固定的汇率体制,即政府试图固定汇率而又控制货币政策。最近发生的重大经济动乱,如墨西哥比索危机,泰国的泰铢危机就证明了这点。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谨慎的政府能够做到其想做的,而且也在为应付全球化调整着彼此的关系,官方的说法就是“和谐化”,即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彼此间的竞争不同,政府间合作的主要政治优势是能维持庞大的政府。欧盟和由美国倡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就代表了 this 趋势。这些跨国组织在表面上似乎表明国

家交出了主权,但是这也可能是为了保留和增加权力而做的暂时行为,就如同公司参加卡特尔一样。至少到目前为止,全球市场几乎没有触动国家的行动自由,如果要使之受到更多限制,就要靠此类卡特尔制订更多规则。

全球化中的全球工人

与其对工作和工资的影响相比,国际市场力量对税收、公共开支、金融市场以及跨国管理的影响是轻微的。如果说全球化缩小着国家的税收和支出能力的话,那么它在劳动力市场上扩大着对国家的要求。这也正是一些人提出资本主义正迈向30年代似的危机的原因,它能做的和它必须做的之间的差异之大令人难以容忍。

对发达国家来说,一个迫切而且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没有技术的工人的问题。在美国,这个问题以贫困工资为体现方式。在欧洲,则体现为失业。但潜在的原因是一样的。没有技术的工人多于可以支付体面工资的工作。在美国,由于允许工资降到足够低以适应非技术工人的供需,所以失业率较低而且创造了成千上万新工作,但低工资工人的收入难以使其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且其实际收入在20年间一直在下降。在欧洲,由于最低工资法和相对丰富的福利支持着工资和其他就业成本,所以非技术工人没有美国那样穷,但失业率非常高。

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贸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认为它增加了非技术工人的就业压力。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进口

商品为发达国家中的非技术工人提供了更多的竞争对手,从而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下降。这样,贸易虽然使发达国家整体获益,但却牺牲了非技术工人的利益。

但事实上并非这样,贸易和工资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第一个指出这个结论存在错误的人,是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雅格迪斯·巴格瓦蒂。他认为在二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环节被忽视了。如果低成本的进口商品是非技术工人工资下降的原因的话,那么这些进口商品首先必须降低美国生产的同类商品的相对价格。这是贸易迫使工资下降的渠道,但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商品的相对价格实际上并没有下降。

所以,如果贸易和工资不平等增长之间存在联系的话,那么它肯定以其他方式在起作用。近些年来虽然不乏此类研究,但要么是把二者联系说成几乎不存在,要么说成是百分之百地存在。来自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阿德林·伍德赞成后者。他认为进口商品竞争已经迫使许多低工资工作消失,巴格瓦蒂忽视了这一点。同时进口商品竞争也刺激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引进,而常规理论忽视了这一点。

虽然关于贸易与工资关系的争论很多,但流行的观点是,贸易破坏了工作,降低了工资和劳动标准。这种观点犯了经济学无知的错误,但是它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其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能够获得选民的赞同。

在解决非技术工人的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做法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美国虽然失业率低,但其社会弊病(明显的是犯罪),相当程度上与贫困有关。欧洲的贫困问题虽不甚突出,但失业率很高,并有自己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放权给市场,让市场来解决问题。在市场难以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则要由小政府出面,实施两个战略,一是更好的教育,二是对那些处于收入分

配最底层的人减税。更好的教育不是指国家负担教育,而是由个人支付学费,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父母对孩子和学校的更高要求。至于负担不起学费的穷人,就以救助卡的形式给他们提供在教育市场上的购买力。

教育只是改革的开始,还要对健康保障和养老金进行大幅度削减,使一些公共机构私有化。这样,国家在教育、健康和养老金方面的更小作用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并使公民受益。而非技术工人或没有生产能力的穷人,则可以通过获得救助卡或其他补贴来提高其市场购买力。

结论:国家的未来,自由的未来

在过去的40年中,发达国家政府的扩大一直持续不断,并且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目前为止的事实表明,民主实际上与自由脱离了。最令人担心的是,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过去10年或15年的市场改革走得太远了,现在要重新肯定国家。而事实显示,西方削减政府的成效只是表面上的,雷声大雨点小。

现在重新获得公众支持的左派或中间派政党,为维持庞大政府带来了新的观念。不用扩大开支或提高税收,它们设计了更多的政府管制方法,发明了新的非税收入,并且同私有部门发展“伙伴”关系。针对贫困问题,它们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方法;如果收入不足,则提高政府服务收费;修建新的道路和桥梁时,采取私人修建国家租借。这些手段虽然在短期内使公共开

支明显减少,但从长期看花费会更多。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曾提出,在时代变迁中有两种对立的政府观念。第一种植根于古希腊,把国家看作市民组织,其工作只是帮助人们按照自己的思想生活,不把它的目标强加在他们身上。第二种与之相对,把国家视为企业组织,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指挥着企业。前者把个人作为中心,后者把社会作为中心。从前者派生出了古典自由主义以及 20 年代之前的美国宪法;从后者产生了社会主义以及许多种现代保守主义。

现在似乎第二种观点非常流行。政治家们像企业的管理者那样要在全球竞争中赢得胜利,而公民们则希望处于一个由队长率领的获胜队伍之中。原罪在西方似乎已经被替代,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带着的只是社会义务。这恰恰预示了大政府的到来。

(杨雪冬 译 王列 校)

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

苏珊·斯特兰奇

我听到过两种反对全球化概念的不同声音,我对其中一种有些同情,而对另一种则不为所动。要解释这一点,我得简要地谈谈我对全球化一词的理解,这构成了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弄清我所理解的全球化进程之根源也是有益的,本文第二部分将谈到这一点。最后,我将阐述一下我所理解的全球化对国家的主要影响,并以全球化对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与经济集团的影响为参照。

唱反调者

我对之毫不同情的论点否认全球化现实的存在,声称实际

* 作者系英国沃威克大学政治系和国际关系系教授,本文选自《当代史》(英文)1997年11月号。

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一观点看来,全球化只是一个巨大的神话,一种幻想,因此不必认真对待。之所以说全球化是种幻想,是因为国家依然存在;因为企业依然“从属于”一个特定国家,其总部设在国家的领土之上,并以此向外扩张;因为公司的经理们几乎都来自一个民族;因为这些公司与其他“民族的”公司的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

然而,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国家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全球化不是我们生活的现实的一部分。企业归属于“美国”、“英国”或者“日本”,也并不意味着企业的性质和行为像国家的性质和行为一样没有受到全球化的改变。尽管对全球化进程的评估是困难的,但它并非是神话,它的确存在,它在几个层次上改变着事物。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首先,我将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所说的“物质生活”上来理解全球化带来的变化。物质生活指的是生产结构,它决定着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舒适,生产什么样的物质和服务。由于世界市场代替了本地市场,主要由一国人民生产和消费的物质与服务被更多地由几国人民生产的物质和服务所代替。

其次,全球化包含着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是提供信用以便为物质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筹措资金的体系。这种信用的创造和使用一度大多发生在具有国家疆界的社会之中,现在,在由电子技术连接成单一体系的全球市场中,它们已超越了民族疆界。的确,在这种体系中,仍然有地方银行和市场为本地的需要提供着信用,但它们不再具有自主性了,它们成了更大体系的一部分,全球体系的波动比本地市场的波动对它们的影响更大。

最后,全球化还出现于观念、信仰、思想和品味这一层次上。在这方面,尽管文化差异仍然存在,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同质化进程的改变。信息革命和成本的降低使

得国际通讯变得更方便、更快捷,它们是使全球化进程得以发生的途径和手段。尽管这第三个层次的全球化最难量化和监控,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它可能是全球化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

然而,这一层面的全球化最容易被那些加入否认全球化存在的大合唱的经济学家和另一些人所忽视。其中有些人只是怀疑可归因于全球化的变化程度是否被夸大,另一些人则对整个全球化概念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①

这些反对之声有许多是出自我以前的国际关系学同行之口。这门社会科学分支在一战前并不存在,在美国,也是到了二战后才出现。两次大战的可怕灾难促使知识分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家为什么要相互间进行战争?”因此,国际关系问题成了国家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成了能否以及怎样避免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根源。在这样一种研究中,国家总是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并且常常被习惯性地视为一种单一的行为者。由于全球化的讨论引入了其他行为者——市场、企业以及其他导致变化的力量,如技术、媒介和通讯,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正在逐渐变得过时。而且,除了这些长期的一般变化外,冷战也结束了,国际政治体系中一种内在的主要危险被消除了。

陷入困境中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们往往容易对阻碍他们进行研究的人发起攻击。至于我本人,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我认为,对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研究应该去适应变化,而不是去抵制变化。对于那些否认全球化的现实存在,墨守过时的范式和已经被其他问题取代了的陈旧问题的人,我没有多少同情之心。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国家间爆发重大战争的

^① 参见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和管理的可能性》1996年剑桥体制出版社版。

危险已经让位于长期经济衰退的危险,后者源于金融体系的弊端,源于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①

三重困境与一种解释

对于那些承认全球化的存在,但却急于抵制它的人,我有着更多的同情。变化永远都会带来胜利者和失败者。对所有的人而言,变化都不是毫无痛苦的。变化是有代价的,有人可能会(已经)争辩道,收益抵不过成本,因为变化太快了,这使得风险大过了机会。如果全球化不能被逆转或者被抵制,至少也应该把速度放慢下来。其理由在我们谈到全球化的后果时就会变得更加清楚,我认为这种观点可能是站得住脚的。这种观点在欧洲特别流行,有一本新书,德国《明镜》周刊的哈罗德·舒曼和汉斯-彼德·马丁所著的《全球化陷阱》,出人意料地成为1996年德国的畅销书。^②德国人普遍地偏爱马克胜过欧元,偏爱民族的历史胜过全球化的未来。

全球化对国家产生的影响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三重困境。首先是经济困境。一种市场经济,无论是全球性的还是民

① 参见苏·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1994年伦敦平特出版社第2版第60—63页;《国家的倒退:世界经济中权力的扩散》19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版第66—87页。

② 哈·舒曼和汉斯-彼德·马丁:《全球化陷阱》1997年伦敦纪德出版社版。

族性的,都需要有人提供最终的解决办法,提供权威——可以称它为霸权,尽管这一术语会使人产生误解——以便对银行和金融市场既进行约束,又赋予信心,并且能够在增长缓慢和衰退时期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这里的困境是,无论是以前的霸权,还是国际组织,我们都无法依赖它们去完成上述任何一项任务。

第二是环境困境。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的行为动机促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去破坏和污染我们的星球,而国家所具有的必要的制约力量却受到国际法准则、主权等因素的束缚。

第三是政治困境。为争取自由和负责精神而进行的长期斗争至少逐渐使某些国家对人民负起了责任,但是全球化把权力从国家转向了公司,从而坐视国际官僚破坏了这种负责精神。在新出现的非国家权威中,没有一个是为人民负责的,其透明度甚至更低。现在,不仅在欧洲,在美国和日本,在整个全球化的经济中,都存在着民主的缺乏。

说到全球化——以及国家权威随之丧失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支配地位——的潜在原因,我认为首先在于技术革新速度的加快,其次是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在现代经济中,这两者都是影响生产的不可缺少的因素。^① 正确评价它们的重要性无疑需要有一种历史眼光。它们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0年以前,也就是18世纪末叶,就技术革新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加里略和达·芬奇。这两个人都相信科学掌握着解决地球上重大生命困惑的答案,具有改善人类生活的潜能。这一信念(国家为获得进行战争的技术优势而开展的竞争强化了它)维系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对科学发现的追求和技术革新。然而,如果资本没有

^① 这一观点在我的《国家的倒退》一书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

足够的流动性,不能从信用产生地流动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地,科学之发现和革新是不可能产生地以外投入应用的。简而言之,从18世纪末以来初露端倪的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是20世纪的全球化的绝对必要条件。

必须加以额外解释的是,为什么在本世纪中叶,技术革新和资本流动的速度才开始加快。这两者有着互相的联系,但其中一个,根源主要是经济上的,另一个的根源则是政治上的。技术革新通常意味着资本替代了劳动。这正是福特主义的本质,通过安装资本密集型的装配线并辅之以相应的管理,亨利·福特能够雇用到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以替代昂贵的熟练劳动力。后来,更廉价的机器人代替了工人,这又一次表明,高资本成本是低管理成本所付出的代价。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技术变革改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它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改变为国际贸易的扩张提供了动力,因为日本等后来者能够靠为国内外市场生产产品来降低边际成本。在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从钢铁厂到啤酒厂,为世界市场而生产都成了迫切的要求。每一种技术革新都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而且,在企业为了市场份额而进行竞争的压力下,技术革新的速度加快了,这使得靠国内市场来维持赢利变得日益不可能。总之,企业并非是自愿选择去为国外市场进行生产的,它们是被迫这样做的,或者说屈服于国外市场。在许多时候,尤其是在拥有巨大潜在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准人的代价常常是在抵御进口品竞争的贸易壁垒内重新安置生产能力。^①

① 参见约·斯特普福德和苏·斯特兰奇:《对立的国家,对立的企业:为世界市场份额而竞争》199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版第1—64页。

新 外 交

没有资本的更大流动性,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漫长的19世纪到1914年间,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要为这种流动负责,其后是美国人。在1929年大崩溃之后,资本的流动缓慢到了几乎停滞的地步,但是,即使在那时,美国的企业仍然继续在欧洲和拉美进行国际生产投资。1945年后,历届美国政府都在推动减少对资本流动的汇率控制。与降低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相比,这一行动为生产的国际化提供了更多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企业发现,在一个国家或者用一种货币进行借贷——并不一定是它们自己的国家和货币,然后到另一个国家投资,变得越来越容易。可以通过银行或证券市场做到这一点。而且,不受管制、没有税收的欧洲货币市场的诞生对整个生意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在对外投资浪潮中首先到来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很快就超过了英国、瑞士和德国,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股东。不久,日本、韩国和台湾也加入进来。由于同一时期在资本流入国,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这种向其他市场的资本扩散变得愈发容易。那些最初对外国企业持敌视态度的国家,到了80年代,有许多认识到,外国企业掌握着赚取工业化所必需的外汇的三个关键因素。这三个因素是:技术控制、得到流动资本的便利条件、品牌以及便于进入富裕的欧美市场的销售网络(这常常是最重要的)。

这种“新外交”的重要性大多被一般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家所忽视。因为它意味着企业与国家一道成为可以对民族的和全球的经济发进程发号施令的权威。国家的政府可能仍然是自己领土上的看门人,其他国家承认它在这一领土上拥有权威。但是,如果没有外国企业想要进入其大门,它几乎不可能同其他谋求世界市场份额的国家竞争下去。即便有企业谋求准入,政府也不得不同它们就各种条件讨价还价。因此,东道国与外国企业的权力制衡就成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这多半取决于东道国市场的大小和外国企业在所从事的领域中的地位。

新外交的另一方面也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中日益显现出重要性来。企业间的公司兼并和战略联盟越来越多地决定着未来经济增长、就业和贸易的发展方向。别忘了波音与麦道合并给欧洲带来的惊慌,这一兼并有可能造就了一个控制世界市场的飞机制造商,它是欧洲空中客车比以往更可怕的竞争对手。别忘了不久前香港给我们传来的警报,李嘉诚收购了加迪尼·麦西森公司3%的股份,这让人怀疑,北京会让非华人企业在特别行政区存在多久。对于这一类问题,无论是其政治含义还是经济含义,都需要我们比以往更认真地研究企业与企业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国际商务和管理方面的专家必须与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一道对此加以研究,并且要细心听取经济史学家的意见。

国家与企业和企业与企业的交往关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点虽然被忽视,但它是世界经济和社会中,企业及其他非国家行为者的权力增长与国家权威的相应衰落的一种表现。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衰落”之前曾有过“上升”,而且推断未来会继续衰落将是危险的。这就是说,民族国家作为控制社会和经济

的最重要权威所具有的优势,实际上可能不过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常规。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权威来源的多样化或许才是常规,而本世纪和上个世纪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可能只是一种变异。我们这些认为国家权威在过去一二十年出现衰落的人,并不必然预计这一衰落将无限期地持续到未来。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出现什么。

国家权威的销蚀

国家权威的衰落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其他方面几乎都从属于这三个方面。第一是防务,即确保社会免于暴力;第二是金融,即维持货币的存在,使之成为可靠的交换手段、结算单位和保值工具(与国家计划经济相比,这尤为市场经济所必需);第三是提供福利,即确保大量财富的某些收益能转到老弱病穷者手中,这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也是特别必要的,因为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世界体系往往使富人变得更富,使他们与社会条件低下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很容易就能迅速找到证据表明,在大多数国家中,政府的权力在这三个方面都严重地衰落了,它们对社会提出要求的正当性也因此大打折扣。这正是我们上述所说的全球化力量导致的结果。

如果没有迹象表明邻国想要为了占领土地而入侵本国——现在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那么,抵御外敌入侵的防务就没有必要了。现在,只有在三种例外的情形下,邻国会这么想。一个是控制油田或气田;另一个是控制水源;第三个是领土收复主义,

在这种时候,社会以及政府感到负有道德和情感义务,把由种族和宗教集团居住的土地并入到自己的国家之中(今天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更多的情形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没有发生类似的事)。

国家间进行大规模战争已经变得陈腐过时,这在许多时候都成了国家未加言明的政策,其理由很充分,人们认识到,就生存手段而言,成功地获得世界市场份额已经取代了攻城掠地。陆军和海军依然存在,其原因部分在于为了争夺世界武器市场份额,但更多的则是因为需要它们来维护国内秩序,而不是用它们去击退侵略者。在那些国内秩序没有危险的地方,军队不过是一种装饰性的过时之物。在那些存在失序的地方,社会中某些人仍然会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在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并没有把它视为和平的公正卫士。在许多国家中出现的对征兵工作支持率的下降,就是上述变化的一个表征。

国家权威存在的第二个正当理由——即维持货币的价值——也在急速消失。国家无法继续与外汇市场抗衡,美国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也许还可以加上瑞士联邦)。并非是投机者在兴风作浪,上述的资本流动性意味着,正是在各种货币之间流进流出的金钱而不是贸易平衡,引发市场作出反应,这种反应随之使汇率出现浮动。只有美国所领导的各大银行的强大联盟,才能制止货币的崩溃(如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

金融稳定的三大支柱之一如此脆弱,那么其他两个,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又怎样呢?政府能够决定前者,但只是局限在市场确定的范围之内。利率太高会使金钱流入,但是这将把令人痛苦的成本强加给小企业,并且使得汇率变得过高以致出口商品丧失竞争力。

至于通货膨胀率,政府主要是通过调整利率,来试图控制货

币供应,并以此控制币值。但是,技术的发展将使它们的努力受挫。信用卡的消费在美国迅速增加,在当今的英国也是如此。对于这种购买力,国家无法加以控制。因特网上的电子货币和电子购物受到国家的控制甚至将更少,它的破坏潜能会更大。这一切都对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设置于巴塞尔的欧洲中央银行的国际清算银行去年承认,靠它所订立的银行管理条约无法消除各种危险,以维持国际金融体系。有关储备要求的经验法则过去通常限制了货币供应的增长,并因此限制了通货膨胀,但现在这种经验法则不起作用了。因此,必须相信(和帮助)商业银行自己管理自己。但是,相信银行会进行自我约束,如同要求偷猎者保证不要偷猎一样。所幸,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国家作为社会安全阀,对资源和权利进行再分配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它近来为其权威找到了新的正当理由,这一点特别受到欧洲人的赞赏。在米歇尔·阿尔伯特的语汇中,“莱茵资本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相比)的优势,正是在于它确保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而市场则做不到这一点。^①

人们仍然在为国家权威提供着正当理由,但都缺乏可信性。全球化为跨国公司和许多个人打开了逃税之门。越来越多的逃税之地被发现了,本来应入国库的钱被越来越多地挪作他用,这使得国家的税赋受到损失。福利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削减了。无奈,国家只好出售国有企业来筹措资金。公共部门曾经是国家权力调控经济的最重要手段,即使在二战时的美国,也是如此,现在它却无法逃避全球竞争的压力。贸易保护曾经是国家对付

^① 参见米·阿尔伯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1993年伦敦乌尔出版社版。

外来竞争的经济武器和保护衰落职业的劳动者(诸如农民、渔民、矿工和钢铁工人)的辅助手段,现在,这种权力也在迅速消失。全球化的共识宣告,保护主义是错误的,自由主义是正确的。各国的经验表明,保护主义常常保护的是无效率的、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因而不利于生产的。

一味主张全球化是不对的,但试图要人们相信什么都没改变也行不通,那只是在鼓励人们对世界经济近来出现的变化持鸵鸟态度。正如我以前所说的那样,如果国家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力量,保护社会中弱者的力量,保护环境的力量受到了削弱,那么,社会将任由大企业摆布。我觉得,大多数欧洲人和众多的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子子孙孙在未来将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

(王列 译)

民族国家持久不衰的政治经济学*

萨姆·普利

本文阐发普兰查斯关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的交叉关系的政治结构主义论点。依据国际化资本的逻辑,在最近的将来都不大可能出现超帝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混乱状态。现存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庇护中心)是国际经济管理的潜在基础,但是由于它们处于民族国家范围内,因此仍然要受大众政治的支配。本文批评了最近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探讨了国家机构和跨国公司在资本扩大再生产中的交叉关系,并勾画出跨国机构的若干形式。

不言而喻,经济体系之间的国际联系日益增长。这是斯密和马克思的感受,是大西洋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政治基础,当然也是经济现实。然而,各种全球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理论、生产全球化理论等)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掩盖了民族国家(与一般国家机构相对而言)在资本再

* 本文译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90年第22卷第1期。

生产中持久的重要性,也掩盖了民族国家机构国际突出地位的持久重要性。虽然各种“全球化”论点的鼓吹者也许有理由矢口否认,但是他们的立场强烈暗示,民族国家(即由资产阶级统治的一整套受地理疆界限制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民族基础,已从根本上受到侵蚀。此外,他们还假定跨国资本能够阻止民族国家机构和超国家机构的管理,似乎国家不是资本自身再生产的一部分。

全球资本主义^① 没有自己的国家,这表明该社会制度存在爆发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戈登,1988年;麦克温和塔布,1989年;沃勒斯坦,1984年)。然而,与此同时,各个特定的资本和各个特定的国家继续在经济无政府状态和经济个人主义中寻求协调。在整个国际工商界,单独的多国公司和民族国家之间正在达成协议,以便扩展计划的范围,而且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扩大对它们的生产环境进行跨国管理的范围。但是大多数这样的协议都回避现代国家的关键性管理职能:国家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代表单个资本,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代表资本一般,从事政治活动并具有相对自主性。

本文概括说明了这样的思想,即民族国家内的“庇护中心”(基本上不受大众政治影响的机构,普兰查斯 1974 年),是资本的跨国联系的反映和动力源。这样,民族国家在确定跨国政治议事日程方面仍保有其重要性,虽然我们所知的民族国家的形式正在改变,而且那些政治事务的性质必须为适应这些改革而变化。本文从政治方面对戈登(1988年)以及麦克温和塔布(1989年)最近关于全球化生产的潜在意义的研究作了补充。

① 我强烈反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观念,但我不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它集中研究对于资本扩大再生产起关键作用的政治机构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资本再生产地的多国公司与各种国家机构的交叉关系。本文提出了一个与戈登的经验材料一致的理论概念框架,但是要用实际材料和从历史角度验证其政治和理论基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国际经济无疑比 10 年前更加相互关联。然而,戈登(1988 年)认为,这种资本全球化在投资、金融、贸易和外汇领域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广泛。戈登争辩说,首先,这些变化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早期变化并无质的区别^①;其次,这些变化似乎尚未发展为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所要求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因此,经济增长正在逐步破坏资本持续积累的条件,削弱国家干预的基础,从而导致整个体系更加不稳定(见戈登著作,1988 年版第 54 页及以下几页)。

即使全球化的程度高于戈登的估计,民族国家的政治重要性在最近的将来(25—50 年)也不大可能趋于扩大,即使在主要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民族国家仍然是涉及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政治活动的中心。而且,国际资本的扩张有其自身的互相矛盾的政治逻辑:既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又力图躲避本国或任何国家的管制。^②

从前认为国家的“地点”是在地理疆界内,这类观点限制了

① 正如莱维特所强调的:也许公司国际主义的貌似新颖之处,是建立在大资本曾具有过民族忠诚感这个可疑的假设基础之上的(Quoted in Cohen 1979 年版第 39 页)。

② 戈登着重指出:跨国公司寻求稳定的和隔离的政治与制度保护,以免受国际贸易日趋严重的变化无常的影响和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增长的“自由市场”扩张崩溃的影响(见戈登的著作 1988 年版第 56 页)。

我们在跨国范围内发现资本和国家的交叉关系。多国公司向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国内和国际市场向全球市场的发展,是改变支配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的时间和空间含义的主要决定因素。

社会事件发生的空间和时间并非毫无意义。它们总是表示某种阶级或社会的内容……时间和空间都是通过对于商品生产极其重要的社会活动的组织而得到明确表现的(见哈维依著作,1989年版第239页)。

这一过程总是不完全的,资本将比预期更长地继续在现存民族国家体系内寻求庇护。这两方面都导致阶级政治中一个特别的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将权力确定于资产阶级所控制的空间,同时剥夺那些反对派运动极有可能控制的空间的权力。”(见哈维依著作,1989年版第236—237页)

因此,确定跨国管理的实际地点是一项关键政治任务。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辩论已旷日持久,无需再加以发挥和详细说明。然而,国家权力问题对于全球化问题仍至关重要。尽管激进政治经济学并不包含新古典主义的多元化国家的天真幻想,但是它确实倾向于认为“国家”是受整个资本的直接决定支配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作为由自由选择所决定的和为特定目的服务的行动者消失了。然而,仍旧难以否认国家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它尽可能保留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条件。普兰查斯(1974年)认为,国家具有对于资本的“相对自主性”,这使它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因为国家的行动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是非阶级的,又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这些做法也许不能提供足够的基础,而这种失败会引起政治危机。解决这种政治危机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不是技术关系的经济格局,而是新的阶级和政治实践。因此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

表面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国家权力行使的条件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体制的发展大致符合民族国家体系内正在国际化的资本——以美国资本面貌出现的资本——的主要利益(鲁吉,1982年)。然而这种支配地位并不限于经济领域。激进政治经济学倾向于在其自身的范式内讨论这一过程,已经有大量观点各异的关系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文献问世。^① 主流政治学中普遍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国际关系的主流是合作而不是对抗(E. G. 科汉,1984年)。吉尔平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合作的结构的基础不是偶然存在的:合作是建立在美国对于国际体系的支配地位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他主张维持美国的支配地位(见吉尔平的著作,1988年版第88页)。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描述——虽然不是主观故意——与麦克温和塔布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当前国际社会秩序——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和不稳定的民族国家体系——的衰败,因美国维持这个体系的能力下降而加剧(见麦克温和塔布的著作,1989年版第68页)。^②

激进政治经济学不涉及在其范畴之外的这场辩论的政治学方面,这一理论体系的文献似乎强调,承认国家在国际政策方面所拥有的“相对自主性”的重要性,因而也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关于民族国家在民族资本和影响资本相互竞争的条件下

① 吉尔平最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一次有影响的综合。政治学正越来越多地借用微观交易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国际关系(见桑德勒和考莱的著作,1977年版),或强调谈判和博弈理论发挥主要作用的规范结构(见克拉斯纳的著作,1983年版)。

② 美国目前的支配地位的程度或其衰落的程度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应由观察和经验来判断的问题。我倾向于支持美国继续维持其政治霸权并同时失去一些经济特权的观点。

的政治经济学)在当代历史中的重要性。不过,如果戈登认为国际经济的发展将导致政治更加不稳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凯恩斯课题就会再现。20年前海默就确认了这一点:

“人们要么必须论证凯恩斯的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一道)已经由于多国公司的建立而解决,要么必须承认,通过直接的外国投资使国际工商业一体化的速度大大快于政治一体化的速度是不可行的。可是这样的事恰好正在发生。”(见海默的著作,1970年版第52页)

实质上,两个矛盾的过程已经出现: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政策在与市场和生产一体化(包括阶级再生产)相协调的情况下实行自由化,这意味着民族国家政治的突出地位下降;调整民族国家的基础结构,在国内决策过程中注入国际经济的偏见,却未能逐步建立真正的超国家管理机制。这个矛盾继续处于全球化问题的核心地位。

在美国,与国内宏观经济决策机构的变化相类似的国际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改组尚未完成。^① 财政部仍然是制定国际经济政策的主要中心。然而,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贷款危机问题上的斗争、白宫内重新安置的与国际经济政策有关的人士增加以及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最近在汇率问题上的争执,表明类似的方向变化已经真正开始。这对于全球化的政治意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凭经验来评判的问题。

国家是阶级关系的缩影(见普兰查斯的著作,1978年版第25页),它所包容的阶级力量主要(虽然不完全是)来自剩余价

① 德斯特勒指出,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职责七零八碎地分散属于各个联邦机构,反映出该政策没有重点。原因在于没有把它们与其他重要职责划分开来(见德斯特勒的著作,1980年版第212页)。

值的生产和实现领域,它扮演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组织者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为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经济管理制度而改组国家基础结构,就是代表了主导的和上升的资本集团不付出政治代价而取得制定政策的支配地位的企图。这增加了资本和国家管理者要将这样的决策机构移入政府内禁苑的紧迫性。这些部位即普兰查斯在略为不同的情况下所称的“庇护中心”。

“置换过程”(permutation)(公众进入国家的一些部门)本身,倾向于围绕新的占支配地位的组织重新构建国家的集中统一,这个组织因此成为在国家中资产阶级权力的最高庇护中心,它在左翼政府时期继续作为这一中心而拥有权力(见普兰查斯的著作,1978年版第138页)。

国际化,作为资本重新规划的过程,改变了民族国家政治的性质,强化了不让大众对关键的管理职能进行监督的措施。在这方面,“庇护中心”的典型做法是将财政政策从宏观经济待议事项中抹掉,代之以可靠地掌握在银行家和国家精英阶层手中的货币政策。结果是大众政治的非阶级化和阶级政治的非合法化。这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某些管理和镇压方面,同时也是向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的压力让步。

大多数全球化论者的视角集中在劳动分工及其对劳工政治的影响上。这种强调并没有错,但是考察资本在国家机构内运行的轨迹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多国公司的基本经济特征在于通过公司结构把原来经国际交易和组织的部门变成内部组织。(见海默的著作,1970年版第41页)。工商业机构的这些变化,改变了作为实体的多国公司和作为个人的多国公司官员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回避资本作为矛盾的社会关系性质的企图,最终当然是徒劳的(见比纳的著作,1985年版第57页),但是它增加了资本对付劳动的武器的射程,并且改变了个别企业

之间和产业之间价值转移的范围。这种形式的公司组织允许或迫使多国公司在两个层面上与民族国家体系交叉：一是在公司中央领导这一级，他们的运作与多边国家组织和多边国家关系处于同一层面；二是公司部门领导这一级，他们的运作与民族国家本身的基础结构部门处于同一层面。

资本扩大再生产发生在四个中心领域：劳动（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生产；流通（在投资和消费两个层面）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简要叙述对国家和多国公司的交叉关系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对于观察到的有关细节的详细阐述则属于另一个单独的研究项目。

劳动再生产的地点多半在国内（国家疆界之内），在人们生活其中的物质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空间之内。起初，资本主义经济使这些地点与商品生产脱离而无法固定下来，让劳动的再生产听凭工资的使用价值以及先前公社性质更为突出的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残余摆布。而且最初这些都属于“私人”领域，国家不得侵扰。可是这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将劳动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商品化越来越感兴趣，也受到国家鼓励，要扩大其在劳动再生产领域内的兴趣。跨国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不明确的。一方面，有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多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利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规范，特别是那些关于妇女的社会规范。另一方面，多国公司与将政治权力建立在那些传统规范基础上的民族国家频繁发生冲突。跨国资本在这些情况下的政治利益要依不同时机具体条件而定，但是历史发展的轨道也许趋向于摧毁那些传统的社会结构，并利用民族国家帮助实现这种变革。

甚至在一个协调供应和跨国投资的世界，生产也是在各个单独的地点进行的。国家强制执行劳资之间的行为规范，并且负责

提供维持生产的基本的基础结构。在这方面,民族国家无疑得到多国公司的热情支持。另一方面,多国公司凭借它们更加灵活的组织 and 资本流动,对不那么灵活的组织 and 资本流动及其生产形式构成威胁,这是竞争过程的创造性破坏。在这一点上,反对直接投资的资本管制是维护旧资本利益的最后防线。然而,由于多国公司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从事生产,把国家和经济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倾向于允许“外国的”多国公司渗入民族国家。

在资本之间的冲突中,民族国家必然依据资本的逻辑承认多国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更有活力、实力更强的企业,因此,国家的侧重点转向生产地点的多国企业的利益(国家并非必然要实现这种转变,但是鉴于国家对强大的资本的依赖,国家不这样做无疑会付出巨大代价)。在国家与经济的这种交叉关系中,多国公司也许有助于国家行政部门的现代化,而多国公司生产地点的落实,也要继续依靠现存的民族国家。因此,多国公司与民族国家有什么根本区别,全球化资本积累体制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资本积累体制有什么根本区别,是不明确的。民族国家与多国公司的联盟已经形成多年,也许对双方都有利。

流通领域包含资本流通过程中广泛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广泛存在,而多国公司也许正是在国家和流通的交叉点上具有最大的影响。多国公司要求并且赢得了资本流动的广泛自由、国际上对合同的信守以及合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多国化也限制了单个国家借助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实行社会妥协的余地。

最后,在剩余价值的实现上,多国公司也侵扰国家的特权;在剩余价值实现领域,国家为使投资可能获取剩余价值而在保障国内安宁和提供财政及制度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最重要的问题是,多国公司能够利用内部调拨定价及其行动自由来逃

避民族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它的征税能力。于是，国家开始失去它通过调停解决剩余价值分配问题的能力，就像国家开始失去对自己的资源基地的控制一样。

通过考察这四个领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前两个领域，任何跨国公司的特别作用充其量也是含糊不清的。在流通领域，全球化就其涉及跨国公司控制的范围而言，损害了民族国家准则的信誉；在剩余价值实现领域，民族国家可能正在失去它的基础，因而可能正在失去它在劳资双方政治斗争中的行动自由；在过去三四十年间，这种行动自由似乎对国家和资本都很有用。

国家和国际经济的含糊不清之处的关键，是民族国家自身结构的确定。民族国家是围绕两个中心形成的：国内机构和对外关系。两者都是历史过程中和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的。国内机构不仅仅是由经济关系构成的，它们可能主要是国家在意识形态和镇压方面的职能机构。经济关系的超国家管理，意味着在国家边界之外建立强有力的强制性统治机构，这立刻就给人以怪异之感，它与民族国家的许多其他特性和职能相脱离。跨国管理意味着民族国家要么通过单纯的双边或多边协议，要么通过交叉联合机构来协调政策。它可能是传统的民族国家关系，也可能是跨越空间的渊源限定的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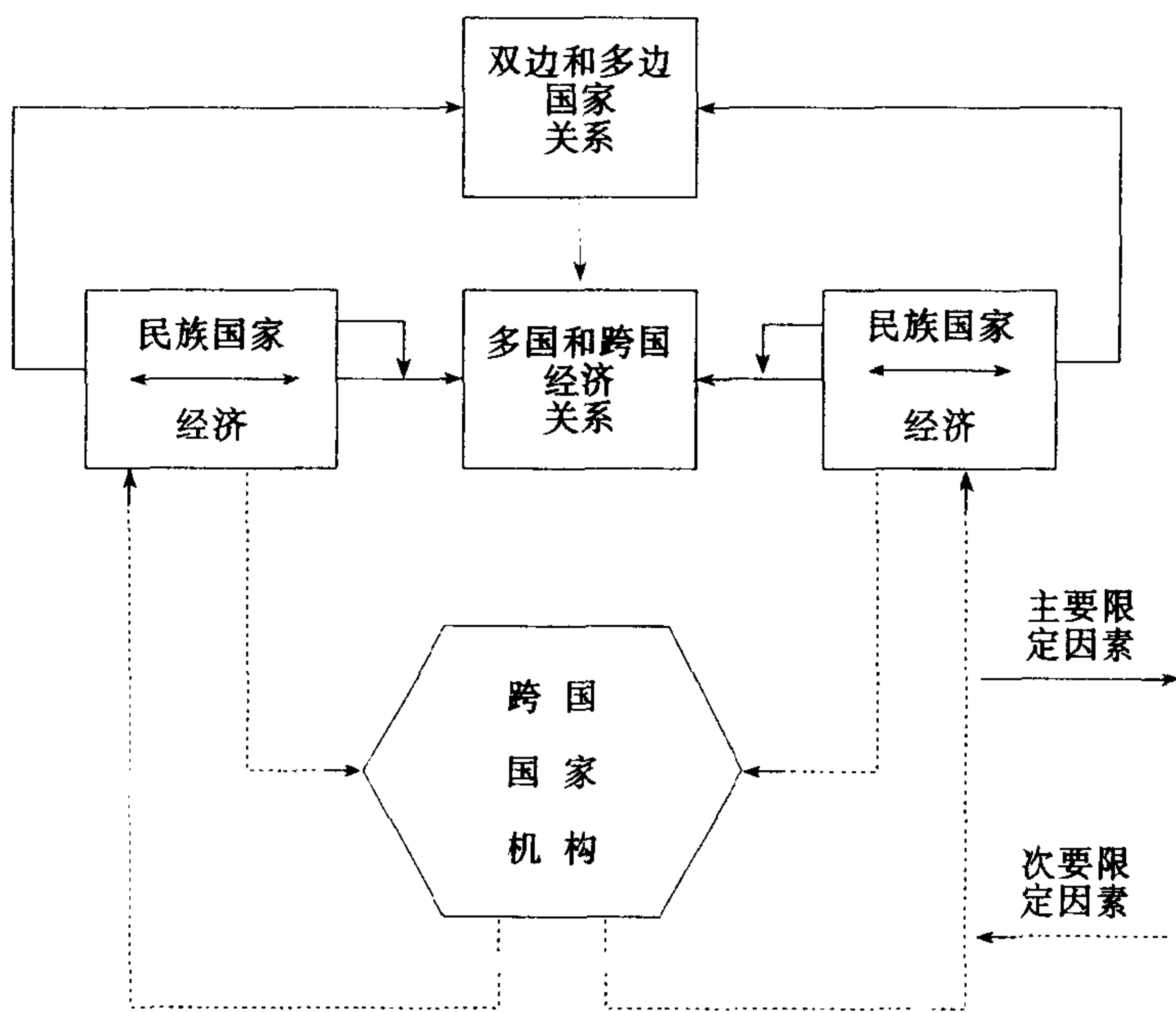
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图1)来考察我们从经济和国家实践的社会政治限定关系中抽象出的这些特征。^① 示意图将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描述为相辅相成的，而在

^① 莱特(1978年)运用了这个方法来解决普兰查斯，而我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形成时发展了这一方法(见波莱的著作，1978年版)。威洛比(1979年)在批判奥康纳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论著中使用了类似的图表。

它们的国际联系中存在次要的限定因素(没有表示出来)。资本之间传统的国际经济关系,由单个的民族国家及双边和多边国家关系作为中介来处理。这些对于民族国家和受民族国家限制的经济结构的现存的构成关系,起到约束和调解的作用。多国和跨国经济关系(鉴于资本扩大再生产中许多要素受地点的限制,仍弄不清楚真正的跨国资本机构现在是否存在,或是否可能存在),既在国家范围内(即在地理框架内),又在国家现存空间之外(即在国际资金转移的信息传输领域、避税区、跨国经营管理和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文化)存在。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由单个民族国家及传统的双边和多边国家协议来规范,而这种规范的程度恰好是全球化问题争论的核心。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关于既定权力结构的观念几乎已经过时,但是只要人们不把既定权力结构视为铁板一块的阴谋集团,那么这种观念仍然是有益的(多姆霍夫,1979年;戴,1979年),因为既定权力结构正在各个层面建立那种对于统治阶级改革政治结构的进取心至关重要的个人关系。

当代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逻辑似乎会导致在跨国资本的形成和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真正的跨国国家机构的产生。然而,这些跨国国家机构也许同样会至少部分地由现存的民族国家组成(然后,跨国机构会重组这些民族国家)。从总体上说,这些跨国国家机构会像民族国家现在管理民族资本一样管理资本。只不过构成它的单个民族国家会削弱(因而跨国资本的影响会更大),而超国家的国家机构对民族国家的影响相应地也更大。

表 1: 国际和跨国经济关系及替代性国家机构



一个超国家公共政策机构会由什么构成呢？每个人都同意这种发展可能出现，而危机是变革的最合适的伙伴。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超国家决策存在的证据是那么少。每一个事例似乎都要回溯到现存的国家机构，从法规的实施（鲁比南德·胡夫保尔，1984年）到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中的支配地位（哈莱，1979年）。朝这一方向发展的最强烈趋势，是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分离（见伊肯贝利的著作，1988年版第240页），

这是有利于跨国国家机构成立的潜在要素：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即庇护中心，与其余部分有效分离。

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国际经济管理制度的三个事例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关于浮动汇率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世纪70年代中期汇率的国际管理体制的变化，体现了美国将美国公司的国际经济关系从敌对国家的政治干预中解脱出来的企图。^①这个政策对美国的多国公司有特别的好处，使这些公司有条件利用可变汇率促成的资本流动性与货币操纵。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可变汇率将“使我们相对较小的外贸部门与庞大的经济和世界其余部分协调”（见弗里德曼的著作，1969年版第192页）。结果表明，可变汇率起到了使相对较大的支付量平衡（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协调”的作用，并促进宏观经济效果和政治跨越国界进行传播。显然，跨越国家边界的宏观经济协调对于跨国经济至关重要，但它似乎不是对资本国际竞争和在特定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国内竞争的实际的替代办法。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现存的国际主义趋势继续倾向于货币主义，即逃避选民直接监督的政策。于是财政政策承担了在国家各组成部分之间进行国内再分配的任务。财政政策还担负国际调整的重任。

国际经济组织体现了刚刚开始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也体现了各民族国家的现存格局和跨国资本保留了巨大的民族资本成分这一现实状况。管理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最重要的组织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具有许多国家职能，能够调拨资金和限

① 与此相类似，伯格斯特指出：美国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几项国际协定的签字国……然而这些国际协定都没有显著影响美国的政策……（见贝尔格斯的著作，1978年版第271页）

制国际金融领域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点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好像是一个初生的国际政府。然而,与其同类组织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由多国组成的机构,并且在领导人的选择、人员配备和财政方面一直受美国的支配。就此而论,它与其说是一个超国家机构,还不如说是一个国家的延伸,它反映了那个国家的一个部门。许多人认为,美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支配地位的削弱将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增加,一些人还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被赋予这种权力(坎普斯,1981年)。然而,那将是一个与目前存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的组织,而且,确实有证据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比过去更能克服美国对它的支配地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处于另一个极端,它也是一个由多国组成的机构,但是没有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它似乎对于单个成员国有更大的独立性,但是在没有管理职能的情况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组合。与20世纪50年代经济发展委员会推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努力几乎一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作用可能是在稳定的国际金融管理立场方面形成长期的共识(斯克拉,1980年;坎普斯,1981年)。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已经足以在技术上支撑经济领域的真正国际的国家组织。然而,在占用构成各国家的运作要素的政治资源以前,这类组织仍会缺乏通常的保障合法性和服从所必须的强制能力。欧洲(经济)共同体在经济一体化和政策整合失败方面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历还提出了一个可以替代全球化的新视角——区域化。^① 许多论证全

① 这段论述中的一些内容是我的同事戴尔·斯奈尔斯建议的,而关注欧洲经济共同体是约翰·威洛比的建议。

球化的经济依据同样适用于区域化,区域化似乎也具有加强社会文化的和政治的凝聚力的优点。正如欧洲共同体、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协定以及印度在南亚的势力范围等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区域化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发展旧福特主义所提倡的规模经济,不如说是为了打破地方一级对劳动力的控制并扩展日趋昂贵的研究与开发的基础结构(与风险保险)。这就提出了成立一批“超级”国家这种新重商主义的解决办法的潜在可能性,“超级”国家是更大的有下限保障的市场和更大规模的政治谈判单位。

然而,欧洲共同体的例子表明,即使区域化也仍然存在问题。格拉尔和蒂格(1989年)指出,1992年计划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解决继续存在的欧洲资本主义增长困难的一项建议而已,而在欧洲共同体政策的许多方面,单个国家仍然起主导作用。欧洲共同体仍未获准建立一个技术性机构来处理交易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① 结果,欧洲共同体的政策仍然受到“民族国家植根其中的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社会环境”的妨碍(见格拉尔的著作,1989年版第47页)。因此,即使欧洲共同体对于国际资本来说是最好的情况之一,但国际资本仍旧未能通过它改组国家机构来进行自我调整,而这些不同的民族国家基础的存在,可能会注定它在欧洲的新架构被发现之前,就有某种悲剧的结局。

经济政策的国际部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方面:它使生产关系和流通关系国际化,但是正如在它之前的社会制度

① 不过,有证据继续显示超国家实体仍未出现。现在,一体化仅仅指多国市场的统一,而它的关于合作和相互作用的定义,要么被新自由主义的套话(货物与货币的自由贸易)所取代,要么与上述套话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一样,它的自我组织能力受到制度关系的历史格局的严重限制。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统一起来的民族国家也许对于资本不再是最合适的了,但是它们由于诸如民族主义之类的社会关系而存留下来。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观点影响很大,甚至戈登以及麦克温 and 塔布在提出替代观点和重新解释论据时,也受到作为它的基础的那些限制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将国家从政治实践中排除(见沃勒斯坦的著作,1984年版第144页)。戈登以及麦克温 and 塔布提出,由于民族国家制度不能调节资本的内在矛盾,资本全球化具有造成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尽管他们将其立场与像沃勒斯坦那样的人——这些人相信“超帝国主义的”跨国或超国家经济,会使政治行动失去意义——的悲观主义立场加以对比,但由于对国家的已经分离了的经济组成部分、特别是非经济组成部分重视不够,两派都忽视民族国家未来潜在的政治权力。这些“民族”可能是扩大了的地区居民共同体,而“国家”可能包括跨越地理边界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控制的实实在在的“庇护中心”;即使没有这些进展,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中仍旧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国内资本和跨国资本的压力下,现有民族国家的重组使这两种倾向更有可能出现。

尽管国际资本的动力机制倾向于建立跨国国家,资本的跨国化程度仍不足以为超民族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基础。因此,正如麦克温 and 塔布指出的,民族(因而民族国家也)仍然是经济组织和经济管理的主要单位(见麦克温 and 塔布的著作,1989年版第68页)。然而,“全球经济”的反面不是民族经济,而是民族国家,而且只是部分相反。经济与国家关系中的质变也许将不仅仅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生。国家机构的确定与非经济的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允许其他的历史力量介入的。如果不是这样

的话,那么民族国家和资本的逻辑可能会趋向于邦联,而非合并和一体化,国家主权在国际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继续存在。

跨国资本及其政治推动力为民族国家带来矛盾,可是缺乏真正的超民族国家机构为资本带来了管理上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欧的自由化可能正在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新的市场的开放、新的投资地点、新的劳动力和苏联势力范围的解体,为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新的”民族国家(如新近资本主义化的波兰)和新的资本主义地区集团(如欧洲共同体内重新统一的德国经济集团),造成了各国重新进行经济和政治竞争的可能性。此外,“民主”的更新和斯大林模式的“进步”政治的毁灭,可能会创造——虽然也许只能在相当长时期以后——一种政治选择的新观念。

综上所述,对我在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政治实践显然在发生变化,但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去10—15年的经历表明,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这些变化并非完全由全球化决定。资本在“本地的”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也倾向于重新构建民族国家,谋求在其中为上升的、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派别——资本正在日益跨国化——保留重要的政治权力庇护中心。这种民族国家更能与跨国资本和其他民族国家发生交叉关系,因而更能发展跨国管理功能。换言之,民族国家统治着,资本自身无法统治。戈登建议反对基于经济理由的悲观主义是正确的。在一个日益非政治的跨国社会关系的时代,如果跨国国家被确认为一个政治研究课题的话,它仍然是一个政治实体,并且仍然要受大众政治的影响。这种跨国家或超民族国家的最终形式,或至少其下一个形式,将历史地依这样的政治实践的后果而定。

(李春放 译)

全球化与停滞*

[美]阿瑟·麦克艾文

很显然,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关系的国际扩展,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痛苦的过程。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恶果将在未来几年内暴露出来。墨西哥的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将最终消失,因为来自美国谷物生产者的大规模竞争将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美国的许多低水平和具有特殊技巧的工人将失业或者面临工资的急剧减少,如阿拉巴马的扫帚制造工人、西弗吉尼亚的玻璃制造工人以及全国与汽车生产有关的工人。

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像其他的全球化进程一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扩大国家间的以及国内的不平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扩展的浪潮,我们还看到

* 作者系马萨诸塞—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译自《每月评论》1994年4月号。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在美国国内,随着1970年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进行,收入不平等明显加剧,到了80年代,这种不平等变得异常严重。一个广为引用的数据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可悲的状况:在1977年至1989年间,美国1%最富的家庭拥有税后收入的60%。在墨西哥,最近几年,特别是80年代中期政府努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计划以来,收入不平等扩大了。收入分配的恶化是80年代拉丁美洲的普遍现象。在那10年里,债务危机把全球化的所有负担都压在了这个地区。

全球化以及作为其中一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社会矛盾,不仅是加大了收入不平等。全球化还加大了对环境的破坏。资本的更大的流动性,使得任何一个政治单位的公民都越来越难以组织和利用他们的政府对污染企业实施管制。

也许,全球化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是它对民主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说明这种影响的一般过程的实例,因为这个协议奉行“市场”原则,北美的经济活动必须在“市场”原则下进行。其实施步骤如下:直接宣布禁止政府发展新的公共部门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原则;有效地限制政府管理私营商务的权力(直接取消某些形式的管制以及赋予商务活动更大的流动性以摆脱烦琐的规则,从而限制其他形式的管制)。显而易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就成了扩展自由资本主义生产边界的一个协议,这样它就限制了人民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实施政治控制的能力,也就限制了民主。

伴随资本主义的成功扩展而来的全球化的社会矛盾,不应被视为一种奇怪现象。用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的概念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其量只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由于出现了

积累,竞争迫使企业为了生存而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那些没有创造性的企业被摧毁了。在充满市场和竞争的世界里,成功者与失败者并存,创造和破坏是同一的。然而,失败者并不只是无人格的企业,也不是抽象的低效的技术,在现实世界里,失败者是人民,有时是资本家。但工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则永远都是失败者。“创造性的破坏”实际上意味着工人的失业,社会的贫困,环境的恶化,人民权利的被剥夺。

当然,当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时,人们并未坐视不动,全球化的社会矛盾不断地造成群众抗议运动。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杰雷米·布莱彻在《民族》周刊(1993年12月6日号)中指出:

“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各种斗争,预示着一场可能彻底重塑世界经济运动……众多的人们为广泛的阶级利益而动员起来采取行动,这在美国多年来还是头一次出现。”

这一运动永远都是可取的,即使它只能对现行秩序产生微小的改进也是好的,因为再小的变革也比没有变革强。

增长抑或停滞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群众运动能否带来更大的变化,带来结构性的变化,能否带来真正与众不同的东西。出现更大变化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球化是否能促成新的经济增长。全球化总是造成社会矛盾和抗议运动,但经济增长一般抑制了这些运动并限制了替代变化的发生。然而,

当我们步入本世纪末时，世界经济陷入了停滞，因此，对替代的任何评估都应该包含对这一停滞及其与全球化的关系的判断。

乍一看来，认为全球化可能与持久停滞相关是一种愚蠢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全球化与增长毕竟在表面上看一直是紧密相联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这两个过程一直在互相强化。主张国际经济更加开放的人注意到了这一显而易见的历史关系，当我们接受体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协议里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时，他们允诺我们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也就是来自经济更高增长的全部收益。但在这里有些问题，请让我指出以下四点：

首先，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一般历史扩展是不同的。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全球化与增长携手并进是一回事，认为在国际贸易上放任自流和减少国家的服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直是资本主义扩展的基础之一，则是另一回事。实际上，所有国家在经济取得某些发展时，都伴随着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积极干预，特别是对外贸进行广泛的管制，无论是早期的美国、德国和英国，还是最近的韩国和日本，都是如此（不言自明，反命题是不正确的）。许多国家对外贸的干预并没有导致成功。历史似乎表明，对于实现经济增长来说，这些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因素。

国家干预发挥重要作用的途径之一是，利用大量的技术排外性来促进产业发展，这些排外性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18世纪末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借助制造业部门平均50%的关税壁垒而繁荣起来。二战后，日本的关税虽然不高，但政府直接严格控制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国内企业发展汽车和计算机等关键工业。此外，发展中国家还采用各种财

政和货币机制、特殊补贴、有时国家开办企业等手段来发展国民经济。有些时候,一些国家还把本国企业推向国际,通过出口导向的增长来取得成功,韩国就是近年来最典型的例子。不管怎样,没有一个国家出口导向的增长是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的不加管理、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来获得的。

当然,今天的美国已经渡过了它的初始发展阶段,不管在那一初始阶段国家对贸易的控制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在现时代都可能促进巨大增长。无疑,许多大型美国企业都能从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类似协议中获利。它们将得到市场和资源,将更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但是,美国大型公司获利并不等于美国经济的增长。例如,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公司的海外分部保持了它们在世界出口额中的份额,而美国本土分部的份额却减少了,其重要性也下降了。与此同时,上世纪末的英国历史也表明,民族资本在国际上的成功并不必然等同于国民经济的增长。

第二,当全球化与快速增长相伴随时,增长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并不能归因于全球化本身。这一论点已由哈里·马格多夫和保罗·斯威奇作了最充分的阐述,它的依据是现时代(过去的100年)的垄断资本主义与早期小规模、更富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19世纪末,美国和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大型企业,它们具有进行生产扩张的巨大能力。而且,由于它们集中了大量财富,它们的积累能力也大大增强。如果这一巨大的积累能力能够找到吸纳它们的同样巨大的投资机会,增长就会出现。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的正常扩展和日常技术革新、新市场开放和新资源开发的体系范围内,实际上无法保证足够的投资机会。高速增长的出现实际上是特殊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诸如蒸汽动力、铁路等划时代的发明以及提供了极

其有利的商务环境的那些历史事件。

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期。战后,重建工作、军事生产带来的技术副产品、耐用消费品需求的旺盛、美国霸权导致的国际资本主义稳定状态、政府作用的增强产生了巨大需求、尤其是巨大的军事开支等等,这些因素造就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些特殊的因素——人们还可以列举出其他因素——在本质上要么是短暂的(如战后重建),要么是有自我局限性的(如政府经济作用的增强)。它们能造就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但不能支持无限期的高速增长。到本世纪70年代,这些因素消失了,我们也就进入了一个停滞时代。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重新有所增长,其基础是新的军备建设和巨额的政府赤字,但这种增长不会持久,也不可能持久。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美国企业进军亚洲市场等,能否带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答案看来显然是否定的,除非这种新的全球化能创造出导致高速增长的那些条件。没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领域的扩展本身会自然而然实现经济增长。

第三,当全球化产生不平等时,它将损害增长。如果全球化导致了消费需求的足够增长,或者为振兴政府开支提供了基础,那么由于投资机会有限所造成的长期经济停滞将得以减轻。但是,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体现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很可能会造成不平等,从而加剧经济停滞。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得美国企业进入墨西哥产地,并在协议中为美国企业制定直接条款,它本身就是那些注重消除管制和降低成本的美企业的宏大战略的一部分。然而,这一战略也将迫使工资下降、社会支出缩减,所以由成本降低获得的利益将被需求下跌带来的

损失所抵消。^① 而且,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还将限制政府应用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需求的能力。美国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认为,通过开放墨西哥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增加对美国商品的需求。虽然可能存在着这样的短期利益,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分析只是重复了重商主义理想的错误,即出口增长可以在没有进口或外商投资增长与之相互平衡的情况下出现。

不仅如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政府需求领域和私人部门,停滞和不平等是互相循环强化的过程。在美国和第三世界之间,低增长与不平等造成了大量债务。债务负担制约了私人 and 公共支出,低增长和不平等也就因此持续下来。

不平等不仅在需求方面制约着增长。低工资可能还降低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美国技术的飞速进步至少有部分原因在于劳工短缺和比欧洲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准。

① 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言,与美国的不平等的加剧,不可能由墨西哥的工资水准提高和平等的增加所抵消。美国的工资水准不会因生产向墨西哥的实际转移而受到太多的抑制(墨西哥的工人将从这种转移中获益),倒会因这种转移所带来的威胁而受到极大的抑制。而且,在墨西哥政府继续执行不平等的政策时,如压制和控制工会、使税收政策有利于富人、支持土地重新集中等,任何趋向更大平等的发展都大大受阻。最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美国成本低廉的商品出口到墨西哥,墨西哥将因此身受其害。谷物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美国的服务业将可能使墨西哥的小公司被淘汰出局。其结果是,大量的墨西哥工人和农民失业,墨西哥的劳工后备军大为膨胀,工资处于最低水平。当失业真正发生时,较少管制的贸易将更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不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高工资使美国企业更快地进行革新。今天,当美国企业能够从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得到更低工资的劳动力时,技术革新的压力也就小多了。而且,低水准工资还会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美国的商业全球化战略似乎只是建立在作为生产成本的工资观念之上。但是很显然,工资也是一种动力。压低工资的战略也会抑制这一动力。

第四,当全球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最有效基础时,国际贸易的稳固的制度基础已经形成。正如我早就指出的,成功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的简单扩展。当全球化过去最有效地促进高速增长时,它是在强有力的国家,也就是超级帝国权力的庇护之下出现的。这一强权能够调节国际事务并创造出鼓励商业扩展的稳定性。这一观点在积累理论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得到了有益的阐述,这一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任何时期,扩张都一直是以一整套社会制度为基础并由其组织实施的。这些制度管理着在自由状态下会自我毁灭的市场运行,其中包括,劳工组织、国家运行机构和国际事务机构。在此,只需指出,在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缺乏管理国际事务的机构。

与全球化早期相对成功的发展相比,当代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19世纪中期英国的霸权保持了世界的稳定。战后的25年里,美国霸权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在这些时期,都存在着一个工业领袖、一个相对来说无法挑战的政治军事权威、一套规范市场运作的金融关系。全球化因此能飞速发展,能加强帝国的权力,能强化整个世界体系(尽管在另一方面,过度的扩张最终也会结束他们的霸权)。

在当代,虽然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无法提供帝国式的稳定,它也不再是十足的工业领袖了。国际金融秩序不稳定,而且经常变动。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似乎也不能有效保障新扩

张时代世界所需要的那种稳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全球化的影响是极为不同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即一种没有足够调节手段的体系扩张,是对体系的破坏,而不是增强。

全球化的替代

我认为上述各点至少使我们有一些理由预期,当前的全球化浪潮并不能很快结束低速经济增长时代。而且,就资本主义发展的“创造性的破坏”而言,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它的破坏性似乎大于创造性。这就意味着,在北美和其他地方,全球化引起的社会矛盾所造成的群众运动将产生某些影响,这一点对于各种替代选择而言,就变得特别重要。

但是,我们所说的替代选择是哪一类替代选择呢?我们没有理由确信,全球化和停滞正在产生的力量可能与广为人们接受的建立更平等和更民主社会的目标彼此相关。那种可能导致乐观主义的对当前形势的理解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对全球化和停滞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推动进步,我们又能从这种分析中得到什么启示?虽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思索和推理,但仍然有一些经验观察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首先,全球化促使世界不同地区工人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某些剧烈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工人与墨西哥以及其他较贫穷国家工人的关系,认识到这一点是有益的。随着贸易壁垒的消除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展,处于世界经济不同组成部分的工人在以同样的方式为同一个市场生产着同样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由此形成的

相互竞争关系中,他们反倒有了共同的利益,这为团结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早期,旧的方式是第三世界的工人把所生产的原材料出口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人将原材料转化为制成品,将这种方式与当前的情形相比较,团结的物质基础就变得清楚了。在早期,第三世界的低工资使发达国家的工人直接受益。第三世界铜矿工人、甘蔗收割工人或香蕉种植工人的低工资意味着美国市场商品的低价格。因此,当第三世界工人的工资提高时,发达国家的工人将会蒙受损失。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设在墨西哥埃莫西约福特工厂的低工资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它意味着美国的小汽车更便宜了,但同时更深层、更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则是,美国汽车工人的工资下降了。全球化使得技术转让超越了国界,使得不同地区的工人互相竞争,从而为国际工人的团结创造了基础。现在,美国密歇根工人与墨西哥莫雷洛斯工人的关系同伊利诺斯工人与印第安纳工人的关系一模一样。

当然,共同的物质联系并不能直接导致一致的政治行动。而且,不同国家工人间的竞争反而会引起反动的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和冲突。不过,共同的物质利益的确为共同行动^①提供了强大的潜能,或者至少是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增强了国际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基础。

^① 不幸的是,与此同时,作为力量联合的结果,民族国家内处于不同阶层的工人之间的分歧似乎加大了。伴随着全球化,美国的受高等教育的高工资工人与未受良好教育的低工资工人的鸿沟明显增大了。大城市有明显的两极化,例如在纽约和洛杉矶,这边是财富和权力的顶峰,隔几条街就是第三世界式贫困的底层。

此外,全球化还正在改变着美国、墨西哥和其他所有地方的劳动力结构,其改变方式使得地区性和国际性的政治行动成为可能。最深刻的变化之一是,雇佣劳动者中的女性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展意味着家庭生产的消亡,而家庭生产是属于妇女的传统领域。由于妇女成为雇佣劳动者,她们往往是受国际竞争影响最大的雇佣劳动者。美国生产流水线上和化妆品业的妇女高就业率,表明了妇女在新兴的全球化经济里所处的特殊地位。

妇女的特殊地位在任何关于替代问题的讨论中都很重要。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妇女的政治斗争都是群众性抗议运动中最活跃的部分之一。而且妇女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斗争极有可能具有更为广阔的方向。因为女工以其作为女人的经验,极有可能建立起工作场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社区”问题在替代当前的全球化动力的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泛存在的对全球化发自内心的反对,无论是以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出现,还是表现在反对外国跨国公司兼并美国公司上,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认为全球化破坏了他们控制自己经济生活的能力,威胁了社区的安全。有时候,这些反对似乎是不理智的,并且因此受到全球化支持者的嘲笑。美国企业已经在低工资国家进行投资好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什么反对以法兰克福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兼并以曼哈顿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呢?要知道,所有的跨国公司的决策基础都是一样的!但是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在针对我们生活变得市场化的极为明晰可见的征兆采取行动时,却是很理智的。

反对市场化,维护社区的斗争,即反对使其他社会价值屈从对私人利益的考虑的斗争,为我们在现时期如何建构替代选择提供了线索。人们维护社区的愿望,同要求有意义的民主、真正

控制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事务的愿望,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不可能一方面摧毁人们在其中得到最强烈的互相认同的地方性和全国性社区,一方面同时又建立一个民主社会。

此外,人们赋予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告诉了我们某些制定经济项目的方法。所谓共同体就是人与他人的、有形的、富于智慧的联系,人们从这种联系中体会到一种历史纽带感。例如,这种价值和意义表明,建立在出口扩张基础上的经济项目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出口导向的增长能为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奠定基础,尽管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搞得最成功的国家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的教条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我们向国外市场渗透的能力来制定经济项目的话,那么,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将面对维护社区与经济成功之间的冲突。

出口导向的增长在重新引发与维护社区的冲突的同时,还始终对建立一个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构成威胁。如果我们评价经济项目的基本标准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的成功,那么,我们就必须采取相应的必要步骤。这些步骤通常意味着,限制工资的增长或将企业转移到低工资地区、限制社会计划、用税收激励公司以及其他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政策。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一种由外向性确定的经济项目排除了某种类型的控制,这些控制对于想要执行充分就业政策的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性,因为它可能是通向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唯一途径。而且,没有有意义的工作,人们就过不上充实的生活,充分就业使人们更有可能获得有意义的工作。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不限制外向型商贸关系,包括控制贸易和资本流动,有关充分就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得到实现。各类外国商业活动当然在合理的经济项目中发挥着作用,但问题在于应该使经济要求从属于社会目标和社会

价值,而这是出口导向的经济计划所做不到的。

替代性的经济计划要求更平等的收入、充分就业、内向型经济,它与目前的停滞有着某种联系。平等、充分就业和维护社区的政策,不仅本身是值得追求的,而且它们还解开了停滞之谜。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停滞的根源之一是,存在于世界和包括美国和墨西哥在内的许多国家内部的巨大的不平等。因此,要求平等,就是要求某种改革,这种改革是与经济等级制中最底层的人们的需要以及体系谋求稳定和生存的需要相一致的。充分就业和更大的平等,远比任何开发新出口市场的计划更能扩展市场。

同样,如果由于国际事务的不稳定造成了持久的停滞,那么更少地、而不是更多地依赖国际经济关系就是正确的。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帝国力量保持稳定的条件下,越来越强调国际经济联系将加剧停滞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在某些场合,这样看问题会推导出一个重建超级帝国力量的政策,但我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而且这一政策也是不值得追求的。因此对停滞的恰如其分的反应应当是,进行替代性的改革,加强社区并建立一个内向型的经济。

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对这些关于替代选择的阐述都必须加以思考,它们本身不仅含糊不清,而且可能自相矛盾。例如,一方面,我强调指出,工人的国际团结为发动更有力的社会运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我又说,我们对全球化的反应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社区上,以此作为我们经济替代选择的基础。这两者如何才能结合起来,我们还不清楚。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重视社区会成为复古、排外、传统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的借口。控制对外商贸很容易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合理化。在美国,这意味着种族主义。目标在于克服停滞、

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计划,只能进一步加剧环境破坏。还可以列出许多其他问题。

对于我的模棱两可的论述,我只能说,当代事务的发展进程中还有更多的问题。至少,我所讨论的替代办法有其优点,它植根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全球化与停滞的经济现实。这些现实是北美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所面临的灾难。我们最好还是去为它找到一些替代选择。

这绝非易事!

(赖海榕 译 王列 校)

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

[英]克里斯·哈曼

全球化已经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正统观念之一。这个词屡屡出现于财政记录和公司报告中,可以在从约翰·雷德伍德到托尼·布莱尔的几乎所有主流政治家们的演说中听到,在公司的业务往来和工厂的车间工会代表会议上也是很流行的。含义通常是指世界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政府和工人实际上都同样没有能力去对抗它。

这种新阶段被认为是由生产和市场的不断国际化带来的。据说,面对“全球竞争”,企业将比从前更多地依赖于它们的产品销往海外的能力。只有在它们成为跨国企业、能够在世界规模上组织自己的生产而忽略国家界限的前提下,才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它们就能够摆脱民族国家或某一国家内部发生的工人运动的控制。它们可以自由地将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最廉价的地方,从而挫败工人们利用工会行动来捍卫工资和自身

* 本文译自《国际社会主义》1996 年第 73 期冬季号。

地位的企图。

这一关于全球化的共识,通常是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明确表达出来的。他们坚持认为,新的世界秩序将排除一切通过凯恩斯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来控制世界体系的企图,更不用说社会主义了。他们声称,任何这样的企图都只能导致一种落后的封闭经济。但是,被排除在外的远不只是那些广泛深远的变迁,最温和的改革也不例外——如比中间值的三分之一略多一些的最低工资线,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试图保住工作以抵抗经济衰退的毁灭性影响。如果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太强硬的话,那么公司将可以立即收拾行李,移师他处。如果政府进行富有意义的改革,那么新的投资将流向世界上更有利可图的地方。人们所能做的就是,精心制订一些政策,它们将使某些特定的工人群体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具有更强的生产能力,而花费的成本更低,或者能使某个政府在保证获利上压过其他政府。

这些言论和主张,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存在的富人和老百姓之间收入差距日益增大所作的辩解提供了论据。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富人们因其具有稀缺的技能而受到“奖励”,而工人们则由于其拥有的劳动技能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中容易被替代,因而获得较低的报酬。但是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不止于此,它还有着更广泛的反响。革命的左派和极右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都曾作出过反应。《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的前任编辑奈杰尔·哈里斯在十多年前就写道:

……单一的全球劳动力市场,其每一技能等级的劳动力价格都在趋于一致,而不管国家发达还是不发达……这意思是说,不同国家的工人,相互竞争以获得就业机会,他

们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前提下向雇主提供最低的价格。工会影响这种交易的能力……在世界上几乎根本不存在。^①

更近一些时候,英国保守党的右翼灾星、亿万富翁詹姆斯·戈德史密斯在英国一家周刊《论坛报》上的一篇访问记中谈到:

某些事造成了失业,但那并不是高科技,高科技只是一般的借口而已。你所面临的是生产向海外大规模的转移……世界体系出钱让公司的业主关闭工厂,让所有人离开工作,然后移师海外。这样的事情正在全球发生。它覆盖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现在为数不多,但它们正快速地向劳动力最廉价的地方流动。^②

关于全球化的共识已经变得如此地强烈,那些仍然想对世界体系的逻辑提出挑战的人因而常常被当作开历史倒车的人。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我们必须介入的环境,因为我们刚刚摆脱大多数主流思想的约束,开始注重国际资本主义势力。

然而,除了那些想说全球化这一皇帝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左翼革命者外,还有一些人也发表了不同看法。美国激进的经济学家戴维·戈登八年前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对关于全球化的共识提出了质疑。近来,学院派的改良主义者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有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曼、W.

① 奈·哈里斯:《第三世界的终结》1986年伦敦版第198页。

② 《论坛报》1996年7月21日。

鲁伊格罗克和 R. 范图尔德,也都对全球化的论点提出了正面质疑。^① 他们的实际结论大部分与我们的大相径庭。然而,他们提出的对全球化的质疑,值得我们去认真考察,因为他们确实在全球化共识的一些主要论点中发现了漏洞,尽管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用什么去填充这些漏洞。

反 驳

反对者的核心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正统观念也许是从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开始的,但是其中有些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种正统观念进而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解释世界经济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企业行为,它们的世界经济观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实际生活存在差异。全球化正统观念的拥护者常常将“新古典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的情况与实际发生的事混为一谈。

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地寻找市场以及跨国界的资金流动,一直是资本主义从中

^① 戴·戈登:《全球的经济》,载于《新左翼评论》1988年3—4月第168期;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1996年伦敦版;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载于《新左翼评论》1995年第214期;W. 鲁伊格罗克、R. 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1995年伦敦版。

世纪诞生以来的一种特征。^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早在1821年就坚持认为,国家不应该通过干预投资来保护就业,因为“如果不允许资本去获得在这里使用机器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纯收益的话,资本将会被挪往国外”,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大降低”。^②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世界体系时所用的术语,可能与今天把全球竞争视为一种崭新的开始的那些人使用的术语极为相似。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③

19世纪下半叶,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疑问与过去 30

① 如伟大的经济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在《形形色色的交换》(载于《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82年纽约版第2卷)中所生动描述的。

②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995年剑桥版第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76页。——译者注

年中的发展一样巨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贸易额增长了 900%——1870 年到 1913 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 3.4%。与此同时,世界财政也有巨大的增长,因为财政体系是建立在国际黄金自由流动的基础上的。到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英国将近一半的投资流向了海外,英国那时仍然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①

近年来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只是大致相同而已,而政府插手去干预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却比那时要多得多。出口量在 1960 年到 1990 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在世界总产量中已占大约 20%,但这说明占总产量 80% 的产品仍然是为生产国的国内市场而生产的。

国际贸易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发展得比 19 世纪下半叶快——以约 9.9% 的年增长率发展直至 1973 年——但近期却不是这样。在过去的 15 年中,发达国家的三个主要成员——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进出口份额在总产量中保持了或多或少的固定比重。^② 事实上,国际贸易的扩展始终都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例外,相反,在 1914 年之后的 30 多年中它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倒是个例外。如果 1913 年的国际贸易额为 100 的话,那么 1920—1925 年它跌到 82;到 1931—1935 年它仅升至 93;直到 1948 年,它才升到 103,刚刚超过 1913 年水平。

那些年国际贸易的衰落伴随着金本位的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两次崩溃——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 20 世纪 30

① 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数字,见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以及 W. 鲁伊格罗克、R. 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 124 页。

② 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 19—22 页。

年代初的大萧条。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种新型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既以黄金又以美元为基础,并且依赖政府去努力固定汇率。由于这一体系在70年代初也崩溃了,在与其他货币的相互联系中,各种货币的价值自此自由“浮动”,但是政府(中央银行)通过干预买卖货币来施加巨大的影响。结果是,货币水平极大地取决于政府(或中央银行)间的协商,远远超过对单纯的市场力量的依赖。正如曼所说: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约达75%,这说明外国资本并不完全是国际性流动的……不同国家之间实际利率的差距与它们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差距大致相同。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资本究竟是否比1914年之前更具有跨国性是值得怀疑的,欧盟的特殊情况除外。^①

比贸易增长更重要的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的增长速度是贸易增长速度的4倍,从那以后,一直是它的2倍。^②“全球化”正统观念的许多表面上看令人信服的地方正是源自于此。它使这种正统性能够描绘出一幅图画:资本跨越国界平稳地流动,为了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大的利益,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生产设备在全球各地趋于一致。

事实上,真正的资本定位图却与此大不相同。几乎所有大

①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17—118页。

②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数字,见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128页。

的跨国公司都倾向于在一个国家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不是分散到别的国家。在《幸福》公布的 100 家最大的公司中,有 40 家将它们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市场,但仅有 18 家将它们的主要资产放在海外,仅有 19 家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在国外。^①更有甚者,那些少数的以这种方式国际化了的跨国公司,通常是那些建立在小的欧洲国家——瑞士、荷兰、瑞典的公司,而这种“国际化”通常采用在邻近的工业地区投资的方式(荷兰资本面向英国和德国,瑞士资本面向德国和法国的邻近地区,等等)。它常常更多地涉及的是资本的“地区化”,而不是国际化。

最大的跨国公司并不是在全球均衡地投资。大多数的贸易和投资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英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是在美国,27%在西欧。在全球海外投资总额中,75%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10 个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了 16.5%的份额,而剩下的其他国家仅占 8.5%。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个均匀的“全球”投资竞技场,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实际上被划在有关投资范围的地图之外。如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所指出的:

由于公司利用新技术的力量建立跨越国界、互相直接联系的活动体系,它们日益集中在那些为收回它们的投资提供最大潜能的地区。此外,在不断增加的核心工业部门中,竞争的基础正转向强调产品的质量,而不是仅看重成本。那些能够提供熟练工人和高效基础设施的地方,日益

^① W. 鲁伊格罗克、R. 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 156 页。

成为对新投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①

而且,一个国家公司的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本国和毗邻的国家,下表为主要跨国公司 1992—1993 年的情况:

跨国公司的业务在本国所占的比例^② (%)

	制造业 销售额	服务业 销售额	制造业 资产	服务业 资产
美国	64	75	70	74
日本	75	77	97	92
德国	48	65	—	—
法国	45	69	55	50
英国	36	61	39	61

美国跨国公司的资产主要集中在本国,日本公司的资产绝大多数也集中于本国。至于欧洲大国,如果把“海外”资产的主要集聚地计算在内的话,情况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它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其他的欧洲国家。法国 31% 的制造业资产和 35% 的服务业资产分布在别的欧洲国家,在可以被称为法国“本土”地区的欧盟,制造业和服务业资产累计数字已分别达到

① 约·斯托普福德、苏·斯特兰奇:《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1991年剑桥版第1页。

② 图表以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91—94页中提供的数字为基础。

86%和85%。德国和意大利公司的资产分布没有统计数字,但对其行为的调查表明,它们趋向于像法国一样走“地区性”的道路。^①

这份图表中关于欧洲部分的结果,得到了1990年对“200家欧洲大公司的顶层管理者”调查的证实。调查表明,他们“计划在未来的五年中,将所有生产的93%放在欧洲进行,80%的原料从欧洲供应商处购买,83%的产品销给欧洲客户”^②。赫斯特和汤普森解释说:

在日本和美国,资产极度集中于本国是显而易见的……跨国公司仍然把“本国基地”当作它们所有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不在意有关全球化的任何推测。^③

这张图表有关欧洲跨国公司的部分略微有些不清楚,因为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在邻近的欧洲国家投资,但如果把欧盟作为“本地区”对待的话,集中的程度可以与美国和日本相抗衡。英国的跨国公司是个例外,它们20%以上的资产在美国,这一数字接近在欧洲大陆的水平。然而,这两者比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投入资产的总和都要高(包括被称为“亚洲虎”的国家和地区)。

这种状况说明,我们所面临的也许并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诸如北美、日本和欧洲等先进的工业国家内部的地区一体化。

① W.鲁伊格罗克、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128页。

② 同上,第159页。

③ 保·赫斯特、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95页。

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所说的“全球化”一词将由“地区化”所代替。^①

跨国公司

全球化“常识”强调跨国公司的持续增长,认为它们漫游世界,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阶段为投资寻找最廉价的地方。

由于这一认识是从许多重要产业的真正发展情况出发的,它对许多人来说听起来是真实的,它不会被上面举出的贸易和投资的有关数据轻易地驳倒。1914年的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水平高于今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生产组织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同样是10亿英镑的总投资,它也许表示对100家相互竞争的工厂的投资,也许表示对一个企业集团——各个企业分别承担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部分——的投资。

事实上,上一世纪的生产还是发生了原始的投资数据体现不出来的某种变化。直到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的工业仍由

① 事实上,如我以前所论述的那样,存在着强大的反趋势,它们在不断地瓦解“地区性”集中。这在英国尤其明显,在那里,一方面,对主要的公司来说,对美国的投资就像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投资一样重要,同时另一方面,来自日本的对内投资在某些工业部门中也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在法国和德国,欧洲一体化趋势在诸如工程和航空航天等产业中也受到不断集中的资本间互相对立的国内一体化集团的抵制。见我的《今日国家和资本》,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51期。

大量的小生产单位组成。到上个世纪末开始发生变化,生产集中在各主要国家的托拉斯和企业集团手中,它们开始从外国竞争对手手中争夺世界市场。但是,制造业生产的国际一体化几乎还没有形成,早期的跨国公司往往或是为西方的制造业从第三世界榨取原材料(如联合利华或石油公司),或是拥有生产完全当地化的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如福特)。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仍完全保持着这种状况,即有少量全国性公司(即便有些归外国所有),它们常常紧紧地依赖国家,控制着各自国家内部每一重要的工业部门。但那时新的生产模式已经开始形成。产业以跨国方式进行重组,它往往与新一轮欧洲跨国公司的兴起联系起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之后的产业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

但是,把这些视为(像本世纪初的资本全国性集中一样的)开创资本主义历史新阶段的重要成就,与接受全球化正统观念并不是一回事。尽管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写作的风格极端地学院化,但还是比赫斯特和汤普森更有价值,因为他们注意到重要的变化一直在发生,同时又坚持认为,这些变化并不能导致全球化正统观念所得出的那些结论。

他们指出,为对付国际竞争的增长而进行的生产的合理化,并不意味着所有或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一体化的生产工序——即所谓的“全球装配线”。^①不同的跨国公司对于重组的压力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建立全球装配线只是一种特殊的反应,它并不是最常见的。为此进行的许多尝试都

① 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使用“大福特主义”一词——但像标志全球化一样,也把它用于指在欧洲大陆的生产一体化。

没有奏效。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似乎确实正在向这一方向发展,那时它们首次开始讨论“世界汽车”。但是这一思想没有得以实现,而两个公司继续在欧洲的生产线上,用完全不同的部件,生产出与北美生产线上所生产的完全不同的汽车。

戈登八年前就指出,有关美国跨国公司的数字并不支持下述说法,即总体说来,它们越来越依赖于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的部件:

1966 年,公司内部的贸易额,包括美国母公司从美国跨国公司的控股海外分公司的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16.8%。到 1982 年,这一比例几乎没有增长,仅升至 17.1%。

更富戏剧性的是,1966 年,在美国制造业进口总额中,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为 75%。到 1977 年,这一百分比已降至 58%。到 1983 年,它进一步降到 46.3%。

同样,在由控制海外零件装配的关税条例所约制的美国进口中,进口总值中海外附加值部分所占的比例,1966 年为 51.7%,而 1979 年为 50.9%,说明来自海外工厂的附加值比例没有提高。^①

他指出,“即便在第三世界,美国跨国公司在制造业上投资的目的也主要是销往国内的产品生产,而不是为出口……”^②

① 保·赫斯特和格·汤普森:《争论中的全球化》第 49 页。

② 同上,第 50 页。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电子工业似乎比其他行业更适宜于作为全球装配线方法的范例,它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生产集成电路块和其他部件,而在另一些国家装配,最终销往先进国家。但是,至少有一项研究表明,这种趋势在80年代中期有所倒退:

随着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相应的装配工作量变得越来越少……这些变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因此也减少了在第三世界生产与发达国家把半自动化装配线和组装芯片联合在一起建厂的那种经济结构相比的吸引力。尽管第三世界的工厂似乎并未被放弃,但看起来在先进国家建立新的装配厂更为有利……半导体生产的许多地理布局特征与跨国公司普遍具有的陈旧的选址战略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并不一致。^①

事实上,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较少依靠全球装配线,而更多地依赖原有的把投资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先进的工业国家及其邻国的方法,依靠单纯的投资、研究和开发以及生产的规模来保持高于所有竞争对手的优势,不管这些公司是一国的还是跨国的公司。例如,正是以这种方式,波音公司逐渐统治了民用飞机的国际市场,日本汽车公司赢得了它们巨大的出口(直到20世纪90年代,丰田和尼桑才开始了重大的海外投资),韩国的造船工业逐渐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了巨大的份额。戈登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工业国家的最大的收益已经来自资本高度集约的工业,如钢铁、造船、化工,近些年则是来自汽车工

^① A. 塞那:《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场所》,载于斯科特和斯托普福德:《生产,工作,领土》1986年波士顿版第116—120页。

业。取得这些巨大进展的关键是国家大量的投资和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①

第三种方式正日益受到重视。它屏弃了那种把生产主要设置在民族国家内的做法,又没有转向“全球装配线”的陈规旧习。原先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公司为了战胜竞争对手以获得出口上的成功而在当地建立工厂。它们开始可能只是“螺丝刀工厂”,即专门组装从跨国公司本国进口的部件。但是后来逐渐转向由当地的公司提供部件。这些公司有效地成为跨国公司在所在国的卫星公司,它们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与当地的或地区性的竞争者斗争。这种模式,按照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的观点,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全球化”,而是全球的当地化。

这种战略对于有关的公司来说具有极大的优势,使它们对当地市场的影响能够远远超过其投资本身产生的影响,因为它实际上为了实现自己的竞争目标而动员了当地供应商的资本。它本身花费的资本可能大大低于在“全球装配线”方式下所花费的资本。它还能使公司大幅度削减为当地工厂提供零部件所需的费用——这就是在“外购”的名义下,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和欧洲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②三星公司苏格兰子公司的总理解释说:

三星公司在欧洲的投资,开始时30%左右的资产由韩国的母公司提供。其余部分由当地提供……三星公司有雄心使其欧洲业务自给自足。

① 戴·戈登:《全球的经济》第52页。

② 见关于福特公司在利物浦的哈莱伍德建厂计划的报道《中型面包车滚滚驶向默西工厂》,载于《卫报》1996年9月19日。

将产品从韩国运去需要 40—50 天的时间。供应渠道的反应快慢对于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供应渠道也是我们成本中最大的构成要素。^①

工资并非三星公司在何处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它的平均小时工资,从马来西亚的 3 美元、韩国和苏格兰的 10 美元以及巴塞罗那的 13 美元到柏林的 27 美元不等。^② 采用这种“丰田式”或“全球地方化”方式的跨国公司,其行为方式与确信全球装配线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全球化共识所设想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

首先,采用这种方式的跨国公司,与那些每一项特定投资都只是其世界范围生产链中很小一部分的公司相比,可能对转移任何单独的投资项目都不太感兴趣,因为这种投资能够把当地供应商的附加资本与本公司联系在一起。第二,一个跨国公司如果采取“全球装配线”的方式,就会去反对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贸易保护的 effort,因为这些保护主义措施会打乱它们的全球核算。而作为“当地的”生产者,“丰田式”跨国公司可以不在乎它们设有子公司的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有时,甚至将其作为避开以他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的竞争的一种方式而欢迎这种保护措施。例如,日本和韩国在英国投资的公司因此就并不害怕欧盟采取限制它们出口的保护主义措施。相反,一旦在这里建立公司,它们就能够感到它们将完全能从这些措施中获益,因为这些措施不会打击作为“当地生产者”的它们,而将打击其他的外国竞争者。

① 《金融时报》1996 年 12 月 21 日。

② 同上。

全球化正统观念无法区分跨国公司对不断加剧的竞争作出反应的不同方式,因为它假定,世界规模的创新进展,总是要求有世界规模的生产一体化与之相对应。但这决不总是正确的。

无法获得那些只能为世界上少数大消费者得到的研究和开发新成果,这对某些国家的公司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旧的东方集团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的努力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机会接近美国和日本开发的许多新技术(尤其在诸如微电子和计算机之类的领域),它们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全球装配线并不是利用所有新技术所必需的前提条件。通常所需要的只是,在继续将生产集中于某一地方的同时,全国性和地区性工业必须与全球革新中心保持联系。一个跨国公司也许必须花费巨大的金额用于研究和开发,以致只有当它尽可能地在世界各地生产时,才能收回这笔费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建立一种世界规模的一体化生产程序。如果它把新技术同时应用于它在世界各地彼此独立的其他领域的业务中,它同样能支付它的费用。^①

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原来曾以“全球装配线”模式运行的公司,已经转向其他方式。石油工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这一行业被臭名昭著的七大石油公司统治已有数十年的历史,那些跨国公司力图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一阶段,从将石油从地下抽出来一直到把汽油注入汽车中。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在石油生产国政府要求接管油田和建立炼油厂以及像法国的 Elf 和意大利的 AGIP 等国家石油公司兴起的冲击下,它们已经被

^① 举例来说,我过去就没有区分开,见《阐述危机》1984年伦敦版中的有关段落。

迫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它们的方式。但这并不是说七大公司已经受到损害。即使它们不再直接拥有油田和炼油厂,也能利用自己在全球调动资源和技术的能力,继续控制它们的经营活动,并获得可观的利润。

全球化的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进展。但他们却经常用日本汽车公司在英国的投资来支持他们的理论,而这些公司所使用的恰恰是上述方式。他们还经常提到“灵活生产”特征,例如意大利部分针织行业,提到“即时”生产方式,他们把这两种东西视为全球化的典型范例。尽管正如曼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两者意味着当地化或地区性生产,而不是全球性生产。^①

跨国公司与资本转移

全球化常识的核心原则是,跨国公司可以随时把资本转移走,这样就使政府试图控制跨国公司以及工人想要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努力受到挫折。这一主张包含着一种对不同种类的资本的根本混淆,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企业要想进行现金的国际性转移是极为容易的,但转移资金与转移生产资本并不是一回事。

生产资本由工厂、机器、矿藏、码头和办公室等组成,这一切需要多年的建设,而无法简单地收拾起来运走。有时一个公司

①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17页。

能把机器和设备运走,但这通常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并且在它能在别处运转起来之前,公司必须招收和培训足够的熟练劳动力。在过渡期间,不仅老厂房上的投资必须被注销,而且投资于机器上的部分也没有回报。

而且,几乎没有哪种生产过程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依赖外界的供给,并且与销售网络相联系。因此,如果一个公司建立一个汽车厂,它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螺母和螺栓、恰当品质的钢材、具有良好训练水准的劳动力、可靠的电力和水源供应、值得信赖的金融系统、友好的银行家以及能将其生产出的成品运送出去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网络。它必须劝说其他人——其他的公司或政府——为它们提供这些东西,而汇集它们的过程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讨价还价,包括不断摸索和作出预期规划。跨国公司不会只是因为劳动力稍便宜一些或政府稍微更合作一些,就抛弃这些资产而期望在数千里之外的地方重新找回它们。这样的转移费时费力,而且需要注销当前的“已投入成本”。生产资本根本无法随意流动。

实际上,大多数资本主义企业不仅是按照市场计算去操作,而且也依赖它们与其他企业建立的长期的买卖关系。否则它们将生活在持续的担忧之中,担心市场条件的某种变化会使它们的供应商转而将商品卖往他处,或者那些运送和零售它们产品的人突然对它们失去兴趣。它们综合运用金融刺激、商业优惠和个人交往等方法,试图“锁定”这些公司。

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强调这一点,他们坚持认为生产并不在单独的公司里进行,而是在“工业综合体”中进行,这一事物已经发展数年了,不会轻易地被逐渐瓦解,“既不是单独的公司,

也不是国家,而是工业综合体构成了国际性重组的重要核心”。^①

当然,公司确实在变换它们工厂的地点,未来的投资与过去的投资并不总是在同一地点。重组经常涉及关闭旧工厂和开设新工厂。但是这种决定从不会轻易作出,并且总会导致付出一些代价。由于这个原因,重组中的公司通常更喜欢“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地从旧工厂转移到新工厂,使原有的供销网络保持完好,减少周围“综合体”的紊乱。

① W. 鲁伊格罗克和 R. 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 164 页。这一论点与我在《国际社会主义》第 51 期上《今日国家和资本》一文非常相似:

“任何生产性资本都与其他兄弟资本一道(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它们是“敌对的兄弟”)在特定的区域内增长。它们在资源、金融和市场上互相依赖。它们共同行动,在那一领土内努力去使社会和政治条件适合它们自己的目的……民族国家与以不同的国家为基础的资本一起增长,就像在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们一样。一种资本的发展必然影响其他资本的发展……”

“资本集团和它们与之相连的国家形成了一种体系,在其中每个成员都影响其他成员。每种资本的特性都受到它与其他资本和国家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它所表现的不仅是增值、积累的一般动力,而且也是它赖以成长起来的特定的环境方式。国家和各个单一的资本是相互缠绕的,每一方都靠另一方供养……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模式把资本描绘成忙于与其他资本盲目竞争的孤立的原子。在现实世界中,资本家们总是试图通过建立彼此的和与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的联盟——用金钱凝成的联盟,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地位,同时也用内部联姻、好朋友的网络和共同社会化达到目的。”

失业和资本转移

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把资本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一直是造成发达国家失业率日益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几乎得不到事实的印证。当然,的确有许多人失去工作。但是对一些特殊情况——如英国航空公司将其部分计算工作移往印度——的宣传,将不会使任何人相信这是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毕竟,即使在英国航空公司内部,自私有化以来失业人数总和已达到 17 000 人;而公司在印度雇用的计算机操作员只有 130 人。^① 其余 16 870 人失去工作的背后一定另有原因。

跨国公司的投资模式,当然不是以损失发达国家工作职位为代价而在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恰恰相反,如上面所述——跨国公司大部分的直接对外投资是在先进的工业国家。跨国公司发现这些国家是最有利的投资国家,其原因很简单: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的平均回报率要略高于在发达国家中相应的回报率;到 1985 年,美国在较不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的回报率已降至其在发达国家中水平的三分之二。^②

① 据 GMBU 联合出版公司 1996 年 6 月 11 日公布的数据。

② 戴·戈登:《全球的经济》第 42 页。

而且,那些经历了最大的投资浪潮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并不是那些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因此,当最穷的大洲——非洲——停滞不前并经历了资本外流的时候,那些工资相对较高的国家,如韩国(平均水平仅比英国略低一点),却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一些相对来说低技能的工业,如廉价的纺织品、鞋类、服装和基本日用品(那种在“一镑货”商店销售的东西)的生产,大量涌向低工资经济的印度,尤其是中国。但高级纺织品和鞋类、白色商品(电冰箱、炊事用具等)、汽车、飞机、机械工具等的生产却仍然集中在先进国家,同时,甚至电子类产品的生产也有移回先进国家的趋势。

1982年到1992年之间,先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从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总进口,已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增长到约2%。但这些数字并不能解释先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存在着从6%到20%不等的失业率。在过去20年中,数千万失去职位的人中最多有几十万可以直接归咎于进口产品取代了国内产品。

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过去的20年中,失业并没有打击那些受到进口产品竞争的工业。特别是,在几乎所有产业中,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都下降了。遭受失业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较少或没有进口渗透的行业——建筑、报纸印刷、码头工作、国内服务、邮政和电讯、废物处理,等等。在这些行业中失去工作只能归咎于公司为了增加利润而削减成本,以及新技术不断涌现和周期性经济衰退。

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失业状况的两项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一项研究考察了1972年到1980年间制造业就业情况的变化。它发现,经济的停滞不前使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了

1.5%，而对外贸易的变化则导致了制造业就业率增长了2.1%。另一项研究表明，1973年至1980年期间，失业中20%直接归因于进口的冲击，64%则是由于美国经济中缺乏需求。^①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德里安·伍德认为，第三世界的出口导致了先进国家的大量失业，声称它们已经导致“整个发达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了20%”。^②但是，连他也没有直接指责进口替代了工作，相反，认为进口间接地减少了工作岗位，推动公司发展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以便继续赢利和保持竞争力。换言之，正是合理化在消灭工作上起了主要作用，而不是从低工资国家进口或资本流向低工资国家。

跨国公司和国家

全球化论点认为，资本越来越不需要民族国家的帮助。赫斯特和汤普森、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各跨国公司继续依赖于“国家基础”，依赖于国家在民族基础上的运作。

1. 首先，正如我们所见，大多数跨国公司继续把它们的大部分生产集中在一个国家，或至少集中在一个国家及其近邻。

2. 即使是流向先进国家以外“劳动力廉价”的地方的投资，

① 两项研究均在上文中得到引用和分析，见戈登前引文第39页。

② 关于对他的观点的描述，见S. 弗兰德斯：《发展中国家呼唤和谐》，载于《金融时报》1995年10月6日。

也不是完全与母国政府的活动无关。赫斯特和汤普森指出,那些主要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倾向于把它们在第三世界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投资和销售,集中在那些本国能施加影响的特定地区。因此,德国资本流向东欧;法国资本流向中非、西非和北非;美国流向拉丁美洲国家;日本流向太平洋地区,等等。“对外直接投资联系的范围,是在某个……强国及其成群的‘附属’国家之间,而不是在这些附属国家本身之间。”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说,至少十大“最主要的核心公司”已经使它们的国际化“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殖民统治的地缘政治学模式”。

3. 即使那些生产已经国际化的地方,研究和开发仍集中在本国基地。因此,即使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来自荷兰、瑞典和瑞士的公司——也“仍然在母国从事它们大部分的研究和开发”。对于瑞士公司,这一比例为 2/3;对于瑞典 20 家大跨国公司,该比例为 75%。帕特尔和帕维特在考察专利应用的基础上,对技术全球化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公司的技术活动集中于他们的母国”。^①

4. 在许多核心公司的创立和维持中,国家继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93 年《幸福》公布的 100 家最大的公司中,至少有 20 家在过去的 15 年中,如果不是由于它们各自政府的挽救,根本无法作为独立的公司保存下来。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是 80 年代初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钢铁公司以及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

^① 引自 W. 鲁伊格罗克和 R. 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 138 页。

最近,1993年,瑞典政府支持了斯堪的纳维亚 Enskilda 银行(Wallenberg 国际财团的家族银行)和商业银行,它们是瑞典的两家主要银行,在瑞典许多生产性公司如沃尔沃、爱立信中拥有大量股份。Wallenberg 国际财团仅在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中就占了40%的份额。^①

同样,正是韩国政府在1987年大宇公司濒临破产时挽救了它。除此之外,所有主要的电讯公司的重要合同都依赖于政府,依赖于政府与国际财团的讨价还价,正如国防工业的公司当然要依赖政府一样。“在1993年《幸福》100强企业中,所有以往或现在领先的美国计算机、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制造商,都从特惠的保护性合同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②

5. 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1993年《幸福》公布100强企业中有23家公司是“直接从事石油工业的”^③——该行业依赖美国的军事霸权来对抗其在中东的业务受到的威胁,这一点尽人皆知,臭名昭著。

为对付更激烈的国际竞争而进行的工业重组,绝不意味着公司对国家依赖的终止,它们可以通过国家施加特别的影响。实际上,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能够提高跨国公司对政府的依靠,正如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在一项关于这两者间关系的研究中所坚持的那样:

目前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为了在世界经济中

① W. 鲁伊格罗克·R. 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218页。

② 同上,第219页。

③ 同上。

有一席之地,国家间和公司间的竞争已变得更加残酷、更加激烈。结果,公司和政府纠缠在一起,政府也认识到,它们对公司所控制的稀缺资源的依赖在不断增加。^①

因此,对那些在世界各地建立平行的生产单位的“丰田式”的公司来说,如果其在诸如研究和开发之类的关键领域的统治地位使它们在谈判中占了上风,它们也只能对当地的公司称霸(而不是屈服于来自当地公司的压力)。但是这意味着,要在这些活动能被牢牢控制的地方,即在它们的总部所在国进行这些活动,并且可以依赖该国政府在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谈判中保护这些公司的利益。

但对跨国公司来说,并不仅仅是“母国”政府才重要。一旦它们在某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该国政府的政策对它们来说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为它们提供补贴、建立一套合理的税收制度、基础配套设施、培训具备所需技能的劳动力,等等。如果它们不能使政府屈从于它们的意志,它们可能就损失巨大,因此,它们趋向于变得依赖政府,正如政府变得依赖它们一样。这使得政府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国公司,即使它们出于政治原因经常对跨国公司提出其他要求。如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所说的:

只有少数公司能在“无国界”的世界中运转。政府,无论是东道国的还是母国的,都在继续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也许是荒谬的——和日益重要的角色。^②

① 约·斯托普福德、苏·斯特兰奇:《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

② 同上。

一个无国籍资本的世界？

“公司的国籍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英国前工业大臣肯尼思·克拉克早在 1988 年就作出这样的判断。^① 这一主张已被其他许多全球化论的支持者多次重复过。然而，支持这一论点的感性证据实际上并不充足。今天，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们都的确能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进行谈判，能通过金融资本以及在避暑领地上管理他们的公司，当他们从一个度假地转到另一个时，资金也随着从一处挪往另一处。一种被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称为“具有特权的跨国商业文化”的东西，^② 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统治阶级的萌芽正在形成。

但是，任何一个主要跨国公司的控制权都被牢固地掌握在某一国家的资本家手里，如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所证明的那样。1991 年，在 30 家美国“核心”公司中，仅有 5 家的执行董事会里有一个外国人，美国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仅有 2% 是外国人。20 家日本大公司中，仅有 2 家的董事会中各有一个外国人。在 15 家德国“核心”公司中，仅 4 家在

① 引自《金融时报》1988 年 6 月 20 日。

② 约·斯托普福德、苏·斯特兰奇：《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

董事会中有外国人。^①

即便是股份所有权,也比“全球市场”论所暗示的要更为民族化得多。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指出,几乎没有“核心公司让国外投资者持有超过10%的股票”,大多数的日本和韩国公司甚至不想把它们的股票在国外股票市场挂牌上市,而德国股票大多数的海外持有者是在讲德语的瑞士和奥地利。^② 荷兰、瑞典和瑞士的跨国公司由于其民族经济弱小,而被迫将其生产行为国际化,但是“这些国家的许多跨国公司,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显著的民族特性……它们没有通过在国外股票市场挂牌上市来给自己增色……”,它们“往往在其高级管理层中仅保留少数几个非本国人士……到1994年,仅飞利浦公司有一个真正国际化的高级管理层”^③。

如果公司不鼓励国际性的股票持有和控制,对于某一国家的个人投资者来说,要想在设在别国的跨国公司中投资获利也就不太容易。如《金融时报》的彼得·马丁最近在一篇颂扬“一种同质的全球经济的诞生”的文章中指出:

发现一个当地公司的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总是要比检查总部设在世界另一边的公司的业务容易一些……通货风险就更难防范。一个投资者……会……面临代表其资产的货币与他可能开支花销的货币之间的潜在的不符。^④

① W.鲁伊格罗克、R.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157—158页。

② 同上,第157—158页。

③ 同上,第161—163页。

④ 《金融时报》1996年8月3日。

评价这场争论

用来反驳“全球化”共识的证据的核心是不容置疑的。体系是国际性的,但它原本如此。公司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有利的生产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能够一俟通知就放弃现有的场所,也不意味着它们总是走向劳动力最廉价的地方。确实存在着超越国界进行生产重组的趋势,但它并不妨碍跨国公司为在更大的世界里发展而依靠国家和地区基地,它也决不总是意味着建立世界范围的生产线。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它们所支持的体系运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这不是说它们与这一体系无关。

然而,曼、赫斯特和汤普森得出的结论在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方面却是错误的。

首先,他们认为全球化常识的局限性为国家改良主义——或者甚至是地区和全球改良主义的复归留下了空间。因此,曼提出了一种“北欧”方式,通过“需要大量政府经费的高技能、高教育和高技术战略”来对付全球竞争的加剧,这一战略将“导致国家财富的增加”,^①与此同时,“通过美国、日本和德—欧政府机构的三边安排——这种安排常常体现在西方七国集团这一更大的范围内”,国际稳定有可能得以实现,这种稳定性又使得“现代启蒙的主要特征和世界和平最终有可能得以实现,至少在世

^①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20页。

界的一部分有可能实现。”^①

赫斯特和汤普森始终对渐进改革的功效抱有信心,这一点甚至更加明确。他们相信政府通过对传统技术进行略微调整能够给经济带来秩序。他们认为,这些政府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目前的“经济高峰会议”扩展成为系统性合作。只要“三方集团”(美、日、欧)为货币市场和直接投资定下规则,随之而来的“治理”就将给世界体系带来秩序。其他民族国家的政府以及它们国内的省、市政府也将能“达成一致”,在这种一致中,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互相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力、管理、投资者和公司这些市场关系之中。

这一切只是一场白日梦——将导致反动结论的白日梦。经济高峰会议表明,它没有能够控制世界经济,更不必说使之回到理性的方向。事实上,这些会议是政治交易的场所,在这些会议上,互相对立的政府为与之相关联的那些互相竞争的公司各自利益的扩展而忙碌。当它们的利益恰好一致时(例如,当它们开始共同开发一些其他国家时),或当它们中最具权威者(美国)成功地威逼别国接受它的霸权时(给其穿上“世界新秩序”的外衣),它们会采取一致的行动。然而,这些会议导致的往往并非是一致的行动,而是一致的丧失,即出现“新的世界无序状态”。

经济峰会呼吁加强“治理”,就是要力图使它们有更大的权力,以驱使世界其他国家服从最强大的资本家的利益,在此范围内,力求使美国资本主义取得更大的统治。把“欧洲”当作一个“经济”大国的说法也属无稽之谈。欧洲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彼此竞争的国家相互摩擦的结合体,其资本家间的对抗就像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家一样。有时为了瓜分市场,这种对抗变成了

^①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20页。

联盟,有时则重新陷于争吵,联盟又解体。

当然,巨大的利益迫切要求有一个更加一体化的资本主义欧洲,要求在这种一体化中开始欧洲国家的团结。但是这些利益并不希望出现一个由那种将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治理”控制的和平、和谐和人道的世界。相反它们坚持建立一个欧洲,在那里,不受限制的资本统治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不受任何选举控制的中央银行的保护。

他们观点中的第二个错误涉及对 20 世纪的世界体系历史的阐述。如我们所见,赫斯特和汤普森强调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量的增长数字,而忽略了从一个时期到另一时期生产组织所发生的质的重要变化。他们也没有真正试图要去说明,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衰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资本与国家日益一体化的趋势,或者如布哈林和列宁所描述的,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

赫斯特和汤普森对这一时期的评价与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家们的观点一致。他们把国家干预看作是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运用凯恩斯经济管理的方式为了阻止经济衰退而采取的行动。但是,尽管全球化理论家们认为,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变化,使国家丧失了这种干预权力,赫斯特和汤普森却认为,只要国家去使用,它们就仍然拥有这些权力。

构成这两种立场的基础,是对国家资本主义高潮期间的实际状况的误解。全世界的政府都在谈论“经济计划”,把某些产业国有化,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迫使个别资本家作出投资决定。^① 在这一高潮期的后期,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初,工人

^① 关于这段时期,见我的专著《阐述危机》1984 年伦敦版中的有关段落。

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改善和提高,一些作者称这段时期为“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但是,这种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既不是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也不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发现,当它们把发展经济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经济衰退产生的大量失业和贫困时,它们在发展经济方面就变得极为无能。在有人谈论“全球化”之前很久,曼就非常正确地指出:

改良主义政治家们是否已经极大地发挥了他们的“潜能”,去控制货币和利率,以便随意花钱和进行再分配,是值得怀疑的。他们这么做大部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造成的特定环境中……其他大部分时候,他们似乎已经真正被资本主义正统观念和对资本抽逃及货币浮动的恐惧完全驯服了……我认为……自1929年以来,在英国、德国或西班牙等,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左翼政治经济学已完全崩溃了。我仍然不相信,国际资本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压力只是在当前时期形成的威胁。实际上,这种压力是始终存在着的。^①

如曼所指出的,导致这些失败的原因,就改良主义政府而言,不仅仅是由于缺乏意志力。实际上,这些政府被改良主义本身的逻辑所限制,这种逻辑包括努力维持体系的运转——这意味着使它们的政策服从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因此,在20世纪30—70年代间,当它们促进积累和军备竞赛时,政府的干预计划是唯一有效的。当它们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① 迈·曼:《当20世纪变老时》第119页。

而进行改革时,它们是无效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干预的增强——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更大或更小程度的趋势——与战争准备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战争准备使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受到冲击而不是得到改善。只有当战争准备产生一种非其本意的后果,使经济从不景气转为景气时,在英国、美国等国家里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才开始有所改善。

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经济学的观念颠倒了现实,把这种繁荣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但是对这些年评估记录的审查表明,从40年代直到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计划是被用来减缓发展的速度,而不是用来战胜衰退。^①

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干预的余地更大一些,因为当地的资产阶级相对较弱。并非出自豪门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能够掌握政权,他们为了工业化而推行使当地资本国有化的计划,把自己变成国家资产阶级。在1945年以后的东欧,在中国、越南和古巴,以及诸如阿根廷、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都发生过这种情况。

这些政权的典型的做法是,直接运用国家的权力,在数量上限制与外国资本家的直接联系,每当经济衰退的苗头开始出现时,就把物质产品从“非重点”经济部门转向“重点”经济部门,以此来延长经济繁荣。这些政府谈论计划,并常常把自己说成是某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甚至“王室社会主义”)。但是由于“非重点”部门总是那些涉及到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的部分,因此

① 见 R.C.O. 马修斯:《为什么战后英国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载于《经济学杂志》1968年9月号第556页。

国家干预当然不会去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事实上,这是一种国家使国内经济服从于它所受到的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其他部分的军事或市场压力的方式。国家的“自主性”在于它能够确切地挑选它将世界体系的压力施加于本国人民的方式,而不在于能够违背这种压力。

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体系进一步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没有消除上述国家所具有的某些神奇权力,这些权力在使用时仿佛世界体系的其余部分并不存在。相反,这些变化倒是改变了国家在整个世界体系的压力下促进民族资本主义(不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积累的最有效方式。

减少国内经济与国外资本的直接联系,使得许多国家在一代人或更多一点的时间里无意中看到了资本积累的高速发展。但现在这已成为一种代价越来越高的选择,因为它限制了接近掌握在世界最大的外国公司手中的新技术的机会。从3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经济越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增长速度似乎就越快,但到80年代,情况似乎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允许国内资本与世界体系中其他地方的资本直接联系起来——从外国银行借钱,与外国跨国公司结成联盟以获得新技术,不断扩大固定设备和零部件进口的范围,为了偿还这一切,这些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

这一切发生时,整个世界经济刚好进入了从1974年开始的新的危机时期。那些在漫长的繁荣时期口头上高喊凯恩斯主义而实际上无需使用这些方法的政府,现在不得不面对衰退,并且发现这些方法并不起作用。

正是在世界危机迅猛地卷土重来时,国家发现它们无法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受世界危机的影响。对于最彻底的国

家资本主义,即东方集团和部分第三世界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这是具有极大破坏性的。^①对改良主义者也起同样的破坏作用,这些改良主义者相信,以凯恩斯主义处方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是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未来之路。在英国,工党政府在1976年夏天就已放弃了这样的处方。六年之后,法国的密特朗也步其后尘。全球化观念是在经验反驳了下述观念时流行起来的,这种观念认为自上而下改造世界体系能够摆脱困扰一国经济的危机。但是,全球化理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观念始终是错误的,而是把它视作一个新的特征。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并不是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的新的巨大权力,而是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李嘉图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告诉那些企图对世界体系作任何改革的人,他们必须遵守这一体系的竞争性积累的动力所创造的规律。改良主义所能宣称取得的仅有的一些成功,出现在这样一些时期,如40年代末、50年代和60年代初。那时候,甚至一些由公开宣称赞成资本主义的政党执政的国家,如西德、意大利和美国,也进行了使工人受益的改革。相形之下,每当世界体系经历过漫长的危机期,改良主义政府总是变得软弱无力,于是其内阁成员抬出超越他们控制的“国际”力量来为自己开脱。因此,拉姆赛·麦克唐纳在1930年工党的会议上说,他的政府能做的事不多:

① 如我1976年所写:“国家能够保护民族资本家不受世界危机的直接冲击的时期正在划上句号……每个民族的国家资本主义都越来越被卷入一个无秩序的、被打乱的世界体系中,在那里惟一的秩序是由世界市场本身的破坏性和危机所规定的。”(《波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1辑第93、94期)

所以,我的朋友们,受到考验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体系。它已经失败了,不仅是在这个小岛上;它已经在欧洲、在亚洲、在美国失败了;它已经在各地都失败了,因为它注定要失败。^①

“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德国前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的观点实际上是与此完全一致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无法明确地告诉人民,我们将如何消灭危机,什么方法能使我们立即取得成功……”^② 他争辩道,“这远非德国社民党所能控制,远非任何人所能控制,经济危机是国际性的。”^③

麦克唐纳和希法亭没有使用“全球化”字眼,但他们背弃改善大多数工人状况的诺言的理由,在本质上却与今天改良主义政治家所使用的一样——国际体系的力量太大了,以致政府的行动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对于这一类争论的回答很简单,无论它们是以 30 年代的还是 90 年代的形式出现。改良主义政府无法对付危机,因为它们接受了世界体系的制约。它们愿意把主要的生产资料留在现有控制者的手中,至于它们限制资本权力(汇率控制,投资管理,公共开支计划)的尝试,是通过现存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完成的,这些国家机器是建立在与资本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前提之上的,

① 引自 R. 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94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378 页。

② 鲁·希法亭致卡·考茨基的信(1931 年 12 月 2 日),引自 P. F. 瓦格纳:《鲁道夫·希法亭,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1986 年新泽西版第 155 页。

③ 同上。

其上层统治者认同于资本的利益。在改良主义者的观点中,是没有下层工人进行直接行动的一席之地的。然而,恰恰是这样的行动,如果协调地贯穿于整个经济中,就能够阻止旨在破坏改善大多数人状况的尝试的资本行动(资本向海外流动,关闭工厂,囤积生活必需品),然后更进一步,使生产资料去满足需求而不是为利润所驱动。

当然,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在一个国家进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一个单独的国家,无论它有多大,都没有办法在其内部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这种手段,而任何无限期地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的国家,不仅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且最终还将屈从于它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不能在短期内设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与此同时进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改革(将财富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大众,将导致浪费的生产改造为满足人民的需要,将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足够的利润可图而废弃不用的生产资料投入使用),并利用本国的资源鼓励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改革。

成功的程度将依种种偶然因素而定——它的国家有多大,其生存对境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反对其变革的列强们自身分裂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它能在其他国家推动革命性骚乱的程度。

然而,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中通常以“全球化”名义发生的变革,并没有使进行革命性突破的尝试在本质上变得更加困难。例如,依赖国外资源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革命浪潮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由于德国占领乌克兰以及英国占领巴库,被切断了煤炭和石油来源,因而遭受了巨大损失;德国在1919年初由于严重的粮食短缺而遭受损失;甚至在那时最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进行的一场革命,也面临着国民经济依赖贸易的问题。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那时像现

在一样,这些都是接受资本主义设置的界限的依据;对于革命者来说,它们都是接受“掌握权力然后开展革命”的观点的依据。

全球经济与工人的力量

按照“全球化”共识的观点,并非仅仅是改良主义政府没有能力。据说,工人们反对资本支配的能力也比过去大大减少了。这是反对工人政府进行任何屏弃世界体系尝试的一个论据。也是有关工人进行斗争毫无益处的论据,即使这种斗争是在现存体系内进行最小变革,或者是改善福利,或者是要求雇主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资本无视工人们要求的任何严肃努力,如果必要的话,资本将撤往世界体系的其他地方。

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述,产业资本并不是自由自在可以到处游荡的。当然,从长远来说它能够移动,但除非它们准备付出高昂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正是全球化论所强调的国际一体化,增强了特定工人群体的谈判能力。在真正的全球装配线上,原则上讲,任何国家的生产一个单一部件的工人都能够使全世界的工业陷入停顿。事实上,如我们所见,全球装配线是相当罕见的。但是在“地区性”基础上的集中却日益普及,极少数工人使整个跨国公司陷入瘫痪的情况也很普遍。1988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福特英国公司的工人罢工,在三四天内使整个福特欧洲公司陷于瘫痪。前不久,通用公司一个配件厂的极少数工人使得通用公司在北美的整个业务都中断了。

工人们在过去的20年中经历了许多次失败。但其中只有

极少数是由于资本打起背包转移他乡而造成的。这些失败通常是因为公司能够在现有的工厂或者有时在几英里以外的新工厂继续生产而造成的。1987年,印刷工人被鲁珀特·默多克国际新闻公司击败,就是因为距旧工厂一英里多的地方又出现了新工厂。如果在默多克移到别处之前,印刷工会领导人做好准备在旧工厂停止生产,失败是能够避免的。那样的话,这些印刷工人就会对默多克在英国的新闻业务构成打击,默多克所赖以支付其巨额全球债务利息的造钱机器将因此而陷入瘫痪。英国1985年的矿工、1988年的跨海峡轮渡水手和1989年的码头工人的罢工失败,同样是因为工会领袖的懦弱、无能或缺乏团结,而不是跨国公司的绝对权力。美国工人遭受的许多挫折——里根掌权时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失败,在衣阿华州霍梅尔的失败,在伊利诺斯州南部斯特利的失败,等等,其原因也在于此。资本胜利了,但不是因为它能到处挪动,而是因为当工会领导人在鼓吹温和和体面的时候,资本却在作无情的斗争。

雇主能够在这些争端中取胜,生产的“全球化”并没有起重要作用。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却起了作用。它助长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跨国公司太强大了,“旧式”的工人斗争无法对它们构成冲击。而放弃使用这些斗争形式,就将胜利拱手让给了跨国公司。

未来的发展形态

全球化论最终可以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现存的世界体系,尽管无法控制,但比过去的体系危险性要小一些。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拥有巨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作用在不断减

少。资本主义也许需要国家来保护它,以反对来自底层的反抗,对付不愿遵守一般规则的“无赖”政权,保证合同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提供某些基础设施。但是资本主义不需要国家间的对立和竞争,这种对立和竞争妨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贸易的自由进行。它应该能够满足于一种霸权(大概就是美国),这种霸权将监督世界秩序,在这种世界秩序中,自由贸易日益规范,军事冲突的作用更为微小。

对全球化论的反驳可能会导致对世界体系当前发展道路的完全不同的认识,国际冲突和无法控制的经济危机,构成了这条发展道路的特性。不同的公司有着不同的利益,它们将依靠它们可以施加影响的特定政府来实现这些利益。

会有一些公司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在全球建立统治,不论是从能击败所有竞争对手的民族国家的生产基地出发,还是依赖全球装配线。显然,极为重要的美国工商界部门以及一些准备与之结盟的、基地在英国的跨国公司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即便就这些公司的情况而言,它们的“民族”国家,尤其是持有大量合同的五角大楼,对于保持生产持续开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当其利益开始使世界体系成为一个整体时,它们也正是靠着自己的民族国家来推行自己的利益,排斥他人的利益。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些例子,在上一轮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美国为推行“知识产权”作了长期的努力;美国坚持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把“自由贸易”认定为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其他公司可以采取不同的战略去占领世界市场——不同的战略意味着对待国家作用的态度不同。大多数的日本公司就是通过由内向外输出一种经济制度来确立自己的世界地位的,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商业习俗为企业提供

了强大的保护。于是,在某些时候,当它们在关税和配额问题上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它们对这种威胁的反应常常是对出口进行“自愿约束”——它们开始转向在当地的子公司进行生产(“丰田式”和“全球当地化”的方法)。一旦这样做了,它们就能够非常高兴地接受、甚至鼓励来自当地政府的保护主义,以此避开基地在别处的跨国公司的竞争。

德国和法国的公司正逐渐从其本国基地向邻近的欧洲国家拓展,这使得它们希望通过加强欧洲机构来实施地区性的欧洲政策,而不是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

这些战略没有一个意味着我们正经历着一场转变,即从世界分工转向实际上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经济或地区经济体,就像 30 年代出现的趋势那样。世界贸易还在增长,但它不是建立在国家不干预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甚至也不是“协商贸易”,在这种贸易中,国家不断地互相施压,要求对方接受与自己相关的资本的要求。

英国资本主义大多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鲁伊格罗克和范图尔德指出,它是惟一的“凝聚力不强”的先进的工业国家。^①在其国内经济中,外国投资者的人数极高,来自美国的和来自欧盟的人数大致相等。^②与此同时,以英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生产的比例,大大高出于设在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而且,这种生产并非集中于一个地区,它们在欧洲和北美几乎各占一

① W. 鲁伊格罗克、R. 范图尔德:《世界性重组的必然性》第 284 页。

② 1993 年的最新数字表明,外国公司包揽了制造业出口的 25%, 100 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中,35 家是外国的(从 1986 年的 18 家上升至此)。外国的大商业企业的一半来自美国(自 1986 年以来一直未变),39% 来自欧洲(比 1986 年的数字多了两倍),但仅有 7% 来自日本或韩国,尽管媒体对此作了大量的宣传。引自《金融时报》1996 年 9 月 4 日。

半,只有一小部分在东亚。

这些事实或许解释了英国人热中于谈论全球化的原因。著作家们正从一个衰落的部门经验中推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结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经验的复杂性,因为有些投资来自具有世界生产战略的跨国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但增长最快的投资却来自那些只想在欧洲生产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欧洲公司,也有美国和远东的汽车公司)。与此同时,一些以英国为基地的核心跨国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等),其研究和开发及重要的市场份额都要依赖于英国政府的可观的军费开支。

英国不同部门的跨国资本的这些背道而驰的取向,导致了对民族国家将采取的国际战略的极为不同的解释,尤其当这种国际战略涉及到对待欧洲经济和贸易联盟的态度时。对有些部门来说,这种联盟是不断发展的欧洲生产组织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对于另一些部门而言,这可能成为实现它们全球目标的一个危险的障碍。这一争论不是发生在那些依靠国家去实现自己要求的人和那些不依赖国家的人之间的。而是发生在利用国家的不同的战略之间,一种战略把国家看作是协商全球交易的基础,另一种则把重点放在欧洲重组上。中小产业的重要部门的介入使得局面更加复杂了,这些产业绝大部分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转。

有关全球化的时髦话题并不能解释上述分歧,因为它无法区分不同的企业在面临国际竞争时进行重组的极为不同的方式。如果这一话题混淆而不是阐明了主要工业国家中最为国际化的英国的情况,那么,对于其他国家的情况,它就会彻底误入歧途。世界体系的发展也许正在改变国家和公司的关系。但是,它们并没有减少公司与政府的联系,也没有使为取得世界统

治地位而战的主要资本丧失一定的民族性。

世界并非像全球化理论所描绘的那样,建立在由均匀分布、彼此自由地互相影响的资本原子所构成的“新古典”体系模式之上,而是存在一批数量有限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它们互相挤压,推推搡搡,每一个都试图诱使其他公司服从自己的意愿,就像触角互相缠绕的巨大章鱼。这种引诱并不局限于经济策略,因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仍坚持保留它们的军事能力,增长最快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也卷入了彼此间以及与邻国间的军备竞赛中。

世界体系是不稳定的和危险的,这恰恰是因为有可能借助于武力的资本与国家的联系仍然在跨国公司互相争夺全球统治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武力通常被部署在先进国家之外,这并没有减少它对本国居民的可怕影响,并没有减少它对整个体系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对巴格达的轰炸、多边贸易协定以及就使用最新软件的版税问题的争吵,都是世界体系的逻辑的组成部分。

全球化理论看不到这一点。像赫斯特和汤普森那样的怀念凯恩斯主义神话般历史的改良主义者也看不到这一点,无论他们用以反对全球化理论的个别观点是多么正确。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能够看清它。这意味着经济危机总是在政治骚乱中反映出来,也意味着斗争不仅是为了反抗物质匮乏,更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为了与野蛮相对立的社会主义。

(周文海 译 王列 校)

处于绝境的全球化*

[美]威廉姆·凯勒 [加]路易斯·波利

没有稳定的政治基础,市场就会崩溃。二战结束时,在经历了数年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盟国根据这一认识重建了国际经济秩序。然而,50年后,无论是跨国经济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通常都认为,跨国经济活动为真正的全球经济提供了比政府所能提供的更加稳定的基础。今日,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权威的作用已经降低,它只是要使自身及其已减少控制的社会去适应一体化的世界技术基础的趋同逻辑,这一基础是由那些不效忠于任何国家的公司精心建立的。

我们不这样认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技术的革新得以传

* 威廉姆·凯勒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路易斯·波利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和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选自《当代史》(英文)1997年11月号,它同时也是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公司的神话》的一部分,该书是由本文作者和保罗·多雷马斯、西蒙·里奇等人合编的。

播,对于世界的繁荣来说,的确是必要的。但是,跨国企业的扩散并不能保证得到这样的结果。尽管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并且有时伴随着市场集中的增加,但跨国公司并没有促使各国的创新、贸易和投资制度出现不可避免的趋同和一体化,也没有迫使它们所植根于其中的各国国民经济出现巨大的趋同。它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自身从根本上并没有趋同于全球性企业行为规范。

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很多。在同一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确实有许多共同点,而且,近数十年来跨国兼并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了。但是,跨国公司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业务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有着系统的差异。那种不受民族国家政治束缚、遨游于国界日益消失的世界市场中的全球公司,仍然只是一种神话。正是国家赋予了跨国公司特许权,为它们培育了得以蓬勃发展的运行环境。在世界大多数最主要的跨国公司所处的母国中,政府仍然具有税收和管理权,并且有权影响商业活动。

不同的政府运用这种权威的方式不同。民族的差异在与明文的和隐含的政策相关的社会成本分配和再分配中,也有所显现。这些差异甚至存在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间,这些国家是世界大多数最主要的跨国公司的母国(它们为我们的数据分析和广泛的调查,提供了主要的参考依据)。在上述每一个国家中,国家的政治结构都在继续从事着对公司的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活动。这些活动影响着这些公司的内部管理和长期的资金筹措,影响着它们最重要的研究和开发项目,影响着它们的相互联系的投资和企业间贸易的战略。

总之,在世界居统治地位的跨国公司的核心,并没有全球化一类的东西。经验事实反倒表明,存在着对全球化的抵抗。大多数美国的跨国公司继续执行着注重短期收益的战略。德国企

业则仍把重点放在少数产业之上,推行一种能使新技术广泛传播的发展战略。当地方银行家努力在外部市场确立竞争优势之时,德国最著名的跨国公司还与他们保持着独特的关系。日本的跨国公司在90年代尽管面临着极为严重的调整困难,却继续依赖于具有明显民族特色的长期公司网络。

没有一种公司体系必然优越于其他体系,每一种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依旧遵循民族路线的结构差异并没有消失。这一结论对于决策者、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认识世界经济的变化,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在许多批评家寻找对抗全球化压力的支撑点时,我们发现,被人们视为新的全球经济基础先兆的,正是公司内部存在的全面的民族差别。

全球化的出现

经济领域中结构趋同的性质和程度应该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中得到反映。如果全球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它应该在经营媒介中得到明显表现,这些媒介最突出地表现为相互依赖性的加强。商界领袖的肯定语气仿佛这就是事实。我们不断从他们那里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全球市场形成了,工业部门出现了全球化,有可能出现无国家的电子商务,所有这些都表明,民族的经济边界已经废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这一观点持激烈批评态度的政治左派也同意这一基本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解释性的。他们都同意,其最终后果是一个世界市场的出现。然而,那些商界经理们许诺带来繁荣和希望的地

方,政治左派却发现了灾难性的竞争和控制不力的市场力量之间的冲突。

全球商业体系正在形成,这一点在直觉上貌似真实。自主的商业企业越来越需要经济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生产越来越需要为新技术筹措资金,并且开发和利用这些新技术。跨国公司所使用的资本和技术的跨国流动越来越自由,这也是事实。或许,关于地区一体化的加深主要是由金融和产业公司的扩张所推动的说法,更加貌似合理。由于跨国公司的业务和市场准入跨越了国界,具有地方思想的公民和决策者似乎自然而然地被推动着去使自己的思想适应于相应的地方的或全球的逻辑。

遵循这样的线索,一种正在形成的共识似乎得到了人们的考虑。人们普遍把跨国公司理解为一种巨大的政治经济转变过程中最为明显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类似于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全球化一词被广泛地用于描述这一过程中有时出现的矛盾现象。正如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全球化正在使“世界经济转向一种更大的结构规模”,这需要朝着政治的“私人化和市场化”方向进行更根本的转变。他认为,结果是形成各种新的权力中心,它们“比国家的主权更大。”^①

德利克·戴科克霍夫把这一点说得更为理想化,他走得更远,把跨国公司称为新时代的决定性象征,“跨国公司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帝观念那样,遍地是中心,无处是边缘”^②。一位重要的社会批评家说得更激进,他把跨国公司描绘成“全球资本

① 菲·科尼:《全球化与集体行动逻辑的转变》,载于《国际组织》第49卷1995年第4期秋季号。

② 德·戴科克霍夫:《文化之皮》1995年多伦多萨马维尔书屋版。

主义之狂躁逻辑”的有形外观。^① 而我们的分析则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部门里的核心活动,这一分析表明,有些情况远非如此。

师法国家

从理论上说,技术创新和这种创新所要求的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可能会损害既定的政治秩序。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里,许多分析家和决策者都期望,在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市场中,公司的活动会促进技术能力的逐渐趋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期望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上采取广泛而有效的决策行动,以不断超越国家疆界。

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各种主导模式导致了这样一种假设,即,需求的扩大、市场自由化和贸易开放会增加技术扩散的速度和范围。人们预计,这一进程最终将使公司之间和民族国家政府之间的技术竞争趋于平等。国际贸易和随之而来的信息流动,主要是通过公司这一媒介进行,它们将使技术创新的收益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可能采取的形式有,体现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工业设计上的直接知识扩散,生产经验的传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移民。结果,许多国家的经济最终将接近或实现与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大国的技术平等。在经历了一段由于起步

^① 威·格雷德:《一个世界,是否做好准备:全球资本主义的狂躁逻辑》1997年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版。

较晚而落伍的时期后,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其政治权威执行了趋于开放和建立有效市场的政策,也是会赶上来的。

然而,迄今为止,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实际成果远远低于人们的期望。无疑,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大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许多工业部门大大缩小了,虽然它与前苏联的差距看来扩大了。而且,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几个东亚国家似乎找到了一条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之路,即便这一道路并不平坦。但是,技术差距消除的速度和范围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之间极为不同。各国的创新制度也并没有出现深层的一体化。新技术及其体现的信息,并没有像全球趋同模式所预期的那样,在民族国家疆界内外轻易地流动。

开发、适应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并非是生产的简单的副产品。技术创新需要在教育、人力资源和研究开发的基础结构上进行集中的资本投资。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公司和政府对技术创新的资助在性质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有些国家,以美国为最,将大量国民收入用于科学和技术开发,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开发。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则倾向于投资范围广泛的国家技术工程,或者投资于新的商业技术的开发和传播。一些国家直接和积极地推动研究工作,另一些国家则把它更多地留给私人部门。有些国家通过限制兼并和联合来约束竞争,有些国家则以生产效率为名鼓励集中的合作。

这种在公司战略和政府决策上长期存在的差异直接表明,各国的创新和投资体系具有持久性。合作建立构成现代国家基础的各不相同的机构和意识形态,继续塑造着或重塑着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常常创造着或支撑着国家的技术能力。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安排,在推动公司进行基本运转的各种关系中直接得到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最大

份额实际发生在公司网络的世界里,上述关系的性质将继续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跨国公司的民族性

当然,由跨国公司开发的技术一旦成型就有可能扩散,这主要是通过特许权协议和合资企业来进行,这些合资企业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归入分公司之列。这种扩散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世界未来政治组织的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技术将在哪里得到开发,在哪里得到控制,在哪里得到使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基地设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时,我们发现,它们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公司体系不同,政府对创新的支持政策也不同。在这些公司的基本活动领域内,人们只能在边缘发现趋同。^①

自然,跨国公司也在变化,保持对动态市场的适应性,对公司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来自不同国家的公司要想在同一个市场出售相似的物品,它们在这一市场的日常行为可能常常会很相似。但是,对于那些统治今日国际市场的公司来说,民族的根源仍然在一些更为根本的地方起着作用。公司的民族性并不必然由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或者大股东的驻地赋予

① 路·波利和西·里奇:《国家结构和跨国公司行为》,载于《国际组织》第51卷1997年第1期冬季号,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作进一步研究的分析方法和意义。

(尽管它几乎总是这样),从更根本上说,它来自历史。

跨国公司的核心战略行为具有广泛的差异。为了说明这些差异,人们给出了三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认为,公司行为受到工业部门的性质的影响最大。第二种解释强调内部影响的重要性,诸如技术的敏感性和主要生产线的成熟性。第三种则着重指出,跨国公司在本质上具有可塑性,公司运转的特定环境对它产生决定性影响(例如,跨国公司被认为常常灵活地使自己去适应东道国市场的地方法律和地方品味)。

对于这三种解释,我们都表示怀疑。我们所观察到的公司行为的差别与工业部门没有关联,也与工业的成熟程度毫不相干,而且,即便在同样的环境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差别的存在。

没有一种解释能够把握所有公司在所有时候的实际本质。例如,化学工业显然就受制于高昂的运输成本和特定的公害,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化工企业的某些行为,不论它属于哪个民族。同样,对特定东道国市场作出承诺的公司必须使自己去适应这一市场。然而,在公司的最基本战略中,总的性质上仍然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跨国公司所植根其中的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似乎最为合理的解释。

植根于公司中的认同

各工业领域中的主要跨国公司都是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基地的,这三个国家在二战后都缩小了政策策略的空间。简言之,它们都寻求获得加强国际经济联系所确保的收益。这就为

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所特许的公司创造了繁荣发展的政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中有许多公司向跨国公司的转变显然是人们有意所为,即使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精确地预见到其后果。企业在这一政治空间中的跨国化并不是杂乱无章地进行的。它更多地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市场推动的。在世界最主要的跨国公司中,显然存在着工业部门和生产线上的差异。然而,更重要的是,民族性的差异——许多观察家认为其重要性在不断减少——实际上依然持久存在。

在德国,尤其是在日本,人们依然反对将各种具有特色的民族价值观念和机构进行合并。这种承诺并不必然反映在公司明文规定的政策中,但它植根于公司的结构和文化之中。换句话说,与许多美国公司相比,德国和日本公司具有更加明确的民族认同感,对于处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的自己民族和地区性繁荣有着更为明确的承诺,对于世界其他地方适应它们本国的内部行为准则的能力有着更加现实的认识。

美国跨国公司的领袖们在面对公司的“民族”认同时,似乎常常遇到困难,这种困难看上去极为独特,具有典型的美国特征。正如学美国史的学生们所说的那样,它与美国在极为独特的政治环境中围绕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所经历的漫长和严峻的斗争相吻合,或者说是它的一种反映。^① 我们的观点与此相似,即,“全球公司”大多是美国的神话。

让我们来看看不同国家的商业领袖在谈到“自由贸易”、“消除管制”甚至是“全球化”时所说的不同含义吧。美国公司的领袖们在公开的声明中,在与我们的私下交谈时,用这些词指对更

^① 参见西·洛伊:《自由主义的终结:美国第二共和国》1979年纽约诺顿书局第2版第50—52页。

加开放的承诺,指国内外不受限制的竞争,指做事直率不顾后果。而对德国,特别是对日本的经理们来说,这些词语尤其意味着要作出承诺,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们自己的产品开放市场,并且不断对他们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中的直接投资开放市场。这些词语并非没有其知识上的内涵,但是在德国和日本的公共领域中,这些词语大多成了用于防止美国市场关闭的祷文,这一祷文近来又被用于促进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调整。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德国和日本的公司领袖们都极少表现出对真正的自由放任政策,对限制卡特尔式行为,对其他可能导致本国市场向全球竞争开放的行动的支持。非关税形式的结构上的壁垒依然存在,而且常常以微妙的形式出现。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市场中,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核心工业的实际运转,历史上的商业联系的持久存在以及这些联系的意识形态基础,仍然在社会价值观念和世界观上表现出根本性差异。

公司的跨国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过程,仍然具有民族性的公司以及这些公司依旧植根于其中的创新和投资体系,通过这一过程被置入各自的市场之中。这些公司然后在边际上使自己作出适应性改变,例如,使自己的产品和销售活动更符合当地市场的口味,或者积累某些在其他市场具有实际益处的有利条件返回本国。但是,这些在边缘上的小修小补并不能破坏那些根深蒂固的连续性,例如,在德国的统计和银行体系(恰恰是它们受到了改革)中,在日本的技术和投资战略的网络基础背后的历史动力中,在美国跨国公司的长期计划所受到的制度的持续制约中,都体现了这种连续性的明显存在。

(王列 译)

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

[美]詹姆斯·N. 罗西瑙

在新加坡,机场商业区的饮食区有 15 个饮食店,不过只有一个提供本地风味;而孤零零惹人注目的麦当劳也是唯一一个挤满顾客的。在纽约,为了吸引不断涌入的亚洲人,风水先生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追逐对象。风水是中国的一门古老技艺,旨在使人为建筑的位置与自然达到某种和谐。那些亚洲人除非确信房屋的位置符合风水的要求,否则,就不会买它们。

大多数人看到这些情况可能不会吃惊。他们甚至可能以为这是 20 世纪后期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地方性习俗传播到遥远的新地方的例证。在前一种情况下,传播是从西向东进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传播是从东向西进行的。但是它们

* 詹姆斯·N. 罗西瑙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本文原载于《当代史》(英文)1997 年 11 月第 360—365 页。

共有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习俗传播并在极为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得到了确认。那么人们在思考这一过程时,马上在脑海中想到的是什么呢?回答可以一词以蔽之:全球化。这是时下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常能用来说明一些人员、活动、规范、货物、服务以及通货,越来越不局限于一个特有的地理空间及当地固有习惯的现象。

诚然,有些人声称,“全球化”是观察家们在看到情况似乎已有所不同,他们舍此又难以把他们说清楚时使用的一个最新的时髦词。由此推断,这就是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被贴上全球化的标签,但对这一概念却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表述的原因。不同的观察家用它描述不同的现象,而且各种用法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更糟糕的是,由于全球化的概念不易表述,于是为各种其他类似词语的使用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词语包括:世界社会、相互依赖、集中化倾向、世界体系、全球主义、普世主义、国际化、全球性,等等。当人们努力捕捉当今公共事务似乎与往日大不相同的原因时,上述类似词语便会冒出来。

这种推理对人有误导作用。各种各样界定不严的全球化定义的激增,以及人们乐意用各种似乎相同的词语的心态,与其说反映了概念的不易把握带来的混乱,不如说它们是一场本体论转变的初级阶段,是对理解陌生现象的新途径的不安探求。缺乏精确表述也许是出现用时髦词语说明不易解释的现象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这样的语汇之所以在如此不同的背景下使用,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共识,即人类生存条件的一切方面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什么是全球化

长期以来,民族国家的权力一直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现在世界事务中出现某种新东西,正在使主要的活动和事务超出这一权力的影响范围。因此,让我们首先弄清楚,全球化一词在说明这种新事物的众多时髦词语中用在何处最贴切。虽然所有时髦词语似乎都集中在说明人类目前生存条件的同一方面,但还是可以对它们作有益的区别。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人类生存条件的这一方面的首要特点是变化,即习惯与规范的变革,那么“全球化”一词似乎贴切地表现了正在改变人们对领土和国家制度的传统安排的关注的“某种东西”。这个词正好包含变化的意思,因此它能够把现象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普遍状态或一种人们所希望的最终状态区别开来。

换句话说,如果把全球化看成是一个基本过程,它不同于全球主义,后者指对一种状态的渴望,在这种状态中,价值观念为50多亿人所分享,或与他们的环境、他们作为有兴趣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共同问题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地位息息相关。全球化也不同于世界主义,后者指科学或宗教都要加以利用的一些价值观念,它们包容整个人类,无论他们处于何时何地。它还不同于复杂的相互依赖,后者指把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们和共同体联系起来的结构。

虽然全球化概念与这些概念有联系,但它在此处的含义要狭窄一些。它指的既不是价值观念,也不是结构,而是既在人们

思想上展开,又在行为上展开的序列,是随着人们及其组织从事日常工作并设法实现其特定的目标而展开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不同在于它们不受领土或司法因素的阻碍。就像本文开头的两个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过程可以在许多方面轻而易举地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类共同体。它们是由这样一些力量组成的,这些力量推动个人、团体和制度接受相似的行为方式,或参与更有包容力、更有协调性的进程、组织或体制。

相反,本土化则源于所有那些压力,它们使个人、集团和制度缩小其眼界,接受不同的行为方式,退回到不大有包容力的进程、组织或体系。换句话说,任何技术、地理、社会、经济或政治发展,只要它们促使利益和习俗扩展到既定边界以外,它们就既是全球进程的来源,又是它的表现,正像这些领域内任何限制或减少利益的发展既是本土化进程的来源,又是它的表现一样。

请注意,全球化进程被认为惟一有可能是世界规模的。事实上,还没有过一个集团、政府、社会或公司是全球性的,而且也没有哪个连串的序列囊括了整个世界。像非洲的内战和饥荒或东欧抗议政府的活动之类的电视报道事件,可以证实一种世界范围的传播,但是这样一种范围并不被认为是全球化动力的先决条件。任何相互作用序列,只要它拥有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民族国家管辖范围的不受限制的传播的可能性,它就被认为反映了全球化的作用。

显然,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股力量的差异造成了对领土性质的两种相反的理解。全球化正在淡化与土地相联系的边界和身份,而本土化则正在退缩压力的驱动下强调边界的意义,强化对能够左右情感和理智的土地的深深依恋。

简而言之,全球化是在扩大边界,而本土化是在强调边界。

前者允许人员、货物、信息、规范、习俗和制度到处流动,不去理会或干脆不管边界问题。而强调边界的本土化进程旨在抑制或阻止人员、货币、信息、规范、习俗和制度的流动。然而本土化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共同体和国家边界可以被强调到相当高的程度,但它们不是不可渗透的。独裁政府企图使它们成为不可渗透的,但是在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上,在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通讯技术不易监控的情况下,他们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上有些紧张状态之所以持续存在,正是由于如下事实,即没有一个地理上的边界能够达到天衣无缝,使观念和货物都渗透不进去的程度。说得再明白点,至少从长远看,有些全球化动力是注定要占上风的。

扩大边界的全球化动力之所以已经变得非常引人注目,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可以实现世界性扩展可能性的设施、利益和市场出现了迅猛发展。同样地,收缩边界的本土化动力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了,这部分地是因为些民族和文化认为受到了全球化侵犯的威胁。当一直把他们同传统世界隔绝开来的边界不再能提供保护时,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崇拜偶像、他们的信念体系、以及他们的共同体似乎都处于危险境地。这些担心当然是有事实依据的。全球化确实在侵犯,它的进程确实在把工作岗位转移到世界各地,它的规范确实在破坏传统的习俗。对于这些威胁的反应可能各种各样,大不相同。一个极端是适应,即接受扩大边界的进程,并把它们纳入当地习俗,以便加以充分利用。另一个极端是想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封锁边界以及经济孤立的办法避开全球化的进程。

分合的动力机制

因此,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当今世界事务的核心。而且两股力量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好像全球化的每一次扩展都会导致本土化的增加,反之亦然。我长期以来一直用“分合”^①一词说明这些紧张关系。这个词让人感到不舒服,也许甚至让人讨厌,但它的长处是,抓住了本土化的分裂力量同全球化的一体化力量之间无处不在的互动作用。^②在欧盟处理统一货币问题的斗争中,在法国的让·勒庞、美国的帕·布坎南和澳大利亚的保·汉森的竞选运动及其胜利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所展示的分合动力。

分合不是惟一的动力,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无论全球化还是本土化都是各种力量的聚合,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并通过不同的途径促进更具包容力的进程(就全球化来说)和不大具包容力的进程(就本土化来说)。而且这些各种各样的动力作用于人类从文化、社会到经济和政治的所有活动领域。

在政治领域,全球化动力构成了这样的发展的基础,这类发

① “分合”的原文 *Fragmengration* 是 *Fragmentation*(分裂)和 *integration*(结合)的合成词。——译者注

② 关于分合动力的详细论述,见詹·罗西瑙:《沿着国内边界:探索一个混乱世界的治理问题》199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版第6章。

展促使权威、政治和利益扩展到现存社会建构的领土边界之外；而本土化政治则涉及这样的趋势，在这类趋势中，权威和政策的作用范围在收缩，并回到不如现存社会建构的领土边界那么广大的事务、问题、集团和制度中去。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包含着生产、贸易和投资向原产地以外的扩展，而本土化动力则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收缩到比较狭窄的边界之内时发挥作用。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全球化起着将观念、规范和习俗扩大到它们的原生环境之外的作用，而本土化则强调或缩小原生环境，以阻止新观念、新规范和新习俗的侵袭。

必须强调的是，展现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动力都是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人类的基本需要，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于人们扩大他们自己创造的秩序的范围，以便为他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农业革命、工业和后工业变革是支持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然而，即使在这些动力发挥作用时，相反的收缩趋势也在继续产生影响。本土化的动力来自人们在实现心灵慰藉时对于身边的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换句话说，全球化的动力长期以来一直在助长大秩序，而本土化的动力长期以来一直在创造追求小秩序的压力。简而言之，分合一直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全球化最终要占上风

虽然世界事务正在形成的结构本身极其复杂，但观察家们

毫不犹豫地预料到随着全球历史的展开,分合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一致认为,虽然全球化动力与本土化动力之间的较量必然会出现双方力量对比的波动,但基本趋势是,前者要战胜后者。也就是说,最终全球化动力预计将成为事态发展有序安排的基础。

然而,在全球化占上风究竟会带来可喜的还是不祥的后果问题上,共识出现了分歧。对全球化进程表示欢迎的人强调经济变革的力量。在这种观点看来,通过技术和消费品的扩散、金融资源的迅速转移,以及跨国公司拓展其市场占有率的努力,民族国家经济的全球化被认为是强劲和经久不衰的,足以顶住并最终战胜所有走向分裂的压力。这种思路承认,支撑全球化过程的扩散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动力,但不同的是,当今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任何国家、任何部门出现的创新都可能即刻转移到其他国家或部门,并为它们所接受的程度。因此:

当这一扩散过程同文化或政治保护主义发生冲突时,文化和保护主义才是应当检讨的对象。创新在加速。生产率在提高。生活水平在改善。当然,也有倒退。它们充斥着报刊的头版头条新闻。但是我们相信,战胜倒退所需要的时间在发达世界已经大大地缩短了。的确,最近的经验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经济因素占着上风……

……如此看来,全球化——经济创新在全球的传播和伴随这种传播而来的政治文化调整——不可能停止。……正像历史所教导的那样,哪种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能带来优异的经济成就,哪种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就能生存、兴

盛,并取代生产率低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①

可以肯定,强有力的经济刺激会支持并加快全球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思路会因为没有想到它的对立面而受到抨击。这一理论没有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动力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作出其他解释。人们不能证明这一理论的不正确之处(如果它有的话),因为任何反面证据都仅仅被看成是“倒退”,是对已预言的进程的可以预见的暂时偏离。当然,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事态发展与预言的全球化模式完全吻合,以致人们高兴地得出结论:这一理论已经得到了证实。但是,在没有其他设想的情况下,这一理论对如何解释各种现象,特别是解释那些显示分裂趋势的现象没有提供什么指导。从这一角度看,它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个人们可以皈依的信条。

另一些观察家对分合今后的发展不那么乐观。他们强调,随着全球化占上风,接踵而来的将是一系列不祥后果:“它的经济主义,它的经济简化论,它的技术决定论,它的政治犬儒主义、失败主义和墨守陈规思想,它的主体非社会化和风险再社会化,它那仅受资本积累和市场驱动的无情的全球‘逻辑’所具有的目的论潜台词,它的将资本积累和市场以外的其他因素、事业或目标从社会行为所追求的优先价值中排斥出去的习惯做法,等等。”^②

还有一种看法,既考虑到了可喜的后果,也考虑到了其不祥

① 威·刘易斯和马·哈理斯:《全球化为什么肯定会占上风》,见《迈金斯尼季刊》1992年第2期第115页。

② 巴·吉尔斯:《社论:“全球化”与“抵制政治”》,载于《新政治经济学》1997年3月第2卷第12页。

之处,这一看法是由迈克尔·朱恩提出来的。他发现跨边界活动的迅速发展同有效治理的范围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之处。因此,国家正在经历可以称为“不平衡的民族非国家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初级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国际治理的作用上升引人注目,但并没有相应地出现民主控制机制。此外,人们与遥远的政治进程疏远了。……这样,西方世界的民主国家将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它不但要被全球化进程所削弱,而且要被国际制度的上升所支配。”^①

虽然朱恩欣然承认,现在还难以预见不平衡的民族非国家化进程把世界推向何处,但是,他提出了两种有可能变成现实的设想:“悲观的设想强调分裂的事例,突出变革所造成的破坏;而乐观的设想预料,至少从长远看,集中化将获胜。”后一设想是以这样的假定为依据的,即各个社会相互依赖性的增加,将促使它们对作为国际制度基础的非常复杂的安排形成比较有效的民主控制。

不平衡的分合

我个人在对分合进程进行理论推测时有一个重要假定,即本土化和全球化两种趋势之间不存在固有的矛盾。我以这个假

^① 迈·朱恩:《欧洲发生了什么变化?全球化和个人化的挑战》,提交给关于“发生了什么变化?关于世界秩序的对立性展望”讨论会(1993年5月14—16日于哥本哈根)的论文第40页。

定和上述另一些看法为基础,提出一个既预料分合的最终结果,又说明其对立面的总的假设。这就是:全球化倾向越流行,本土化对进一步全球化的抵抗就越弱。换句话说,全球化和本土化会共存下去,但是前者将确定后者的发展环境。由于共存的程度会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取决于全球经济的突出程度和种族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积极促进本土化的程度),我借鉴朱恩的办法,把假定所描绘的进程称为“不平衡的分合”。这一假定考虑到了即使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股趋势越来越(却是不平衡地)相互适应时,它们也存在着一些对立。它不否认悲观设想提出的分裂将破坏全球化趋势的情况;相反它认为分裂越来越局限于特定情况,而且后者最终可能在更大的相互依赖机会和要求的引导下适应全球化。

在说到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股趋势相互适应时,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多种身份和多种忠诚在数个集体中获得心灵慰藉,他们可以提高本土价值和全球价值,而不必贬损对方。不平衡分合的假设预计,按照这些思路考虑问题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认定心灵慰藉只有通过拥有一种最高的忠诚才能实现的相反假定,变得越来越过时了。可以肯定,人民早就习惯于假设:为了通过集体身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心灵慰藉,他们必须有一个效忠偶像,必须有一种最高的忠诚,一种只能归属于某个集体的忠诚。不过,这种推论是国家体制的遗产,是使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那种几个世纪的危机的遗产。正是这一逻辑,长期以来发挥加强国家作为政治组织的“天然”单位的支配地位的作用,而且它可能在紧张的冷战年月达到了新的顶点。

但是,如果正像前面所强调的那样:领土的概念正在变化,国家对它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所表现的无能为力状态,已经导

致了它们的能力的下降和合法性的丧失,那么可以得出结论:人民必须有一种“最高忠诚”的观念也将衰落,并让位于多种忠诚观以及这样一种理解——即本地的、民族国家的和跨国的交往不必是相互排斥的。因为现实是人类事务出于正当理由在所有这些层面上组织起来的;人们的某些需要只有身边的组织能满足,还有一些需要只有民族国家或跨国层面的和他们没有联系的实体才能充分满足。

此外,随着国家的作用和忠于民族国家观念的削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理解的态度看待允许多种忠诚和多种身份的现实,而且随着全球经济的好处的扩大,以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福利取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态和走向,这种理解还很有可能扩大。与此同时,满足他们的需要的遥远的经济进程是非人格化的,它们几乎不可能促进与一个集体交往中的其他人共同分享的需要。这种需要长期以来一直靠民族国家来满足,但随着分合动力已经削弱了作为心灵慰藉之源的民族国家层面,随着跨国实体似乎过于遥远,以致无法提供心灵交往的好处,通过身边的交往获得满足,很可能看上去更有吸引力了。

风 险

看来很显然,分合已成为全球生活的一个持久特征。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全球化不只是一个时髦的词,它还包含着使我们人类既有可能发展,也有可能退化的普遍复杂性和矛盾。当我们的世界经历深刻而持久的变革时,为了确保发展而

不是退化,重要的是人们及其制度能适合多维性和细微的差别。为了坚持对全球化的一种理解而否认复杂性和矛盾,会冒过于简单化而造成的许多风险。

(杨雪冬 张文成 译)

五十年足矣*

[埃]萨米尔·阿明

世界主要的经济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现世界贸易组织——译者注)的行为,一直是许多批评性研究的对象。已有如此多的信息精确、分析透彻的研究,以至于令人怀疑是否还有再多说的必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年以前,大部分批评都保持着中立的姿态。当然,批评者指出了这些组织追求的政策是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的一部分,它们服务于跨国资本的利益,无视环境(这方面的主张几乎还没有开始得到重视),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发展”会通过“滴流”效应减少“贫困人口”的观点。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批评者又对开放和全球化进步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随之认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开放和全球化进步的支持,认为这种支持有助于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难题,恢复主要货币的可兑换性,逐渐降低关税

* 作者系埃及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本文译自《每月评论》1995年5月号。

等。人们也注意到,这些组织尊重一些国家的选择,即:赋予公共部门以重要的经济作用,严格控制外国资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选择“社会主义”,切断国内价格和工资与世界资本主义逻辑的联系,对国内收入进行全面的再分配。

所以,在这一时期,对这些组织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它们在进行干预时谨小慎微。这一时期也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事,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同资本主义大国打交道时竟然无能为力;美国竟然把世界银行从欧洲复兴计划中排除,代之以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在要求降低关税时竟不敢再前进一步;如此等等。

由1982年墨西哥威胁要停止支付债务所引发的外债危机,对改变这种观点的影响并不大。这些国际组织,特别是这场事件的主角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其在新形势下无所作为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人们认为,基金只是“重新安排”了债务的支付计划,并没有铲除问题的根源或者说导致问题再次出现和扩大(高利率、毫无控制的开放等)的机制。

在1981年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批评变得更加尖锐。当罗纳德·里根——他的行动准则是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条——上台时,这些组织立即转向这些信条,它们好像必须紧跟白宫时尚的每一个变化。这种转向很快形成了一个简单而且一刀切的行动方案:“结构调整方案”。该方案首先用于被认为处于“危机”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好像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处于危机中),迫使它们在新情况下进行调整(单方面地)。到80年代末,这个方案扩展到东方集团国家,以便通过使之快速地转向“正规的”资本主义来“帮助”它们。

本文不拟赘述对各种不同形式的“调整”的批评。已经作出的出色而且全面的批评(包括对国家经验的具体研究和广泛综

合),使得我们没必要这样做。我衷心支持“国际人民审判七国集团法庭”在1993年东京判决上对这些批评所作的总结。在法庭看来,“结构调整方案”产生了以下后果:失业人数激增,工作报酬下降,粮食依附增加,环境严重恶化,卫生保健制度衰败,入学率下降,许多国家的生产能力削弱,对民主制度的破坏以及外债不断增加。

这一判断——尽管是大体轮廓上的,但精确有力——含有两个重要而且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前一个是明确的,后一个则比较含蓄:(1)国际组织制定的服从七国集团战略的政策是导致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南方和东方的居民生活严重贫困化的原因;(2)这些政策没有提供解决“总体危机”的方案,相反,使危机陷入紧缩通货主义式的循环而趋于恶化。

在我看来,该判断的第二个方面对我即将阐述的观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国际机构的政策的批评是由性质极为多样化的“非官方组织”提出的。许多这类组织对“资本主义”概念一无所知,结果,他们对这些政策的批评完全是道德上的。这些政策被指责滋生了贫困。好像世界体系的逻辑本该与贫困无缘似的。所以贫困成了可以被“纠正”的“错误”的产物。

有些批评者并没有忽略属于整体世界体系的逻辑所负的责任,而且,在过去几年中,世界银行的确对80年代所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有限的“自我批评”,以试图挽回名誉。但这又引来另一种激烈的攻击,说世界银行在简单地顺应克林顿政府的新辞藻。不管情况如何,无论是隐蔽在“金融”职业精神背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永远都含糊不清并受到跨国公司(它控制着自己的顾客)的“商业秘密”庇护的关贸总协定,并没有对克林顿政府的方法照搬不误。言辞激进的攻击者可能又想作出

如下评论,即这种双簧戏也是白宫导演的,并且各个国际机构的官员只不过是依据上述精神来各司其职而已。

总之,世行的“自我批评”以及它为“贫困者”洒下的眼泪,没有蒙骗住所有的旁观者。马科斯·阿鲁达在1993年的一份文件中嘲讽地指出,世行继续忽视这些事实:“贫困者”在1980年被列入其政策议程之前早已存在,因此它不是一个“新”问题;没有最终解决的债务危机,导致南方成了向北方输出资本的地区;世行倡导的出口导向增长是脆弱的、难以持续的;将公众参与和民主排除在外,是结构调整政策的实质。

“历史规律”

我相信扼要地概括一下资本主义的逻辑总是有益的,即使这要冒老生常谈的风险。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有可能(例如)与“社会主义信条”相对立的“发展的体系”。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区分一下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扩张的现实与“发展”的概念。对于被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加以研究的前者,必须从两个层次加以考虑,即其内在的(抽象的)趋势和其历史的(具体的)现实。另一方面,发展这个概念在本质上则是意识形态的。它使人能根据事先制定的标准来“判断”结构,这一标准还有助于界定社会工程,这些社会工程可能或多或少有些激进,它们提出不同的自由、平等、人类解放或效率等概念。

将这两种概念,现实(资本主义扩张)和企望之物(按预先界定的方向发展)结合(或者说混淆)在一起,导致了在对现存政策

的批评中出现许多盲点。我们所谈及的那些国际机构正在有系统地把这些概念混合在一起——它们提出帮助资本进行扩张的方法,并且把它们生产的结果,或者在他们看来可能出现的结果,认定为发展。

然而,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并不意味着任何结果都能被视为发展。例如,它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或者收入分配中被预定的平等程度。扩张是由公司对利润的追求引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控制着公司并因此被赋予体现为私有产权的垄断权的资产阶级所引导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逻辑可能会导致就业的扩大,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会减少就业;同样,它也会缩小或扩大收入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对“市场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经济”概念的混淆,削弱了对现有政策的批评,这是很危险的。“市场”这个词在本质上指的是竞争,而不是“资本主义”。后者的内涵正是由对竞争的限制所确定的,这种限制隐含于垄断的私有产权(属于某些人而其他人则被排除在外)之中。“市场”和“资本主义”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概念。一直为市场“优越性”辩护的瓦尔拉斯并没有接受我们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每天无意中所作的混淆。他甚至懂得了这一事实:资本主义提供了一幅关于市场的非最优图景,而且市场的真正规则意味着要取消私有财产。所以,他设想了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理想状态。“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恩格斯为了描述第二国际的方案而创造的,并且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被新西伯利亚学派的“改革者们”所采纳。这项工程的乌托邦本质——其缺陷在苏联所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中暴露出来——只是提醒我们要注意马克思对“经济主义”的批判。

事实是,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作为垄断产权的受益

者间的竞争(彼此间的和与他人间的)体系而运转的。资本主义为了运转起来,要求代表资本整体的集体权威进行干预。所以,国家不能同资本主义分离开来。资本的策略以及作为资本代表的国家的行动方针,有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逻辑。该逻辑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扩张在某些时候导致了就业的扩大,在其他时候带来了就业萎缩。这些逻辑形式不是抽象的“市场规律”的表现,而是资本利润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要求。在过去25年中,失业增长不是“市场”的产物,而是资本战略的结果。失业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破坏工人运动成就的必要手段。这种看法既适用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再度被征服的东方国家。没有理由相信那些当权者为失业悲叹时发表的讲话,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贫困”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不是特定环境或“错误”政策产生的“消极”后果。它们是该体系的逻辑,该体系本身内在的世界两极化逻辑的产物。所以,尽管这些“后果”时强时弱,但它们是持久存在的。

在我们所讨论的阶段(从1945年至1994年的战后阶段)中,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一方面逐渐侵蚀着前一个历史阶段(从重商主义,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所建立的国民生产体系,另一方面已经适应了边缘地区的工业化进步,后者此时已经被精确地排斥在工业生产领域之外。

所以说资本主义扩张既造成了世界体系中的这些变化,也根据变化调整着自己。因此,我认为对首先由国家、其次由国际组织执行的政策,应该根据这个既矛盾又互补的双重要求加以检验。在我看来,其结果是,应该从资本体系逻辑的角度,而不要在“发展”的名义下取得成果为根据来修正“道德”判断,或者是那些以诸如“成功”和“失败”这样一些密切相关的术语所表达的判断。

我的“历史规律”观——在这里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例如，战后边缘地区的工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产物，而是工业化所必然要求的民族解放，在取得胜利后创造的各种条件的产物，世界范围的资本适应了这些条件。另一个例子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效力的侵蚀不是确定未来的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因素。相反，国家对全球化的反应会把世界扩张推向不可预测的方向。

在这里进行的反思需要对战后时期进行详细考察，需要确定其后续发展的阶段，并在这一背景下评价国际组织执行的政策，无论是支持资本主义扩张的政策，还是帮助资本主义扩张去适应这一时期特有的社会关系所强加于它的条件的政策。显然，作为一个整体，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繁荣阶段（1945—1975年）和开始于1975年的危机阶段。根据我的分析，前一阶段的繁荣是建立在三项社会工程的互补性基础之上的。它们是：（1）福利国家的全国性社会民主工程，其行动基础是相互依存的国家体系的效率；（2）我所说的“万隆工程”，指的是在体系边缘进行的作为“发展”的意识形态的民族资产阶级建设；（3）相对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的苏联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工程。

在第一个阶段，国际组织显然发挥了与繁荣有关的作用。它们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同时出于原则考虑，避免了任何对世界体系组成部分的独立性的冲击。几乎是天性使然，它们的干预总是产生右倾。在第二个阶段，曾经作为前一阶段繁荣基础的各种体制先是被侵蚀，然后是陷入危机和崩溃。这个仍未结束的阶段并不是被人们说滥了的新世界秩序建立的阶段。相反，这是一个远未结束的混沌阶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为1970年之后国际机构的活动定了位。根据我的分析，这些活动不是

积极的资本扩张战略的组成部分,而是为这种扩张创造条件的尝试性努力。它们并不会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自发”工程——通过众所周知的“市场”,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力量的眼前和短期利益,来管理世界的工程——仍然是个乌托邦。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使我们重新思考通过资本进行管理的自发倾向。从这个角度讲,我相信关注一下我曾经说的五大垄断是不无裨益的,中心对边缘的统治通过这些垄断在不远的将来会发展起来。

制度结构

关于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组织)的干预,已经有许多文章作了论述,此外还应该加上主要的地区性组织,它们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非洲的处理欧共体与非、加、太集团^①关系的洛美协定。在下面的篇幅里,我将简要概括这段历史,这只是为了强调一下对这些国际组织的批评以及我从这些批评中得出的推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初目标是保证开放的世界经济的货币稳定,以替代在二战前已经成功地完成其功能的金本位制度。这意味着它的干预是要求所有成员进行调整,不论其国际收支

^① 非、加、太集团(ACP)最初由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的46个发展中国家组成,旨在作为整体与欧体及其他欧美国家进行贸易。——译者注

是出超还是入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存在的第一个阶段中帮助重建欧洲货币可兑换性(1948—1957年),然后又帮助欧洲经济进行调整(1958—1966年)时,它给人的印象是具有一定的效率。然而,从1967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建立了特别提款权,但仍然无法维持货币的稳定。1973年采取的浮动货币体系,可以被看作是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到此时它的继续存在出现了问题。它依靠增加新功能才得以生存下来。这种新功能就是:管理发展中国家的单边结构调整,并且从80年代末起,对东方集团国家进行干预,以保证其重新加入国际货币体系。

几乎所有世界经济分析家都普遍同意对该组织的下述批评:(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另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世界银行一样)是为美国提供全面控制而设计的。美国否定了凯恩斯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的倡议,乐意选择一种更弱的组织,使之处于依附状态,以便对它保持更有效的控制,而且又和其他国家共同分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借贷,但其资源一直有限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有能力强当一种“催化剂”(例如制订限制性条款),但是不会走得更远。(2)尽管在其授权中清楚地表现了自身的逻辑,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能力像强迫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强硬地逼迫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不论是出超还是入超——去执行结构调整方案。当然,这方面的原因就是上一段所表述的。(3)在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没有70年代那种阻止过度借债的目标,也没有后来所追求的减少债务的目标。它的任务是通过进行为这种专门目标(为债务服务)而设计的结构调整来管理债务,尽管这些调整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4)在同东方集团国家建立的新关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追求在最

大限度公开化条件下,加速其重归可兑换性货币的目标。它所提出的极端野蛮的解决办法是众所周知的:在一年内重建可兑换性,而西欧在1945年后,花了15年才达到这个目标。(5)在所有这些功能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真正的权威来制定目标,它仅仅是七国集团制定的战略的执行者。这些战略是根据美国、日本以及欧共体最大共同利益制定的。

如果我们想对替代选择的价值进行严肃的讨论,就有必要超越这些批评。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改正上面所说的弱点,并且作为抉择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成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这种世界中央银行当然会推动调整,但它是对所有成员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影响(增加就业、减少贫困等)。它注重环境,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不平等,它意味着开放。但我怀疑世界中央银行会起到这些作用。这种怀疑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资本主义历史上特有的增长与停滞的阶段交替,并不是一种时“好”时“坏”的货币体系造成的,我早就指出(同巴兰和斯威齐一起),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往往具有创造相对的生产过剩的趋势。在增长阶段中,与这种生产过剩相联的停滞趋势,会由于每一阶段所特有的原因而被克服。我曾经分析过战后我们所处的三位一体的历史环境,它们包括:国家的“福特主义”;欧洲复兴和发展主义;民族解放、苏维埃主义、“与世界体系的脱离”,而这一时期庞大的军费开支对此起了强化作用。由这些条件促成的全面的强劲增长,使货币体系运转得更加顺利,不论这一体系的变化多么不可预测。(2)在这些条件下,汇率的稳定性不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适宜和胜利促成的,而是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强权促成的。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和欧洲对资本流动的行政控制,强化了这种以“美元饥渴”形式体现出来的经济强权。欧洲的这些行政控

制一直维持到欧洲完成了复兴,可以对外开放为止。这一趋势的持续发展,对美国构成了损害(由此出现了它的“相对衰落”),而且世界体系从美元短缺转到了美元过剩。与此同时,在60年代晚期(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战后繁荣基础受到了侵害,导致了一场生产性投资机会大量减少的危机。相伴而来的美国赤字(导致了市场上美元供应的过量),造成了大量流动资本无处可去。因此,在1973年选择了浮动汇率是完全合理的,它允许庞大的流动资本在金融投机中找到出路。今天,世界贸易额达到了2万亿美元,国际资本流量据估计达到了50万亿美元!如果没有金融开放和浮动汇率,死气沉沉的巨大资本早就加剧了上述危机。因此,世界体系的逻辑要求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控制”危机而不是结束危机,靠体系自身的能力是无法做到后者的。(3)单方面施加给最弱伙伴(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的调整政策,达到了控制危机的要求。这些调整并不是由遵循一种荒谬的意识形态产生的“错误”或偏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阻止70年代的借贷过度上没有做任何事,因为不断增加的债务,是控制危机以及危机带来的闲置资本过剩的非常有益的手段。因此,现在所进行的调整的逻辑要求资本普遍的自由流动,尽管这会由于减少工资和社会开支、放开价格以及取消补贴、货币贬值等因素而造成需求缩小,并且因此可能带来发展的倒退。这些实际上把控制危机放在最先考虑的组织所作出的信誓旦旦的声明,它们为“贫困”处境洒下的眼泪,以及热中于“刺激需求”的咒语,只不过是些应景之作。没有理由去相信它们的诚意或者找到它们的可信之处。(4)高利率不是一种“错误”。假定流动资本所需的抵御汇率风险的保障包含在已经建立的富有弹性的体制之中,高利率就是确保流动资本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的最有效方式。所有这些构成了一整套控制危机的连贯一致的政

策。(5)所以,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可“指责”。布雷顿森林体系各组织适应了建立在上面提到的互补的三位一体基础之上的战后繁荣,并且对它给予了支持。当三位一体体系出现危机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崩溃了。到目前为止,为应付这样一些情况(如货币浮动、高利率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所作的选择,已经提供了有效的控制危机的手段(从资本的角度看)。与此同时,它维持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缺乏替代物)并允许美国强制性地从其他伙伴那里借贷来弥补赤字,从而使美国获得了新的霸权。这种选择完全是合理的,它通过要求美国(代价昂贵地)维持其军事霸权来支持美国的利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与大英帝国失去其经济统治地位的情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880年左右,英国就失去了最有效率的工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其漫长的衰落过程中,英镑本位一直苟延残喘到1931年。这就让我们能够理解,瓦尔特·罗素·米德对把服务于债务放在首要地位考虑的现有体系的运行与一战后凡尔赛会议上的胜利者的态度之间所作的惊人的准确的类比。我相信这种类比可以进一步拓展,而且它涉及的远不止是对待国际债务的态度。(6)对东方国家的干预是由政治逻辑决定的。为此而采用的粗暴政策有着清晰的政治目标:摧毁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生产结构,以实现把它们重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使之成为附庸的边缘而非平等伙伴的目的;搞乱工人阶级的队伍;加强新的买办资产阶级。还有,那就是分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切断它们之间经济团结的纽带。这就是为什么马歇尔计划支持朝着建立欧共体迈出了第一步,同时又鼓励东欧国家的合作,而西方政策的目标却是加速前经互会的解体,尽管这使得重建欧洲区域经济变得更加困难。

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改革者们”所提出的核心主张——

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成世界中央银行——并不现实。这个主张肯定是符合逻辑的。全球化早已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并且在按照逻辑发展的要求对经济、金融及货币体系进行着全球化管理。但是用上述方式来表述从承认全球化的事实中所得出的推断，却是不恰当的。脱离政治和国家的经济是不存在的。所以，从逻辑上讲，经济全球化要求建立一个能够应付挑战的世界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进行社会协商的权力体系，就像民族国家管理其内部事务一样。然而，在这方面并不成熟，甚至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经合组织)，或者欧共体中也是一样。所以在客观上不可能有一种世界货币以及一个世界中央银行。货币和银行意味着政治问题已经解决，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建立世界中央银行的主张重复了凯恩斯在 1945 年提出的观点。在当时使这项计划成为乌托邦的原因现在仍然有效，尽管经济出现了全球化进步。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人们所提出的国际货币保障(特别提款权)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同样的逻辑基础上的。由于极为充足的理由，这项计划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不能克服不断扩大的，在日益全球化的空间中管理经济和四分五裂的民族国家的空间中管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可供替代的选择仍然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者或野蛮主义。

然而，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并提出解决方案仍有必要。我将在下面提出一些我认为不是乌托邦的主张，因为它们承认上述矛盾。这些主张的出发点是建设一个多中心世界，它们注重受到控制的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组织，注重发展不平衡的大地区的自主性。因此，这些主张意味着发展地区货币体系并加强它们之间的结合。在我看来，它们不会犯世界银行或者欧洲中

央银行所犯的本末倒置的错误。我将要提出的主张是从今日资本主义的现实(包括其危机),向世界社会主义的漫长过渡的逻辑的一部分。这种社会主义无法用一根魔杖一挥而就,即便这根魔杖就是建立世界货币。

发展基金组织形成了这样一个集团,它们包括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组织、联合国建立的组织、各种地区委员会以及与欧洲复兴相关的组织。作为一个集团,这些机构在“万隆会议”时代处于全盛时期,从1955—1975年,其战略是在互相依存中通过现代化的自主的国家建设来实现“赶超”。当万隆时代的特征,民族资产阶级计划破碎,继而崩溃之时,这些组织也面临着危机,与此同时,资本积累体系也出现了世界性危机。

就管理的资金总量而言,世界银行把该集团中的其他成员远远抛在后面,从其建立到1992年,它所经手的资金达到2900亿美元,到今天,其每年承诺的信贷总量达到200多亿美元。此外,还必须加上现在每年由地区性发展银行支付的大约110亿美元。相比之下,整个联合国系统显得手头拮据,其1990年所承诺的资金只有600万美元。尽管联合国系统试图借助由粮农组织在1978年创立的农业发展援助基金,使自己逐步成为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但是最终还是被迫举手投降。

实际上,在1955—1975年间,联合国各机构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万隆计划承担着必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职能。拉美经委会、劳尔·普雷维什以及联合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作用不可忽视。其中普雷维什是后来最终形成的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创始者,而经济发展委员会则是使第三世界在1975年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形成的重要推动者。这些机构的动议可能对世界银行的政策没有多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们在全盛时期确实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各专门机构的工作产生过明显影响。

总之,这些日子对每个人来说都一去不复返了。发展的意识形态伴随着万隆计划一起死亡了。现在是通过结构调整方案来对边缘地区重新进行买办化的时候。世界银行把它三分之一的资源用于所说的部门调整方案,它们是七国集团和美国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战略的必要补充。而且,世界银行的历史与第三世界“发展主义”计划的扩展史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我们所知,在欧洲复兴时期,华盛顿通过控制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直接窃取了世界银行的权力。没人知道类似的事情是否也将发生在东欧。只是在后来当世界体系出现危机时,世界银行在麦克纳马拉(1968—1981年)的领导下才发展到极致。一些高质量的分析已经对世行的干预活动进行了评估,其中有全面研究、部门分析和案例研究等。世行自己从来不做这样的工作,它忽视了自我批评原则,宁愿进行自我炫耀。它偶尔发出让人震动的声明(“我们将做崭新的工作”,“根除贫困”),却从来没有继之以对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分析或者真正具有创新性的行动。然而,多亏这些克服重重困难仔细检查世行活动的批评者,我们才知道世行从没有远离华盛顿的战略决定,甚至没有脱离白宫流行的风尚。

世行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一种同私人资本(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或者存在潜在冲突的“公共组织”。相反,它已把自己视为一个代理机构,任务是支持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渗透。它所资助的工程为设备供应商开辟了巨大的市场。尽管这一领域的透明性极差,但是,众所周知,这些市场不仅对跨国公司重要,而且利润特别丰厚。世界银行运作的成本一直高于国家权力机构、跨国公司或者双边援助机构(特别是援助东方集团国家的组织),阿斯旺大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苏联援助下,它的成本远低于世行的“估算”。像这样成本超出限额的情况使提供优

惠利率的贷款失去了吸引力。

在矿业部门,世界银行的干预直接与跨国资本的干预结合在一起。世界银行为防止国有化风险提供了一种保障形式,并且通过负责基础设施(道路、通电、采矿、铁路、港口),为矿业公司提供间接补贴。在农业方面,世界银行一直集中力量破坏着农民世界的自主性,用专为此目的设计的信用形式打碎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且通过著名的“绿色革命”加速乡村世界的分化。在其他领域,世界银行为了强化第三世界在经济上的依附性整合,执行着同样重要的功能。它有系统地推动公路的使用(与铁路对抗),为石油出口打开市场,并且加深石油依附(这恶化了许多国家的贸易赤字)。它助长了为出口目的而进行的森林掠夺,不管它对生态环境损害多么严重,对国家及其未来的破坏多么惨重。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始终对工业化贡献很小——即使对于像韩国这样一些国家的工业化也是一样。虽然它现在赞美它们,但这些国家成就的取得是与其“格言”(向外资开放产业,避免补贴等)相悖的。

当然,与现在统治世界的资本的战略公开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的全球战略,从未关心(无论是在1980年前,还是1980年后)过今天所说的“贫困者”处境。它也从没有关心过环境,无论它就这一主题说过什么。它一贯支持的对公用地的全面破坏,连同对森林的砍伐,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以及牺牲大多数民众的福利为代价的。而且,当世行装出一副“非政治”的面目时,它总是表现出对跟随华盛顿最紧的政权及其盟友——蒙博托、马科斯、皮诺切特、苏哈托——的偏爱,毫不为民主问题、腐败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其干预的无效性所困扰。

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世行提供的基于“项目分析”的反意识形态,起到了对抗“计划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理论并不十

分强大。“影子价格”的使用意义极小,它们只有在存在价格控制和补贴的情况下才能影响决策,而价格控制和补贴与“影子价格”所支持的教义又是矛盾的。而且实际上,非技术劳动力的影子价格为“零”,被用作为低工资政策正名的托词,换句话说,它成了为产生贫困所作的辩护而不是消除贫困的理由。

同时,世界银行也进行着具有“学术”风格的活动。作为整体,这些活动并不值一提,因为它们的目的总是使统治资本的战略合法化。只消举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在一本写于1965年的关于象牙海岸的书中我预测,到1985年时,该国的经济体系将出现“阻塞”和外债。当然,支持在象牙海岸推行新殖民主义战略的世界银行,发觉有必要用一个成本至少高于我的研究50倍的研究加以回击。而在今天看来,它的详细研究应该会让任何人大笑不止。

这里考虑的所有“发展基金”组织以及实际上更加重要的双边援助基金,仅仅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它们虽不能忽略,但肯定数量微小——即便我们所说的只是流入第三世界的资本。这种市场可以被分成两类:投资于生产性活动(采矿业、石油、能源、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酒店、旅游以及其他服务性产业)的资本市场,以及寻求短期金融投资的流动资本市场。

美国、日本的资本以及一小部分欧洲资本从来没有忽略第一类市场,特别是在70年代全力进行资本“重新定位”的时候。然而,欧洲更乐意把财富投在其边缘上的落后地区(如意大利、西班牙等),而不是直接依附于它的地区。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这可以解释洛美协定(欧共同体与非、加、太集团的联盟)在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由于该协定支持初级产品出口(农业和矿产品),歧视工业化,所以它要为非

洲的灾难以及这块大陆随后出现的边际化和第四世界化负有重要责任。

70年代以来,流动资本市场使第一类市场相形见绌,并且对第三世界兴趣不大。尽管应该强调的是,由于金融和银行体系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东亚、东南亚以及印度正试图抵制它们),这个市场汇集了在第三世界许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这类资本的大部分徘徊在金融大都市间以寻找投资机会,几乎不去光顾第三世界金融体系。在这一领域,事情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因为有一小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重新对资本具有了吸引力。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只强调这个事实,丝毫不提“流入资本”的大部分是金融投资而非生产性投资(对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就是这样)。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了外部平衡,但其脆弱性也使我们不能把这种流动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

贸易管制者——关贸总协定为管制世界体系提供了第三种制度。关贸总协定赖以建立的原则是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推进多边(而非双边)交换,禁止制定有利于民族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同时也禁止出口方的攻击性行为(倾销),降低关税,禁止其他形式的数量限制(像配额这样的明确形式以及由缺乏依据的健康或行政管制所掩盖的不公平做法)。

关贸总协定的支持者们的论点建立在一个简单而又错误的观点上:自由贸易有利于贸易的扩大,而贸易的扩大有利于增长。历史不能证明这些看法的真实性。贸易的扩大——特别是在战后时期——是该时期强劲增长(在本质上,这一增长发端于上面提到的三位一体体系的亚体系)的结果而非原因。尽管在战后最初几年中存在着高关税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但是在这个时期贸易的增长速度非常快。随后出现的世界体系危机导致了

世界贸易的衰退：贸易增长率从 70 年代的 7% 下降到 80 年代的 4%，尽管关税降得更低并且采取了自由化措施。总的来说，真实的历史根本没有证明自由贸易与商业扩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而非相反）、增长的阶段和各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增长鼓励了自由贸易政策，而保护主义常常是对危机的反应，这样讲才是正确的。

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们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名原理中寻求支持。按照这一原理，关税使消费者受到的损失，远大于被保护的生产商获得的收益和国家税收相加的总和。他们认为，配额的影响更坏，因为它从国家手中夺走了进口关税。这种“论证”展示的当然是一个完全竞争的非真实世界，而且它所依据的分析是静态的。历史表明，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在最佳情况下通过“竞争优势”所获得的收益。历史还表明，相对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超越了供给，由使生产得以进行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这样，全球两极分化必然导致，并且表现为贸易条件呈几何级数的恶化，对边缘地区带来了损害，因为劳动报酬的分配比生产率的分配更加不平等。我甚至认为，这种两极分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所固有的现象，不仅是以往贸易（中心的制成品与边缘的初级产品进行交换）的特征，也是出口制成品的工业化边缘地区与握有“五大垄断权”的中心进行的未来贸易的特征。

第三世界政府倾向于维护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它们的理由容易理解，对那些已经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进入北方市场既是可能的（它们具有竞争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以支付其进口技术的费用等）；而对那些仍然出口初级产品的第四世界国家来说，它们一无所失而且可能还有所收益。边缘地区的买办资本家的短视特点总是推翻长远的考虑。这些长远考虑除了在

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派(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派)中找到了回应外,没有觅得任何知音。

然而,尽管第三世界政府维护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是它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它们懂得自己的实际行动可以不管关贸总协定的宣传,脱离这些原则,甚至相去甚远。

实际上,真正的自由主义提供的真实的世界性方案,体现在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在1975年以国际经济新秩序为名提出的方案中。这项方案包括下列要点:(1)为南方工业品出口开放北方市场(北方的答复是,把纺织品排除在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之外)。(2)改善热带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贸易条件(这是保护环境的一个好方法,但关贸总协定在这个主题上保持沉默)。(3)提供更好的国际融资准入机会(关贸总协定的答复是,使银行规则自由化,以使从南方向北方的资本转移更容易)。(4)为技术转让创造更规范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的答复是,以所谓的“知识产权”为名强化垄断)。据我们所知,国际经济新秩序方案或多或少地被北方一致地否定了。

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关贸总协定却运转正常。第一轮谈判会议——先是肯尼迪回合,然后是1979年结束的东京回合——几乎倾全力于逐步削减关税。在1945—1947年这一时期的初期,这些关税仍然被公认为几乎是抑制性的,欧洲的平均关税是40%(欧洲关税是公平地平均分配的),美国的关税也大致如此(美国关税参差不齐,因为它要采取差别对待,以便为受威胁部门提供半绝对的保护)。像我曾说的那样,这些“抑制性”关税并没有严重束缚贸易的扩大,它在1953年到1963年期间,以平均每年6.1%的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是4.3%)增长。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刚刚于1993年12月结束)中,西方大国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试图消弭彼此的不和。对此作出清

晰的说明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所有西方大国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第三世界抱有明显的恶意。乌拉圭回合的真正目的是遏制第三世界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力,并且加强统治中心的“五大垄断”,甚至不惜以神圣的自由主义原则为代价。在这个领域就和在其他任何时候的任何领域中一样,盛行着双重标准。下述情况就是证明:(1)关贸总协定管制的贸易仅仅是世界贸易的7%。被排除在外的重要内容是纺织品(这一在多种纤维协定下出现的“暂时”排除,现在已经存在了25年!)、农产品(包括与温带国家的油料竞争的热带油料)、矿产品等。为了对此作出补偿,关贸总协定相应地允许发展中国家彼此互相给予某些优惠——这是一种真正无足轻重的退让。(2)第三世界国家为迫使在其领土上经营的跨国公司遵守竞争规则,维持国家发展而采取的手段正在受到攻击。这些手段包括生产中的国产化的最低限度,出口的最低限度等。当跨国公司在本地市场不是寻求竞争(通过出口),而是加强其垄断地位时,关贸总协定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并帮助它们获得成功。(3)关贸总协定所致力目标不是加强竞争,相反却是加强技术垄断权的力量,当然,这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价的。对它们来说,获得进步所需的技术的可能性变得更加不确定。关贸总协定想要归于垄断范畴的“商业秘密”,也许会把我们带回到300年前的重商主义垄断行为吧?即使是用来讨论这个主题的语言也不是中立的。我们不再说知识是人类共同财产,相反当有人想利用它时,我们说他是“侵权”!有时这种政策近乎可憎,例如,关贸总协定为了保护医药行业垄断公司的巨大的利润,想要禁止第三世界生产价格低廉的药品,这些药品对第三世界人民实际上至关重要。(4)当占统治地位的媒体忙于谴责腐败的时候,关贸总协定却想要禁止第三世界国家雇用检查官员去监督控制西方出口商制定的价

格——这些价格为腐败和通过非法转移资本逃税,提供了理想机会。(5)关贸总协定在发动支持向西方银行和保险公司开放市场的攻势,其目的是加速资本从南方向北方的转移。亚洲反对这么做。但它能够坚持多久呢?

关贸总协定保护“公平竞争”的要求并未得到论证。它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屈从于跨国公司的组织。如我们所知,关贸总协定是可以想像的最含糊不清的组织,它在国际商会(最大的跨国公司的俱乐部)的阴影中秘密集会。因此,毫不奇怪,关贸总协定完全无视“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把它们仅限于其他论坛的辩论中。它同样不顾环境,以未来为代价对抗对采矿业的任何管制。关贸总协定提议的消除管制仅仅是为了把国家(而且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管理空间缩减为零,从而使跨国垄断公司受益。

与关贸总协定对抗第三世界的统一战线相比,协定内部主要的西方大国的分歧,在它们亮出其真正观点时并没有统治媒体(它们在其他问题上保持沉默)所说的那样重要。这些冲突有许多实际上是由那些分享市场或“自愿限制”出口的垄断竞争对手之间达成的“友善安排”解决的,这完全与自由主义教义相矛盾。但是;其他一些冲突则为美国提供了公开表现其傲慢自大的机会:(1)美国、欧共体以及日本关于农业补贴的冲突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欧共体国家将自己的粮食价格与世界市场的价格“脱离”开来——欧共体禁止第三世界这么做,从而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甚至成为粮食出口国。日本(和韩国)实际上也愿意通过保护其水稻种植者来维持粮食自给自足。然而,在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出现之前,美国的农业补贴早就存在很久了。(2)在那些被称为“补贴性”部门,如航空工业中发生的冲突,只注意到对民用航空的显性补贴,但却忽视了庞大的隐性补

贴,军事工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支持了美国的航空工业。(3)在技术领域,美国总是保留着基于“安全”原因保护自己的技术的权利,但它总是要求其他国家为其技术间谍敞开大门。这个领域中的抵抗注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会导致美国用 301 和超级 301 特别条款进行报复的威胁。

然而,既然关贸总协定直接代表的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那么在这些领域中的冲突就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反对国家。在大部分情况下,每一个结盟于特定利益下的国家内部也存在“观点”分歧,即使这些国家或是支持或是反对关贸总协定中冲突的各方。

全 球 化

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肯定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它毫无疑问在最近时期出现了质的进步。而且国家间这一不断加深的经济依存,发生在出现了积累危机、停滞代替了战后繁荣的历史时期。资本的主要利益已经对这种新情况作出了反应。这种反应会持续下去吗?它会使危机得到正确控制,也就是说,不增加混乱和崩溃的危险吗?这一反应会进一步深化并且为恢复增长奠定基础吗?

对布雷顿森林组织执行的政策所作的批评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密不可分。同样,关于这些政策的替代选择的建议,也不能同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认识赖以产生的总体社会和政治观念区分开。

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贸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业产出的相当部分——大约三分之一——正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它也影响着生产体系(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体系正逐渐被打破,成为统一的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影响着技术(特定的民族技术让位于普遍的世界技术),影响着金融市场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此时出现了一个同步发生的现象,已经开始进行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整合(我认为这种转变缘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东方集团国家为“万隆阵线”提供的支持,根本不能归因于“资本主义扩张逻辑”,这种逻辑改变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条件,侵蚀着中心—边缘这种两极分化的“经典”形式,开始用上面提到的“五大垄断权”替代那些行将过时的形式)。

当然,根据定义,新的全球化损害着民族国家管理经济的效率。然而,它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所以,在我看来,它产生了在资本主义下不可克服的新矛盾。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了社会和政治维度(指的是国家)是不可想像的。一直到最近时期,资本主义的扩张都是以两种空间的契合为基础的,一种是决定积累再生产的空间,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空间,即中心民族国家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空間。然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其标志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

在这些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这种逻辑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媒体号召取消国家的社会干预,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时采用的全面的反国家活动之中。这些荒谬的论点很容易被驳倒。社会服务部门的私有化不仅代价昂贵而

且没有效率；例如美国的医疗保健成本是欧洲的两倍，而且服务是低劣的。但是，它的利润却很丰厚（对美国保险公司而言）。私有化使不负责任而且透明度低的私人官僚机构，代替了会服从某种形式的民主控制的公共官僚机构。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公共部门不仅完成着本地或外国私人部门没有能力完成的开创性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用公共垄断代替私人垄断以推动金融积累以及调整收入分配等。然而，在万隆时代资产阶级的国家计划下进行的国有化，其社会内容决定了这种国有化的局限性。增加的收入首先被用于新中产阶级而不是大众阶级的壮大，而且由于客观原因（缺乏及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资源）、政治和社会原因（公共部门为寄生性私人部门的扩大提供资金的缺陷）或者政治管理的原因（发展到腐败），管理有时处于不力状态。但是从社会角度讲，私人资本主义肯定不是更好的，而且甚至不是更有效率的（研究表明，就平均而言，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公共部门的利润率，高于西方相应的私人部门）。实际上，对国家的攻击与同时出现的支持民主、透明度以及效率的言论是相悖的。不幸的是，相当多的非政府组织已经采纳了这一立场，支持和推动着反国家说教，根本没有意识到资本对这一领域的进攻。其结果对于大众阶级总是具有灾难性的。

几乎很少有人强调私有化在控制危机时所扮演的有趣角色，这就是为危机的特征——为过量资本提供出路。我认为这是进行私有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代价是什么呢？资本对生产体系的发展毫无贡献（而且无法减少失业）。资本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的收益加深了国内收入的不平等，国家随后用干预去减轻全球化带来的此类消极后果。

因此，把世界体系的管理归结为对世界市场的管制，完全是

乌托邦式的。考斯塔斯·涅格波罗斯早就指出,民族团结虽然具有压迫性,但仍未被世界团结所取代,后者仍旧是虚无缥缈的。这毫不奇怪,因为这种团结要求有一个世界国家,至少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和民族国家在其本土范围内的效力一样大的政治体系。国际经济组织没有填补这种空白。像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它们仅仅是资本管理市场的工具。现在贬值了的联合国的前进方向并不是建设一个世界政治体系;相反,它正失去在这个领域中的根基。涅格波罗斯认识到这个缺憾,对“全球化”现实发表了几个合理的保留性意见。他认为,尽管出现了市场全球化,但国家宏观经济结构仍然是高度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公司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国家单位间的竞争。他写到:“全球化的公司确实存在,但是国家经济体系还没有全球化。”在这种状况下,全球化增加了分歧和不和谐。所以它仍然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世界体系在这些条件下会走向分裂或者演化为我们下面将看到的竞争区域化。

全球化是在停滞的背景下发展的。它是这种停滞的原因吗?我的答案是辩证的而且是有区别性的:停滞不是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要为作为战后增长基础的三个亚体系(西方的民族福利国家,第三世界的万隆民族资产阶级计划,东方集团的苏维埃主义)的被削弱负责。进一步讲,居统治地位的资本控制危机的政策加重了停滞并且使之长久化。

停滞(到现在已经作为世界体系的标志存在了35年!)自然产生了在生产性投资中找不到出路的巨大剩余资本。在这些情况下,统治资本对现状的反应完全合乎逻辑,即,优先控制庞大的流动资本。这种控制要求世界金融的最大限度的开放和高利率。同时,世界体系允许美国吸收大量流动资本来弥补赤字,以维持其不断削弱的地位;这是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唯一途径(用拖

欠以及维持极高水平的军费开支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另一方面,世界体系毫无疑问具有以下缺陷;(1)它甚至无法提供主要货币(美元、日元、马克以及作为次要考虑的英镑和法郎)间的汇率稳定,这扭曲了国际竞争的规则。(2)它导致了世界范围停滞的不断加剧,使失业成为西方社会的持久特征。(3)它阻碍了许多边缘地区寻求发展的可能。至于第一个缺陷,主要决策中心(特别是七国集团)正在寻找纠正它或适应它的方法。然而,危机控制政策导致的、在另外两点中体现出来的停滞和破坏并没有成为经济资本真正关心的目标。失业是没有工作者的问题,不是资本家的问题。而且如果需要用失业维持资本利润率,那就让失业长久存在吧!边缘的发展也不是资本的战略目标。这些战略涉及的是适应——在最自由的意义上也就是从中获利——边缘地区的增长或停滞。而且,既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那么统治资本就在管理第三世界债务中找到了利润。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它不符合资本的利益。

我们现在可以评价一下在危机前所采取的战略。从1945年开始,当时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福利国家不仅得到布雷顿森林组织(那时它们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的支持,还得到国家、也就是西方列强的政治体系的全面支持。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之光最终照亮了它的黑暗呢?还是因为统治资本已经转而相信社会领域的效用了呢?根本不是。只是因为当时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西方的政治霸权集团必须迎接挑战。而且它们确实这样做了。同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不是因西方精英转向反殖民主义而产生的,它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带来的,解放运动从东方集团国家的支持那里获益匪浅。苏维埃主义的解体(我们的三位一体体系的最后组成部分),改变了西方和第三

世界的社会关系,使之有利于统治资本。资本迅速恢复了其本来面目,抓住机会破坏西方的工人运动(通过失业)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通过破坏“发展”及进行重新买办化)。为失业和“贫困”悲天悯人的话语——好像这些现象不是它们的政策后果似的——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国际经济组织对这种状况不负直接和主要的责任。它们仅仅是些工具。昨天,它们被建立起来以服务于战后欧洲和日本的繁荣(通过采取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复兴计划进行全面行动以保证汇率稳定),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通过使它转向右翼,后者使其更快地力竭而衰)。今天,它们准备服务于为控制危机而采用的管理体系。

银行的国际化在我提出的危机控制分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正通过扩展其全球性金融活动,以牺牲银行为代价扩大着自己的自主性。但是,浮动汇率和自由资本的大量持续增长,给银行提供了参与有效金融投机以控制危机的机会。同时,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的国际化,使得南方的储蓄任由北方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吸收殆尽。当然,所有这些都可能会被视为令人厌恶的事情,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再度断定,私人资本不能代替并取消中央银行的作用,这些功能必须是公共的。然而这些行为无论多么让人厌恶,并不荒谬。

现在我们已经伴着浮动汇率生活了20多年。这种经历完全推翻了被用来论证使浮动汇率合法化的新古典“理论”言词。经验表明不存在汇率“自然”均衡。汇率决定了结构调整,这种结构调整几乎总是不对称的,它们要么有效,要么无效。据称资本流动是自然而然的,它抵消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并主要由大量生产投资的流动所构成,然而这种资本流动只存在于大学教授的想像之中。相反,投机性资本——占资本的大多数——使

汇率变化无常,使汇率丧失了所有合理性。这种变化无常不仅导致了严重的宏观经济混乱(币值高估破坏了生产基础,币值低估形成了不能长期持续的出口行为的寄生性发展),而且会使微观经济长期处于无效率状态。当美元在一两个月内每次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出现翻番或减半变化时,除了投机之外,在这种基础上能做什么样的经济核算呢?面对由汇率波动所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化,关税的作用又会有多大?

然而,由于浮动汇率使“清偿需要”出现了巨大增长,这样就为危机产生的闲散资本提供了出路。在新古典“理论”看来,浮动汇率使中央银行摆脱了不得不对准备金进行管理的问题,无论这种准备金是以哪种国际标准出现。这一理论忘记了汇率的变化无常带来的不安全感,会迫使外汇市场上的所有经营者建立相当数量的私人准备金以应付难以预料的波动。结果,必须用收入所得去支付准备金清偿——因此也就是必须用高利率来应付准备金清偿。

同样,浮动利率也要为长期存在的停滞承担部分责任。国际收支平衡永远都会受到投机性资本流动的威胁。对于这种平衡的担忧,使得赋予通货膨胀政策和出口以全面优先权的逻辑在政策选择上居于支配地位,即使这必然要求紧缩国内需求。结果出现了不正当的竞争和普遍的通货膨胀紧缩主义恶性循环。七国集团多次试图给美元、日元和马克的汇率建立某种秩序,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只能说它不是非常成功。

然而,汇率的相对稳定在欧洲共同体内已经实现。因为欧共体内部的结构互补,使生产要素的回报可能达到某种和谐,生产性投资(从欧洲中心到欧洲边缘)又加强了这种和谐。欧共体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安全和团结的地区,因此它使其成员在双边关系中得到一定的货币稳定感。然而,这种稳定是

脆弱的,这恰恰是因为同样的体系不能扩展到作为整体的欧洲、美国和日本。一种在这一层面上并未由于集团的团结而受到遏制的商业利益冲突,威胁着欧洲的伙伴们,但这种威胁因伙伴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欧洲只能通过加强闭关自守来应付这种挑战。由于各“强”国(如德国)必然比其他成员更喜好开放,所以各国对待上述选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在被用来控制危机的体系中,美国仍然可以不必为其赤字担忧。其赤字之大足以吸纳其他发达地区所有的剩余(1980—1989年的10年间,美国赤字是9310亿美元,而日本的剩余是5330亿美元,德国是3960亿美元,东亚四小龙是1030亿美元),而且它已经吸干国际市场上的资本,这些资本本来可以提供给世界其他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霸权无疑可以被描绘为“虚假的霸权”。在19世纪拥有霸权的大英帝国曾经拥有结构性剩余,即在1810年到1914年间,其总资本构成的50%投向了海外,这就为其他国家的结构性调整提供了条件。今天,美国的情况则根本不是这样;相反,它的赤字使其不可能进行结构调整。

因此,世界体系只满足于最弱的参与者(第三世界)进行单方面的结构调整,并以牺牲它们的发展为代价。同时,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系列措施的一部分,有计划低估的汇率被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终于发现了这个明显事实(它证明关于市场会揭示“价格真理”的说教并不成立)之后,上调了对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根据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虚拟汇率重新计算其国民生产总值。这些措施完全是象征性的,甚至是具有蛊惑性的,因为决策的依据不是这些虚拟汇率,而是真实汇率,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无意修正它们。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情况变得越来越多——强制进行的金融调

整导致了“美元化”。美元不仅成了准备金工具,甚至成了计量单位和交换媒介,本国货币让位于美元,进口资金靠从国外借贷美元。现在整个循环完成了,危机控制体系已经成功地寻求投资的流动资本提供了新出路。

就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而言,它们已经建立了七国集团以协调危机控制。我们早就提到,七国集团实际上在汇率稳定化方面成效有限。作为危机的控制者,七国集团像古斯塔夫·马赛亚写到的那样,是“一个没有完整的世界计划的世界执行官”。它只满足于在1976年设立边缘地区单边调整原则,在1980年为了有利于投机性金融活动,使石油美元进入再循环,然后鼓励降低原材料价格(这是海湾战争的重要起因),在1982年重新安排债务(但没有创造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在1992年把俄国和东欧国家纳入单边调整战略中。

所以,这些国际组织实行的战略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危机,而不是找到解决危机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债务的存在都完全是功能性的,而且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讲,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抑制生产力的。这就是为什么采取的所有措施——有时有些措施被蛊惑性地宣传为“解决方案”——只会使情况更糟的原因。世界债务从1982年的9000亿美元增长到15000亿美元,其中一半用在利息上。

这种控制方法是否会强大到足以持续下去?我认为,这是问题的真正所在。那种认为由于它不能提供走出停滞的光明之路而不能持久存在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些措施的目标不是走出危机而是控制危机。如果我们仅限于对经济和金融机制进行分析,那就会说这种控制实际上是在“成功”地运作着,它维持了世界的停滞状态。对于边缘地区的国家,这种停滞导致了严重的倒退,非洲的第四世界化只不过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

危机控制追求的是鼓励各中心国家出口(这加剧了这些国家间的贸易冲突),剥夺了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同样活动的可能(通过停止寻找工业新产地以减轻中心地区的失业增长)。这里再次提醒读者注意一下 1919 年建立起的凡尔赛秩序:让德国赔款,但不让它出口商品!在瓦尔特·罗素·米德所研究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类比中,警察力量忙于穷追第三世界衰退所造成的新移民。最后,危机控制是一种会加剧发达国家间冲突(不仅存在于美国、日本和欧共体之间,甚至存在于欧共体内部,威胁着它的存在)的战略,它使得发达国家以为,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中除了武力(和战争)外别无选择。出于这一原因,维持美国的(军事)霸权是不可或缺的,它迫使欧洲和日本这些伙伴在美国的要求面前作出让步,因而也就把它们之间的冲突带回到欧共体内部。这些冲突的动力促成的“地区化”,会近乎自发地(因为它们是以充分的选择为基础的)成为世界体系摆脱无法实现的全球化的自然“出路”吗?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指向这一方向的路标:在北美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墨西哥一分为二,北方是“德克萨斯”,南方是“危地马拉”,正如刚刚进行的恰帕斯州革命所表明的那样,它使得到墨西哥买办资产阶级支持的华盛顿计划变得更加脆弱);欧共体内部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而且这种内部贸易在不断增长,从 1985 年以来,共同体的对外出口一直在不断减少(但这会持续下去吗?);东亚国家(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它们甚至没有任何正规的共同组织——的内部贸易,占这一地区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但是美国正在施加强大的压力以打破这种互补性,这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追求贸易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而且克林顿在西雅图所倡导的“亚太地区”事业也是同样意图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控制危机的体系不能长久存在,那么这不是因为该体系所执行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具有“荒谬性”,而是因为它不能避免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加剧。在这里,我们重新回到了我所为之辩护的主题:通过“市场”进行管理的观点是乌托邦式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管理需要“市场加国家”,全球化的经济空间与政治、社会管理的四分五裂的空间之间的冲突是无法忍受的,它必然导致民族主义和社会冲突的复兴,这会对人们在危机期间所追求的乌托邦式的全球化构成挑战。

但是,这种挑战是带来更加明显的全面衰退,还是一个经济全面增长的新时期?我相信,对现存世界体系的替代选择方案的讨论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

我们不可能对近几年提出的改革布雷顿森林组织的所有建议进行评论。它们的数量太多了,而且来自不同的理论和政治视角。所以,我将把自己的评论限于一小部分出自坚定的进步观念的建议——也就是说,它们的目标的出发点是整个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的复兴;它们赋予这种发展一种大众内容(取消贫困、扩大社会服务、减少不平等);而且它们同意重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统一(这尤其意味着,允许民主在人民之中扎根)。

无疑,我对这些建议极为同情,不仅是因为有一种总体精神贯穿着它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而且,在许多时候,是出于对这

些建议在地方、民族和全球这三个必要的行动层次上所提出的改革细节的考虑。这些建议提出：支持观念上的转变并在基层建立起负责的组织；使基层人民成为具有经济主动性的真正行为者，从而在经济领域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纽带；把他们从资本主义——通过将工人降低为劳动力、公民降低为消费者——附加在他们身上的身份地位中解放出来；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更好的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从这个观点出发所进行的斗争必须在国家、地区以及世界这三个层次上获得充分的政策支持。我认为，关键性联系在于国家层次，原因很简单，我们仍将在很长的时期里继续面对一种政治组织的存在。就这一层面而言，我所说的“脱离”——指的不是闭关自守，是外部关系要服从内部发展的逻辑，而不是相反——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界定其确切轮廓是必要的，而且这只能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进行。因此，这是一件需要“强迫”世界体系去适应的事情：不仅要在停滞中注入“调整”的观念，而且要用双边调整概念代替单边调整概念（最弱者适应最强者的调整）。要使弱小国家的政策发挥充分的效力，它们反过来不仅要求重建边缘国家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特别是通过建立地区同盟），而且，极有可能要求改变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

在我们所处的本世纪最后一个时期里，我们并不缺乏思想。最激进的建议呼唤在世界范围内重归凯恩斯主义——重新分配收入以利于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工人（如瓦尔特·米德所说，这是巨大的经济刺激）。按照他们的主张，这些建议意味着要对国际经济组织进行重大改革：（1）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成为一个拥有真实货币（类似于特别提款权）发行权的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这种真实货币会替代美元本位，保证汇率一定程度的稳定，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增长中调整”所需的清

偿能力(这些建议类似于联合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在 20 多年前提出的,在国际货币保障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之间建立“纽带”的提议)。(2)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收集剩余资金(从日本、德国这样一些国家),不是向美国,而是向第三世界放款。这种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增长的活动同时会迫使美国减少其赤字。在现在的情况下人们期望,美国不要通过执行进攻性新保护主义的政策来减少其赤字。但是它不那么做,又能做什么呢?(3)创建一种真正的国际贸易组织(ITO)。总的来说,在这方面,关贸总协定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不存在疑问。国际贸易组织甚至可以比关贸总协定更加勇敢些,后者总是被迫在妥协间徘徊。而且,国际贸易组织会成功地执行充分的多边主义,以使发展中国家将从北方市场的真正开放中获益,同时作为对应,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服务领域作出让步。在这方面,欧共体的经验经常被提到,欧共体实际上已经成功地使跨欧洲的贸易实现了自由化和多边化,同时排除了不受约束的竞争(通过实行尊重环境的标准,社会保护等)。也有人主张,国际贸易组织应阻止区域性单位(欧共体、北美自由区等)变成对内保护,对外进攻的“堡垒”,以减少区域性单位建立带来的消极影响。国际贸易组织还有其他一些目标,诸如稳定(或重估)原材料的价格。(4)对环境问题的考虑会成为世界银行贷款制度的本质特征。有人把这种观点推得更远,如建立世界性的能源税,非再生资源税等,这会增加可供世行(或者取代其位置的基金)使用的资源,使之能够补贴贫困国家保护环境的活动。(5)经济组织的改革会伴随着联合国政治作用的提高。这样,用我们所描述的手段获得的生机勃勃的发展,并使这种发展成为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进步的基础的计划,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虔诚的愿望。在这种框架中,多边化了的发展援助不仅以尊重个人权利和政治民主为

条件,而且支持进步的社会政策(保证工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实行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等)。同样,以上述方面协调进行的全球发展,其民族的政治维度会让人们尊重合法利益。例如,商品自给(瓦尔特·米德曾研究过日本保护其大米生产商的案例)会被接受下来,但它的影响会被抵消,从保护主义措施中受益的国家要向世界共同体纳“税”。而税由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借贷机构世界发展基金征收。

我认为,对于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改革来说,这是一项非常好的事业。它源于一个使我震惊的不容置疑的核心观点——只有通过在全球层面(有利于边缘地区)和社会层面(在中心和边缘地区有利于工人和大众阶级)实现收入再分配,才能使发展获得生机,而且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必须服从于瓦尔特·米德所说的“需方贸易”的逻辑。

然而必须承认,这样的改革是与统治资本的利益相冲突的,因为收入再分配在短期内会减少边际利润。尽管从长期来看,它产生的结果远不只是经济复苏,它还带来真正的新增长时期,从而为具有赢利性的生产性投资开辟道路。但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是建立在短期目标而不是长远需求之上的,短期目标支配了资本的决策,而长远需求在必要时则必须由国家干预来强制实行。我早已说过,正是对“共产主义”和边缘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激化的恐惧,导致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和战后时期对发展的支持。

因此,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重新发现下列事实,即另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名字就叫作社会主义。它不仅具有客观必要性而且必须是世界范围的。它给我留下的清晰印象是,实施这项事业要求在世界每个地方都实现深层的政治转变,用建立在劳工和大众阶级统治基础上的不同的社会联盟,替代现存

的社会霸权联盟(其基础是南方以及现在的东方边缘地区的买办资本主义的统治)。这是唯一的出路,通过它才能建立起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统治,以及对长期需求(环境)的关注。同时,这项事业要求有一种与现行的秩序不同的世界政治秩序。这种秩序的基础是,所有社会的民主化以及把相互依存与互相尊重彼此的差异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是必要而且可能的。但我只是审慎地使用“进步”一词,因为实现整个事业是一项长期工作,从全球化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为了“最终”目标而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为前进中的每一步制定战略。

因此,这一事业应该成为建设性批评的目标。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以下几点:(1)许多以改革主义为立论基础的分析,过于倾向把价值判断(现在的体系是“坏的”)和对统治权力决策动因的解释混淆起来。像我曾说过的那样,已经实行了的“危机控制体系”并不荒谬,它遵循着统治利益的逻辑。与斯威齐和马格多夫一样,我相信今天进行的全球化虽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类的力量,但它完成了资本的目标。(2)我不相信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成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发展基金,应该成为向世界社会主义的长期转变过程中在最近的将来就要实现的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前,有必要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建立一个多中心世界;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论述过这种多中心世界的某些指导性原则。如果认为我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那就是在臆测基本的政治问题已被解决,即经济全球化与政治空间分裂化之间的矛盾已经被克服了。但这一切只能在漫长的过渡期的终点才会出现;它不能成为进行改革的前提条件。我担心把横杆设得太高,会导致自己失败,这样做,有增加失望和沮丧的危险

(“别无选择”——当然别无选择,只能服从统治资本的逻辑)。(3)由于全球化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界定(它是一种决定性客观力量,还是众多趋势之一?),所以上面列出的改革事业的某些要素令我怀疑。例如,我不相信自由贸易具有美德(或者以此为理由要求边缘地区作出让步)。

所以,我提出的行动优先性不同于我们所讨论的社会主义事业所包含的优先性。我强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1)建立第三世界的地区性组织以面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五大垄断权”,从而能够从正在进行中的全球两极分化的角度限制它们的消极影响。(2)使欧洲左派获得复兴;使欧洲建设重现生机,给欧洲建设注入具有进步性的社会内容,这种社会内容表明这一地区朝着“劳工支配权”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使东欧和前苏联也加入到这项建设中。(3)检讨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金融和商业关系,使之朝着允许汇率获得相对稳定并强迫美国放弃其结构性赤字的方向发展;并从这种角度重建贸易关系。(4)重建联合国体系,目的是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把世界主要地区间的商业和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建立起来;首先要做的是创建以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为目标的有组织的世界税收体系;等等。(5)依照地区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即使之转变为世界银行。

总之,我再说一遍,这项事业的现实性基于对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承认历史“规律”先于历史本身的观点。那些表面上看像是“客观力量”(如全球化)的东西,仅仅是一种既定体系(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的特有逻辑的产物,是与反对其实现的力量和社会利益相矛盾的形式。依靠这些矛盾冲突产生了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亚体系结构这一真正结果,其方式要取决于

权力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结局,因此,这是一种按照自己的规律不停演变的结构。而创造一种避免野蛮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战略所关注的就是,找到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前进之路。

(杨雪冬 译 王列 校)

走向全球的开放社会*

乔治·索罗斯

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时代。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思想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流动包括直接投资和金融交易。战后以来,这两种资本自由流动都变得日益重要,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近年来发展得尤其迅速。汇率、利率和股市价格的变动,在许多国家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方面,金融市场的所有特性,40年来已经被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经济的全球整合带来的巨大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劳动分工带来了效益,这一点已被比较优势理论充分证明了;规模经

* 作者乔治·索罗斯是国际著名的金融家和慈善家。他的文章《资本主义的威胁》是《大西洋月刊》1997年2月号的封面文章,曾引起广泛的注意。本文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1998年1月号(第281卷第1期)第20—32页。

济和各种创新在世界各地的迅速传播,带来了动态效益,它也被静态均衡理论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非经济效益,如伴随货物、资本和人员国际流动而来的自由选择,伴随思想观念的国际流动而来的思想自由等。

但是,全球资本主义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果我们想使这一制度得以持久生存的话,我们就必须对这些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关注这一点,并非像某些阅读我1997年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资本主义的威胁》的人所想像的那样,意味着我要贬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我深信,要维持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效益,就必须努力对这一体系的不足进行深思熟虑的和持久的修正和抑制。为此,我与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斗争,它们假定政府和管理者不干预具有自我纠正机制的市场,认为自由市场具有自律性,一旦市场过度膨胀,它就会自我纠正。

全球资本主义有五个方面的不足:收益的不均衡分配;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全球垄断和卖主寡头垄断出现危险苗头;国家职能的含糊不清;社会团结和价值观念上出了问题。这些范围的划分无疑具有几分随意性,但是各个问题领域本身却是互相连接的。

(1)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收益出现了分配不均衡。一般来说,资本比劳工更有优势,因为资本更灵活。金融资本又比产业资本具有优势,一旦工厂建立了,你就很难把它搬走。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够灵活地改变价格,但它们所具有的灵活性远远比不上国际证券投资者,后者具有更大的自由选择。除此之外,位于全球经济中心比在边缘更有优势。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把资本引向金融中心,金融市场因此规模日益扩大,重要性日益增强。

(2)金融市场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国际金融市场就更是如

此。国际资本因它们大起大落的行为方式而臭名昭著。在繁荣时,资本从中心流到边缘;一旦信心动摇,它就会被抽回源头。我见过不知多少兴衰沉浮,而且我也充分地认识到,国际资本市场已经具有了几分制度特性,其弹性变得更大了,但是,在历史证明我错了之前,我还是认为当前的繁荣将被衰退取代。

我们对金融市场运转方式的理论认识有着根本性的缺陷,这更使得崩溃的危险大大增加了。经济理论一直建立在使人误入歧途的均衡概念之上。在我看来,均衡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市场参与者都在预期未来,而未来本身则是由市场预期形成的。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超过了价值达到了某一程度,就表明该公司股东的预期超过了现实。这就会使得结果变得不可预期,实际的发展过程与普遍的预期相符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如果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话,他们将会发现,他们追逐射击的是一块流动的靶子,而不是在预期未来的均衡。理性预期理论曾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市场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准确地预期未来。这一假设可能会产生一种假想的均衡,但它与实际的市场行为并没有什么相干,无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管理者,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过这一理论,而这正因为他们是有理性的。我知道,经济理论界已经作了很多努力,来接受和研究不均衡状态。然而,那种认为一切都应交给市场的自由放任思想仍然有着巨大影响。我认为,这一观念是危险的。金融市场的稳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动荡。

问题应该这样提出,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无法抽象地回答这一问题,因为每一种情形都是不同的。最好把金融市场视为一个历史过程,而历史是极少重演的。近来的亚洲市场混乱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它们涉及到货币标准、泡沫资产、银行监管不足和不容忽视的金融

信息的匮乏。我们不能听任市场自己去纠正错误,因为市场有可能作出过度和不加区别的反应。

(3)然而,不仅仅是金融体系会出现不稳定。市场竞争者的目标是在市场中获胜,而不是去维护市场中的竞争。谋求获得垄断地位和卖主寡头垄断地位的自然趋向需要用规则来加以约束。对全球化进程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管制还没有成为重大议程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现在做还是及时的。

(4)那么,谁来做这项工作,去制止权力的过度集中,去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说到这一问题,自然会提到国家的作用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国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它要维护经济稳定,要努力确保机会平等,要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在欧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这种作用尤为明显。但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使得国家满足公民福利要求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为全球化使得资本能够更容易地逃税,而劳工则不能。资本往往避开那些税率高和实行就业保障的国家,从而使得那里的失业率上升。欧洲大陆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不是想为欧洲过时了的社会保障体系辩护,它的确需要改造。但欧美社会保障的减少的确令人担忧。

这是一个新现象,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直到现在,工业化国家中,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整体上仍然在增加。从二战后算起,它已经翻了两番。虽然它的最高值出现在80年代,但到目前为止,它减少得并不明显。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开始了减少国家作用的运动,结果是对资本的税收减低了,而对劳工的税收则一直在增加。全球化一方面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一方面又减低了它这样做的能力。这就播下了社会冲突的种子。如果社会服务减少得太快,而不稳定性又增加得太

快,大众的不满情绪就会导致欧美出现保护主义的新浪潮。这可能会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就像本世纪30年代一样。随着国家的衰退,对国际合作需求日益增大。而这种合作既与自由放任的流行观念相悖,又与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相冲突。

在经济发展中,国家还起过这样的作用。在那些本地资本不足的地方,国家使自已与本地的工商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一战略在日本、韩国和现在受伤了的东南亚小虎国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显然,对资本的快速积累来说,专制政权比民主体制更有利;繁荣的国家比贫穷国家更容易建立民主制度。因此,我们有理由设想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即,从专制和资本积累到繁荣和民主。但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是非常不确定的,那些掌权的人不会轻易放权。

专制政权限制了言论自由,纵容腐败孳生,这削弱了自己并最终导致垮台。每当它们不能维持繁荣时,这一真理就会得到验证。不幸的是,经济动荡和衰退对建设民主制度也没有益处。从这个角度看,东亚国家的政治前景往最好处说也是不明朗的。

(5)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极为含糊不清的问题领域,就是价值观念和社会团结的问题。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以维系社会的存在。市场价值观念本身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它展现的只是市场参与者在自由交换中的愿望。市场把一切东西,包括人类和自然在内,都降低为商品。可以有市场经济,但是不能有市场社会。除去市场外,社会还需要有一些制度去满足这样一些社会目标,如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在每个国家内部都存在着这种制度,但在国际社会中却没有。全球社会的发展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不把这一鸿沟填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无法继续存在。我所说的全球社会,

并不是指全球国家,国家即使在民族层次上也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新的方案来解决新的问题。应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已不是第一次了,在本世纪之初,类似的情况就出现过。那时的全球资本主义是由帝国列强组成的。它最终毁于列强之间的战争。现在,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要想得以生存,就必须满足其参与者的需要。

全球社会包含了各种不同的习俗、传统和宗教,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将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呢?我认为,应将开放社会概念作为普遍准则,它在承认全球社会固有的多样性的同时,提供了建立我们所需的制度的观念基础。我知道,要想使这种普遍准则获得承认是一种苛求,但没有它,我们就将一事无成。

开放社会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涵盖了民主的积极因素:与社会正义相匹配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它的特性是:法治;尊重人权、少数人和少数人的意见;分权;市场经济。开放社会的原则在《独立宣言》中得到了极好的表述,《独立宣言》认为真理是不言自明的,而开放社会的准则却并非如此,它需要令人信服的论证。

卡尔·波普尔为开放社会提供了有利的认识论依据。他认为,人类的理解力永远都是不完整的,终极真理和对社会的完善设计超过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退而求其次,即一种并不完善但容许改进的社会组织方式。开放社会就是如此。全球经济使得变化不断,变化越多开放的概念就越重要。

但是,开放社会的思想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甚至遭到了明确反对。有人说亚洲的价值观是与众不同的,的确它们是有特色的,全球社会本身就是多样化的。但是,人都难免有错,一旦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为开放社会找到了共同基础。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人会出错的天性与某种程度的利他主义、某种程度的互惠结合起来。开放社会并不排斥多样性,它有助于多样

性。

西方民主并不是开放社会所可能采取的惟一形式。实际上,开放社会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这也正是开放社会观念的力量和弱点之所在。开放社会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它需要特定的内容。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必须决定自己的特定内容是什么。作为一个概念框架,开放社会比任何计划蓝图都要好,比完全竞争概念也要好。完全竞争概念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了市场参与者能力范围的知识,它描述的是一种理想世界,与现实没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市场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也并不趋于均衡。它们是在政治设计的背景下运转的,并且以一种反省的方式进化。

开放社会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框架,它承认市场机制的优点,但又不将其理想化,它也承认社会中非市场价值的作用。与此同时,开放社会还是一个非常模糊不确定的概念。它无法界定经济、政治、社会和其他领域之间的分离或整合关系。对于如何划分竞争和合作的界限也会有许多不同意见。卡尔·波普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两位开放社会的拥护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分道扬镳的。

下面我要谈谈,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全球开放社会所需要的特定内容是什么。目前的全球经济有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中心和边缘的不对称以及难以向资本征税等。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些国际组织在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必须得到加强,而且,或许还应该建立些新的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已经对国际银行体系提出了充足资本金的要求,但这并没有制止住东南亚银行危机的发生。目前,金融市场上还没有国际监管权威,在对资本征税上也缺乏充分的国际合作。

但是,真正的不足是在经济领域之外。国家不再执行它们以前的职能了。这在许多方面是好事,但某些国家职能还是需要有人去行使。我们目前还没有适当的机构来保护个人自由、人权以及环境,没有适当的机构来促进社会正义,更不用说去保卫和平了。我们所拥有的组织只是一些国家联盟,而国家常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共同利益之上。联合国本质上无法实现它在宪章前言里所提出的承诺。

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行为准则来约束腐败,实施公平的劳动规则,保护人权。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考虑这么做。至于安全与和平,世界的各自由民主国家应该起榜样作用,并形成一个全球联盟网络,以便与联合国一道工作,或者在没有联合国的情况下工作。北约就是一个例子。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平,但是预防危机的发生可以未雨绸缪。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因此,在这些国家推进民主和自由也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例如,一个民主的和繁荣的俄罗斯将会对地区和平作出更大贡献,它比北约的军事开支作用要大。干预别国的内部事务是危险的和艰难的,但是,不去干预有时甚至会更危险。

目前,全球资本主义正在迅猛地向世界各地扩张,它带来的利益极为诱人,与此同时,它还严厉地惩罚了那些试图躲避这一全球体系的国家。这种情况不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但是一旦它们出现了,我们也就获得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为全球开放社会做些基础工作。全球资本主义要想生存下去,它就必须不断地纠正自己的弊病,这就需要有一个全球的开放社会,只有它才能不断地改善自身。

(王列 译)

得不偿失的胜利：关于盎格鲁—撒克逊

式资本主义未来的问答*

[法]罗伯特·保尔

问：苏联已经垮台，干预主义的国家正在全面退却，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胜利了吗？

答：如果说，在30年代不稳定的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干预和调节的话，那么现在似乎盛行着相反的观点：市场的内在稳定受到了国家干预的威胁，所以要结束或者至少是大幅度削减国家的干预。为了克服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不稳定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与自主而无效率（从长远来看）的苏联模式之间找到了第三条道路。相比之下，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从这种探索发展出来的大部分经济体制失去了稳定。

1983年后，法国意志论式的国家主义的失败衬托出了国际化的效应和遵奉市场观念的力量。让最出色的专家都吃惊的是，伴随而来的是苏联式体制的完结，这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优

* 罗伯特·保尔执教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本文选自《第十一条纲领》1998年5月号。

越性的证据。只关注经济改革无力克服长期存在的经济困难，可能有些过于小心谨慎。经过数年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尝试之后，问题犹在。而长期以来似乎有能力把经济动力、社会正义和完全就业协调起来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80年代末也经历了一场大危机。前所未有的衰退的结果是，失业率从1989年的1.6%上升到1996年的12.5%，社会中弥漫着对该模式基本规则效力的怀疑空气。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曾经在80年代中期打动甚至震惊过美国经理们的日本资本主义现在似乎处于半停滞状态。即使在日本国内，推崇美国模式，呼吁结束日本例外论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相比之下，美国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步入了凤凰涅槃期，它重新获得了发展动力和威望，作为一个可资效法的模式同时吸引着政治家和经理人员。克林顿总统被认为重新恢复了美国世纪，并且确保了美国经济的复苏；比尔·盖茨的明星般崛起象征着美国的创新能力，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好莱坞电影的普及似乎印证了一种新的美国生活方式的胜利。

问：所有这些表明了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优于其他的模式吗？

答：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这些。不应该因为选择其他模式存在实际困难而忽视美国社会的不平衡和内部紧张关系。有一个事实是确凿无误的：美国经济现在处于扩张的第七年（从1992年以来），与欧洲的缓慢增长（年平均为1.4%）和日本的停滞（年平均为0.8%）相比，其年平均增长率为3%。这种有利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美元汇率的娴熟管理以及日本的过度储蓄，这些条件使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可以靠信用生活。但是总有一天这一切会有报应的，将以增长的减弱或者通货膨胀的再现（现在这种可能被金融市场的警觉压制着）的形式出

现。

然而,我们不应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目前增长所需的手段与战后福特主义截然相反。在1947—1973年间,美国家庭真实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令人艳羨的2.8%,但在1973—1992年间,其增长几乎是停滞的,年增长率只有0.1%。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美国梦随着时代的更替消逝了。这是生产率停滞的结果。确实,某些企业取得了出色的业绩,但是可以完全代替福特主义的制度没有出现。如果消费提高了,那是因为有利可图的信用,更长的工作时间,每个家庭有更多的收入来源,以及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数量的不断增长。

同时,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在1973年前,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增长比最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但从那以后,不平等变得愈加显著。在1973—1992年间,占美国家庭20%的上层的平均收入增长了20%,而占20%的下层眼看着自己的收入减少了12%。几乎所有可以得到的事实都说明1973年以来,不论是收入方面还是财产方面,不平等都在不断扩大。例如,在1983—1992年间,20%的上层占有了增加的财富的98.8%。最上层的1%占有了61.6%的增加了的财富,这难道不是美国社会的长期活力面临的问题吗?

贫困已经成了一个难以消除的痼疾,不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它现在影响到低技术和无技术工人组成的广大阶层。由于工会和集体谈判力量的衰落,最低层次的技术工人不再奢望工资能够达到60年代的水平。相反,美国的竞争力完全依靠“数据分析人员”——如果我们相信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话。多媒体程序员、金融家和文化人生活在一个与其他阶层越来越隔绝的社会领域里。他们是在国际间流动的,具有影响政治决策的能力,而且占了税收制度的便宜。由于少数民族对政

治过程的参与非常有限，所以不可能组织有利于技术最低阶层的转移收入或集体投资（在教育、培训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形象的胜利是在它无法提高效率或推动社会进步的时候出现的。而且，正在出现的种族经济分离（一些评论家已经谈到了美国的“巴西化”），会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模式吗？

问：但是，尽管这个体制也麻烦不断，它被到处采纳难道不是事实吗？

答：我们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确实，某些标有“美国制造”字样的商品（如饮料、快餐、音乐、电影及计算机程序）扩散到全世界。更重要的是，观念、理论、管理方法，甚至政治、经济及金融活动的规范框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并不意味着世界范围的经济整合（全球化 mondialization，这个词似乎比全球化更好），必然会引导着不同的国家汇集到通往自由市场的大道上。实际上，国与国之间在大部分的核心制度上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即使是邻国）。这些制度包括：资本配置，产业关系，团结和社会安全网，以及国家的角色和国际整合的形式。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只是共存的四种结构中的一种。

市场资本主义不仅流行于美国，而且盛行于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程度稍微低一些）。在那些地方，市场机制调节着绝大部分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创新的动因来自于个人在严格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获得的收益。教育的完成由对人力资本收益的计算决定，信用的配置在高度复杂的金融市场中进行，立法要努力维持所有产品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政治纲领和职业也服从竞争法则，突出强调限制国家权力，结果是社会安全网较弱，财政再分配非常有限。悲痛留给了失败者，权力和荣誉

留给媒体、金融、高技术、生物或医药界中成功的企业家。撒切尔夫人后的英国仍然沿着这条路在走,因为社会不平等变得更加向两个极端发展。这就是为经济的适度复苏支付的代价。

相比之下,我们称为“中度的合作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是一个限制市场力量的金字塔式的协调过程。例如,在日本,创新是对技术诀窍集中使用的结果,这只能在企业内部有一支稳定而技术娴熟的生产队伍的基础上实现。企业被视为管理者与挣工资者(不如说是股东的所有对象和控制对象)合作的场所。私人 and 公共部门的精英选择交给了教育制度,而不是流动的市场和技艺高超的职业人士。相互关联的投资,以及银行与企业间的密切关系使制定长期的投资计划更容易。可持续的学习过程和精密的协调机制带来了部门的专业化,为重要的规模经济及像汽车、消费电器或机器人这样的产品的分工提供了可能,或者准确地说,在同类部门中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相对突出。

问:我们再看一下日本,最近的危机显示了日本模式的局限:创新能力缺乏,政治保守,银行体制不完善等。

答: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应该落入把目前的日本危机简单地看作是脱离美国经典模式的结果的认识陷阱中。在上世纪末,来自西方的第一批访问者就宣称日本人懒惰,不适应工业生产。某些观察家现在也趋于犯类似的错误,指责日本文化中存在着似乎会破坏日本经济的潜在的情性。实际上,阻碍增长的正是我所说的“中度的合作资本主义”的成功,它的局限性在80年代末就显现出来了。单单靠引进世界各地的产品和程序并加以改造已经不够了,还需要本土和全面的创新。政治制度不再能满足日本选民的希望,他们在富裕的经济中有了贫困感。同时,随着出口的迅速增长,日本银行的成功导致了新的

国际扩张野心和将动摇早期的控制方式和金融管制的尝试。但是，日本社会并不缺乏改革精神。日本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基础科学和高技术创新中的缺陷，已经启动了假以时日就会成熟的全面计划。而且即使刺激经济的连续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短期效果，但它们改善了交通和城市的基础建设，这会成为日本经济向满足国内需求的方向转变的起点。日本的失业率让其他国家羡慕：官方的统计在3%到3.5%之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离欧洲式的大规模失业都还很遥远。

第三种模式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中，雇主、工会和政府之间的谈判是保证长期的生产率，收入不断提高及可持续的最大化平等的优先手段。在瑞典，一直到1989年，失业受到严格的控制。这多亏创新政策、协议工资、公共部门创造就业的计划以及特别有效的职业培训政策。该模式的危机源于国外市场的缩小，瑞典的主要企业的国际化，以及最重要的，公共就业进一步扩大受到财政限制。同时，年轻的一代攻击僵硬的而且限制严格的工资幅度。中央级的讨价还价被放弃了，公共开支减少了。但是这戏剧化的一幕还不足以作为瑞典的社会民主模式的最后定论。瑞典模式特别适合环境战略、医疗服务及工作的人性化方面的创新。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再一次会提高该模式的竞争力。

问：你也把德国放在这个类别中吗？

答：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模式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社会合作者之间的谈判决定了经济适应过程所服从的规则，并且力图把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协调起来。但是德国模式也借鉴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使政府干预被下放到地方（干预在州的层次上进行，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被分解了，而且受到像德意志银行这样的有自主权的机构的制约）。在

80年代,莱茵资本主义(德国模式有时会被这样称呼)处于抵抗攻击的较佳地位,因为它的技术基础和国际分工地位使德国的生产商在汽车或化工这样的领域中有决定出口价格的更大空间。但是同时,一些缺点也逐渐显现出来。德国的统一被证明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并且阻碍了德国的经济增长,因为要进行经济援助。创新放慢了脚步,无法赶上日本制造商的步伐。而且欧洲和国际金融机构提高了德国马克对日元和美元的比价。在1998年,这些压力同时发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失业,阻碍了德国工会提议的“就业协定”,最重要的是,这些变化使倾心于美国的方法和组织模式的雇主数量不断增加。当人们公开讨论市场资本主义的优点和安全网的合理化时,不仅仅是为了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

问:你如何定位其他的欧洲国家呢?

答:它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拉丁国家,是我们所说的典型的国家动力型资本主义(state-powered capitalism)。由于社会各方不容易达成妥协,雇主的力量不足以实施其战略,以及市场逻辑受到限制,所以国家必须承担起保证相当大部分的经济和金融顺利调整的任务(直拉地或间接地)。例如,在法国,国家是调节主体。它通过公共教育制度吸引和选拔精英,它不仅管理公共和社会服务部门,而且管理某些所谓的私有和竞争企业,它还对产业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立法并且干预信用配置。它不仅仅是凯恩斯式的国家(只是力图控制关节点),还(更重要的是)营建竞争的结构条件。许多供给和需求间的相互调整是在它的监督下实现的。这让盎格鲁-撒克逊的分析家们一头雾水,他们早就把立场由对“法国奇迹”的善意评价转到了对法国“断然拒绝欧洲改革”的起劲谴责上了。事实上,一旦公共发动机遇阻或油料耗尽,这种资本主义的动力就削弱了。结果是对自由革

命的支持增强了，这一行动的倡导者们开始谴责国家管理的无能。

问：我们走到这一步了吗？

答：法国模式与过去 20 年我们经历的重大变化格格不入。创新和产业的分工在公共秩序的调动下，集中在国有部门，但是国际竞争现在主要是开发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根据不同的需求调整产品。然而，以前是福特主义德意门生的法国企业已经失去了动员新的竞争资源的时间。制造业的萎缩和失业的增长是这种阻滞的标志。除此以外，在传统上法国的产业界在世界范围增长时期可以应对自如，但是在前途不定、怪圈不断出现的关节点上却难以调整。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创造了战后“辉煌的 30 年”的高度制度化和法律规定，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不足以引发自我变革。法国的精英们在这种历史性变化中觉醒得太慢了。不论是福是祸，法国社会是通过工资劳动队伍的分化，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及社会排外（最后一招）来调整自己的。保持竞争力的代价是社会调节领域中的失范：我们还应该相信国家吗？我们应该取消对企业的约束，激发社会对话，或者让市场不履行义务而肆意横行吗？过去 20 年中没有一届政府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更不用说实施一项前后一致富有效力的战略了。

问：简言之，这些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中没有一个显得处境很好。

答：60 年代的经济理论让人们认为，一个纯粹而且完善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理想离现实存在的经济的真实状态并不遥远。在那以后，有研究表明可能存在着非常多的不完善（与质量偏好、风险、外部性、不完善的竞争等有关），它们中的每一个都需要有制度或组织来弥补市场的缺陷。这是出现多种多样的资

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辉煌的30年”中强劲增长可能掩盖了潜在的不完善,那么过去20年发生的莫测变化则有利于某种(替代)形式的出现:70年代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80年代的中度合作资本主义,以及那以后的市场资本主义。各个国家不是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选择它们心中的资本主义图景的。它们是在既有的,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来加以调整和激活的逻辑和制度的基础上来适应资本主义。当国际体制稍微呈现些稳定时,每一种资本主义就会在某个部门中发掘出竞争优势,从某些制度条件中获益。

市场资本主义适合基础研究和专利创新,特别是在生物学、计算机编程和休闲产业等领域。中度合作资本主义似乎更适宜开发新的大众消费品,例如电器、消费品和新的运输手段。至于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它的强项是发明和开发新的公共品,不仅涉及教育、健康、老龄人口问题,而且还涉及环保。最后,国家动力型资本主义能够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创造,如高速列车、空间产业、电信等。因此,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是以互补为基础并存的,它们中没有一个会最终独步天下并消灭他人。

问:那不是有点太乐观了吗?

答:实际上,有两个重大变化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国际布局。首先,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扭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心,使整幅画面更加绚丽多彩。从长远来看,中国不可能比韩国和台湾更像日本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国家影响着老的工业化强国的发展,明显的开端是它们对老强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稳固地位发起了挑战。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强烈凸显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新角色。

第二个变化与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多样化有关,这些发展

导致了汇率和利率的决定因素上的根本变化，而且还限制了制订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性。由此出现的新的国际形势有利于能够最有效地对快速莫测的变化作出反应的经经济体制。在这种条件下，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繁荣起来，而其他三种模式节节失利，趋于解体，它们需要长远的经济眼界和有耐心的金融体制。

所以我们正经历一个悖论阶段：资本主义胜利了，但同时，它的一种最没有前途的形式却趋于凌驾于其他形式之上，因为缺少一个允许增长的互补形式存在的国际体制。难道是一种格雷欣法则（格雷欣法则指的是，英国人格雷欣在货币流通中发现的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在发挥作用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顽劣”资本主义，虽然灵活但是缺少平等，最终还不是十分有效率，把相对平等、在总体上富有效率的、但由于反应太慢不适应短期变化的“温良”的资本主义逐出了竞争的舞台。

（杨雪冬 译）

政治与经济*

尼克拉斯·卢曼

一

当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题从政治舞台的中心移开,落脚于足球或者退化为“极右翼”时,经济主题就占领了它们留下的位置。这些主题能够涂上民族的色彩,而不用诉诸于民族意识形态——例如表现为喜好自己的民族产业和在本国工作。在民族国家时代中,民族是真正的政治主题,但是它不允许存在反对意见,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体现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非民主主题。因此关于克罗地亚独立的全民公决只用

* 本文选自《第十一条纲领》1998年5月号。

一个口号：为了克罗地亚！就可以发动起来。然而，在世界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存在于与本国有关的国内政治和国外政治之间的区别已经无足轻重了，简单明了的原因就是，国内政治必须在外部关系中体现出来，对外政策要在国内关系中体现出来，而且每一种政策都能期望获得内部和外部的理解。进一步说，在许多情况下，一种新的“地方主义”（套用意大利流行的说法），正在把对民族国家的兴趣推到一边，民族国家正在同地方特殊主义搏斗着。

经济—政治主题看起来有一种不同的结构。这种不同导致了存在着不同观点的问题。这些不同观点已经固定化为政党的政治差别，例如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取向不同，并且这些差别体现在投票行为上。然而，许多民主国家的政治发展对这种差别是否仍然有效提出了质疑，既然政治选举只是产生了最小范围的变化，那么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政府就被迫采取市场取向的政治，而自由主义政党在对付社会左翼问题上则出现了困难。

政治惬意随着社会主义者管理经济时遭遇的经济政治灾难如风般逝去了。这被视为对市场原则胜利的肯定，结果是政治按照这种市场原则来组织。这种自我肯定的态度体现了战胜对手时溢于言表的欢愉之情。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市场经济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像公司靠一天的本金就可以登记一样，问题就出现了。

市场经济享有的政治（我们姑且这样讲）信用没有考虑到世界经济体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忽视了它们对政治产生的可能影响。这体现在全球传统家庭经济的崩溃上，这个变故不仅发生在上层的家庭，而且在所有的农业和手工业部门中更加严重。这种解体留下的是流动的个人和流动的金钱。这也体现在投资

和消费越来越依赖信用,不必提肇始于18世纪英格兰的规模庞大的国家负债。靠信用运行的经济永远不会偿还债务是不言自明的。债务可能中途易主,但对国家不是这样。经济保持着高额的负债。或者换一种更友好的表述方式:在今天,没有信用的经济运行是非理性的,而一个人等到攒够了钱才用自己的钱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也是非理性的。这种看法早就渗透到国家和私人投资行为中,在本世纪后期的个人消费中也得到了实践。不这样做也是非理性的,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选择消费时间的权力,使消费完全依赖于一种渺茫的储蓄能力。

经济赖以再生产的所有给付同时激活了信用帐户。当然,这不意味只有借来的钱才可以花,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当钱既不是借来的也不是攒下来,也就是说它无法满足信用时,包括使用自己的储蓄进行的每一笔给付都参与了信用经济。早在储备银行出现以前,延缓给付(信用)或者提前花费(投资)就对经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甚至说唯一的核心理问题,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也是一个风险问题。金钱不用记住它来自何方去向何处。然而,经济有一种体现为消极的信用度或积极的信用度的金钱记忆力,这种记忆力伴随着所有的给付并对它们负责。

结果是,全球金融市场现在形成了一个中心,相对来说,像生产、服务、劳务和交换这样的经济活动是在边缘发生的。一种崭新的分化形式现在已经根据市场、生产或服务企业所处的中心或边缘位置把自己强行加在经济的相关部门分化或裂变的过程中。

就像J.H.冯·图能在他的中心市场理论中提出的那样,中心和边缘的分化不能从空间上理解,更不用说地理意义上了。定位问题在生产和劳务领域依然重要,但是它们几乎不可能被汇聚在一种全球经济体系的地区中心中。金融体系的中心性不

允许空间代理,这是即使要认识它也存在着困难的原因。金融市场参与了涉及给付的所有经济运行,它们就像神学家眼中的上帝一样,无所不在而且没有具象。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点与数量和时间密切相关。

与金融市场及其组织所处的中心制度的地位相反,我们发现所有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与生产有关的所有劳动力处在体系的边缘。这不是一种等级制,也不是对经济运行重要性的有序排列。没有边缘,中心无法存在,没有中心,边缘也无从谈起。中心靠边缘对信用的需求及它对流动资产的积累来生存,相反,边缘的生存靠的是中心提供信用和以许诺给付实现贸易的功能。

如果我们想根据经济来描述现代社会的话,合适的表述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而是金融社会。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任何事都能够被理解为是融资的结果。这可以进一步加以详细说明。只有在中心才形成了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银行客户组成的经济上统一的等级结构。另一方面,边缘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差别,也就是说,市场和生产企业没有统一。同时,中心和边缘的差别也造成了差别形式的不同。只有中心真正从事全球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它不像地区性的公司那样要根据出口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差别来调整自己。我们在中心那里发现了一个根据通货差别调整的倾向,这虽然表面上反映的是地区差别,但却是根据全球经济而非地区经济建构的差别,是按照交换关系对应建构的,不是按照远近距离不对应建构的。只有在中心,货币机制才是被以自我反映的方式(self-reflexively)操作的。同时,经济体系中的自我参照和外部参照间的关系是根据中心与边缘间的差别排列的。在边缘,我们看到了经济体系与社会的其他领域,动机和需求间形成的结构性

结合,它们驱动了经济运行。本文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作出详细必要的修正。这里的问题是:如果这种关系只是大体上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或者甚至仅仅是有着不同地区变种的一种趋势,那么对于政治体系来说它有何意义?

二

即使政治体系一直没有一种自我反映的倾向,这里勾画出的经济发展也会迫使它躬身关心一下政治。

在旧的政治(与国内事务相对)社会概念被放弃之后,国家和社会在19世纪被区分开来,一个与国家有关的政治概念发展起来。相对来说,社会被理解为工业—商业的复合体。这种对立在政治方面可以被结合进国家职能的概念中。然而,这预设了经济产生了它不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必须把它们留给国家。在另一方面,国家能够用从经济那里得来的手段资助国家机器。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政治化首先是通过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人政党的形成发生的,结果是在政治体系内部出现了政党作为一方,国家机器作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是体系内部的,因此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中没有对应的关系。政党形态的模式——不大列颠的保守党/工党模式,欧洲大陆上主要的自由党/社会党模式——就这样成了重新阐释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参照点。经济的补充地位是由资本与劳工间的区别或者根据工厂组织、所有者和工人赋予的。在这种政党—政治方案的框架中,政治选择决定了国家是否应该追求一种更自由或更社会主义的

政策。在某种情况下,政治选择是一个保证经济免遭一度盛行的政治干预,实现自我提供资本的可能的的问题。在另一种情况下,政治选择又是一个纠正经济产生的收入、安全、生活机会的不平等分配问题。这样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充分发展的福利国家,至少在欧洲是这样。

在本世纪末,这种脆弱的平衡破碎了。流于表面的观察者们认为这是福利国家财政需求扩张的结果。唯一的后果会是社会党体制或自由体制被迫节省开支,不能够再用一些重要的举措来使自己与众不同。另一个更激进的观点存在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否仍然能按照资本与劳工的区别来构建问题。上面描述的发展表明,经济现在不是由一些完全不同的区别模式控制着,而且它不再可以在政治上予以解释,不再能够在任何程度上以一种有区别的政党政治纲领的形式被复制进政治体系中。

因而,目前情况的特征是需求间的矛盾。一方面,政治—经济主题在日常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在竭尽全力挽救作为经济遗址的德国的努力中突出地体现出来。为了维持社会安全和社会平衡,至少是为了防止人口中相当数量的人陷于贫困,各政党不惜诉诸于民族感情或就业许诺。另一方面,这些需求及类似的需求不足以分清政党间的区别,而经济政策是通过这种方式由政治选择决定的。难道我们必须得出下述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已经从民主的意见分歧中被撤掉了,只能通过行政方式解决吗?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民主共识,而不是民主的意见分歧的话,那么我们就正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上自欺欺人。正是因为决策自由被否定了,所以共识对每个民主制来说是致命的。自由依靠的是在选择意义上建构起来的,而这些自由显然正在消失。

三

从许多症候上可以看清楚政治是如何对这种环境作出反应的。首先是修辞上的,也就是通过讲话。或者说是含糊的空话。1995年12月,英国财政大臣在国际知名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宣称,“使劳动市场更加灵活是(必要的),这当然不意味着把雇员暴露在丛林法则之下。”大众媒体的每日报道给人的印象是,高谈阔论已经实现了某种东西,没有被简单地用于政治话语的自我繁衍(self-fertilization)。在政治讲话层面上,问题被压缩为观点并予以道德复述。结果是似乎人们能够分辨出解决问题的好坏方法。然而,问题不在于解决的方法,而是问题本身,它们最终取决于体系和环境间的差别。这样的后果是,在心态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花费力气对问题进行精确的描述,所以人们终于明白这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或者说,它们根本不是问题。

同样让人惊讶不已的是,个人名字发挥作用的程度——不论是人物、政党还是普通人(例如在欧洲统一的背景中)。个人名字的使用是一个阻止对什么是实际存在的问题提问的有效修辞技巧。个人的名字在不打断对这些名字的政治参照的情况下,为必要的话语循环和沟通的多余信息提供了条件。名字也在关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名字可以带来声望,那意味着给他们本人吸引来了关注这种稀缺资源,然后把这种资源投入到关于这个名人的主题中。对于政治来说,名字执行的是限

制和扩大关注的高度重要的任务,当然,前提是它们能够被介绍进大众传媒。

在它指向的价值范围内,政治语言是日常语言。价值不仅仅是获得权力和失去权力这样的特定政治价值,而且是所有能够引起个人兴趣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价值没有被宣扬为目的或偏好,而是与规范性主张联系在一起。要为了增进公众健康,获得更高的教育,打击犯罪等作出些贡献。价值的有效性是预先假定的,而其有效性不需要被表明,是被悄悄地设定的,因而揭示它就会使它面临被拒绝的风险。人们吸烟或者患者忽视医生的建议不是对健康价值的反对。另一方面,不能以众多价值的价值为基础来作出决策。决策只是在价值间出现冲突时才需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才没有决策的规则,没有价值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为什么要作出“政治”决定的原因。

政党的纲领及其他政治宣言反映了价值的词义学解释是怎样被高估的。这不能只归因于在单个案例中被降低重要性或延缓使用的诸价值的价值,而是源于价值的无约束特性。因此,没有一种决策可以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作出。价值适合自我宣传,但是政治实践如何进行或者个体选民如何决定,取决于不同环境中的特定取向。

同样,这种语言使用的重要优势一定不能忽视。它把政治体系的政治记忆组织了起来。由于记忆通常容易遗忘,所以备忘是一件重要但也烦人的事,因为它使体系的未来为其过去所累。价值的范围越宽,每一个忽视价值或者只对它们加以有限考虑的决定出现的必然性越大。这已经被人们牢牢记住了。由于被降低了重要性的价值恢复了有效性,所以当受影响的利益的呼声被听到或者记忆被重新激活时,价值就会再次进入决定。矫枉必须过正。在这种程度上,价值在政治中的词义学解释有

和信用体系在经济中相类似的功能。

如果我们必须认定经济是自我推动(self-dynamically)进行分化的,作为一种自我参照(self-referential)的体系以一种过度复杂的、不透明的、非线形的,也就是说不可预测的方式作出反应的话,而且,如果我们必须进一步认定分化的主轴不会使自己接近成为政党政治的分界线的话,那么,政治首要的任务是防止自我强化的失望和攻击性的过激化必然导致的政治后果。这种情况就像缺雨时霍皮族印第安人面临的情况一样。有助的是在一种信念的支配下跳求雨舞。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干旱而是就业。政治家们必须许诺的不是降雨,而是带来丰厚收入的有吸引力的工作。这假设了一种深信政治措施可以重新激活经济,相信地区结构政策及暂时控制危机的信念的存在,这是一种对政治激励式援助效力的信念——即使政治不能创造会购买劳动产品的市场。这种信念有多大的合理性难以衡量——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条件随着环境的激烈变化而随意改动,回溯性因果特性无论在任何情况都是虚假的。因而,每一件事情都说明,只要环境保持变动并为成功的假设和失败的解释提供足够的空间,仪式化就有存在的可能。只要人们信奉求雨或者增加工作这种显性功能,仪式的隐含功能——平息攻击和减弱紧张——就能够实现。因此,出发点良好的显性功能同时保证了隐含功能保持其隐含性,以及体系不会不待时机成熟就投入到殊死的斗争中。

现在的问题不是干预的无效而是仪式对所有人的开放,在民主条件下就是对所有派别的开放。虽然在政治舞台上各个角色的舞技会有不同,但是评判的标准不同,并且成功是随意分派的。而在选举中,也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理由投这个政党的票,不投另一个的票。既然与经济的关系决定了选举的结果,

那么选举结果也将依赖于经济循环的涨落。

四

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指导政党政治的先验图式失去了信息价值。自由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不再能够提供原则不同的政治。同样,保守—进步的先验图式,在变化如此迅疾以至政治面临着适应变化(做保守的?)还是坚持老观念(做进步的?)选择的社会中,只有微乎其微的意义。把自由派政党(例如基民盟)称为用保守的方式思考进步的保守党或社会主义党,除了适合党派的辩论外真的不合理。在经济政策上,对处于经典的政党光谱两端的派别来说,主导的问题是如何引导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岗位。但是这个问题也正是经济体系中边缘中心和分化的后果。

在这些条件下,唯一合理的是只存在一个关心经济政策的政党,一个产业和劳工的党。党的成员组织划分和大众媒体报道冲突的需要,只是在复制着政治选择能够决定根本性经济政治取向的印象。这不意味着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关系中的问题不存在了。事实正好相反。经济从来不能把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论是工作能力还是就业),包括进它的最优化计算中。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暴露了这个缺陷,它把这个问题看作了劳动力的最低经济需求,从而把问题外在化了。这个缺陷也适用于劳动标准,它把这个问题扔给了教育体制。今天,这个缺陷特别适用于为了重新激活消费而进行的就业再生产。专门的企业会计取消了所有这些问题,“经济”不知道其他的计算基础,也就

是说,它没有独立于这个基础的经济理性形式。除了生态问题外,经济体系的无能产生的劳动问题,对政治构成了经常性的挑战。如果民主带着一个包括了反对派的有意义的先验图式继续前进的话,那么产业和劳工仅构成了政治光谱的一端。另一端会是什么呢?

现在人们可以考虑现代技术—工业生产方式的生态影响。这不意味着以工业/劳工/消费为代价的生态倾向的政治一定必要。生态倾向的政治肯定会创造自己的市场和就业,以及自己对资本的约束和吸引。不过不难想像一种强制性的生态政治与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情景。因此,根据经济—生态的先验图式来为政治定向是富有意义的。

这决不会耗尽未来政治的冲突光谱。因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断增长的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犯罪和不断增加的使用暴力的准备与法治国家的保障之间出现的冲突线索。急剧增长的不安全和保护肉体、生命和财产的需要,成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选举动因。正在来临的移民问题和城市中贫民区的出现,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激发的利益现在被看作是“右翼”。这种看法会导致对不断加大的压力的低估。目前,经济—政治问题的主导地位会带来一种“集团化的民主”(Blocken democracy)。可以想像,这种民主由自由和社会主义党的多数联盟组成,联盟中的左翼具有更加强的生态倾向,右翼具有更加民族化的“法与秩序”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大联盟”与其说是从自己的政策,即它自己的宣言中获益,不如说从这个事实——使左右两翼截然分开,差距大到不会形成一个反对的联盟——中获得了好处。选民是否仍会把这看作是民主,依然是一个问题。

(杨雪冬 译)